关于清除党内
右派分子的决定彙編

第五册

（下）

Collection of the decisions concerning the purge of the Rightists within the Party

Volume 5

(B)

关于清除党內
右派分子的决定彙編

（五）

（党內文件・注意保存）

中共中央监察委員会办公厅編

出版説明

这本小册子里，选編了八十七件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党籍的决定和决議，仅供县委以上党委和有关党員幹部閱。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目　录

中共西藏工委扩大会議关于开除反党集团头子范明的党籍和軍籍的决議（摘要）…………（ 1 ）

中共西藏工委扩大会議关于开除反党分子白云峯的党籍的决議（摘要）…………（ 11 ）

中共西藏工委扩大会議关于开除反党分子梁枫党籍的决議…………（ 17 ）

中共西藏工委扩大会議关于开除反党分子曾奕党籍的决議…………（ 21 ）

中共重庆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文澄党籍的决議…………（ 24 ）

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显仪党籍的决定……（ 30 ）

中共重庆市委文教部支部大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陈孟汀党籍的决定…………（ 33 ）

中共重庆市財政局支部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戎占芳党籍的决定…………（ 38 ）

中共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鉄民党籍的决議…………（ 40 ）

中共成都市委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叶石党籍的决定………（ 43 ）

中共四川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謝文炳的党籍…………（ 47 ）

共青团四川省委整風領导小組对右派分子賀惠君的处理意見…………（ 49 ）

中共云南省委財貿大口整風領导小組关于处理党內極右分子李文煥的意見…………（ 54 ）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謝加林的党籍…………（ 55 ）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梁家的党籍…………… (58)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全明的党籍…………… (62)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黄平的党籍…………… (65)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姜必德的党籍…………………………………………… (68)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董学隆的党籍………… (71)
中共貴州省邮电管理局党組关于右派分子白晶五的組織結論…………………………………………… (72)
山东省人委整風領导小組关于以王卓如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的报告………………………………………… (79)
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开除右派分子王月村的党籍………… (89)
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赵篤生党籍的决定…………………………………………… (92)
山东省交通厅整風領导小組关于右派分子王翰西的結案处理意見的报告………………………………… (95)
中共山东省教育厅党組关于右派分子刘健飞的定案报告…………………………………………………… (99)
山东省文化局、文联整風領导小組关于右派分子馮毅之的处理报告………………………………………… (106)
山东省統計局整風領导小組关于将王梦玉定为右派分子的报告………………………………………………… (112)
山东省劳动局整風領导小組关于右派分子和坏分子侯林翼处理意見的报告…………………………………… (118)
山东省民族事务委員会整風領导小組关于右派分子花經燃的錯誤事实定案报告……………………………… (125)
中共大众日报社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方正党籍的决定………………………………………………… (133)
中共济南市委关于右派分子王路宾主要錯誤事实的报告………………………………………………………… (136)

中共济南市委监察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毅党籍的决定……………………………………（144）
中共济南市委监察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丛林党籍的决定……………………………………（150）
中共济南市委监察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成傑党籍的决定……………………………………（152）
中共济南市委监察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段德甫党籍的决定……………………………………（156）
中共济南市委监察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苗丰列党籍的决定……………………………………（157）
中共济南市委监察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王斌党籍的决定……………………………………（160）
中共荷泽地委会議（扩大）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扈国华、杜湘、王鲁克、褚連捷党籍的决議……………（163）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員会对于右派分子戴岳的处分决定……………………………………（168）
中共安徽师范学院委員会对于右派分子方向明的处分决定……………………………………（171）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微党籍的决定……………………………………（178）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程明远党籍的决定……………………………………（180）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汪制均党籍的决定……………………………………（182）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江誠党籍的决定……………………………………（183）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云鹤党籍的决定……………………………………（185）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笠党

籍的决定……………………………………………………（187）
中共蚌埠地方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郭永錫党籍
的决定……………………………………………………（189）
中共蚌埠市委員会关于右派分子罗霞光的处分决定……（191）
中共蚌埠市委員会关于右派分子王荣华的处分决定……（199）
中共蚌埠市委員会关于右派分子杜宏本的处分决定……（207）
中共合肥师范学院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兆甲
党籍的决定………………………………………………（213）
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右派分子夏际霞的結論意見…………（215）
中共同济大学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薛尙实党籍
的决定……………………………………………………（218）
中共上海市妇联支部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赵先
党籍的决定………………………………………………（220）
中共上海市财政局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朱如言
党籍的决定………………………………………………（223）
中共上海市委对右派分子楊延修的处理結論……………（225）
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开除右派分子李中的党籍……………（227）
中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总支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
子苗力沉党籍的决定……………………………………（229）
中共上海市长宁区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石海党
籍的决定…………………………………………………（231）
中共复旦大学委員会决定开除右派分子王中的党籍……（234）
中共上海市委对右派分子王若望的处理結論……………（236）
中共福建省委全体会議决定开除地方主义分子黄国
璋、林汝楠、許集美、王一平的党籍…………………（237）
中共江苏省交通厅支部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
鎮党籍的决定……………………………………………（240）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普通班第二十五支部关于右派分
子楊成亮的政治結論……………………………………（243）

中共浙江省委监察委員会关于开除極右分子顧耕初党籍的决定…………………………………………（246）
中共浙江省商业厅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黎立堅党籍的决議…………………………………（249）
中共浙江省輕工业厅党組关于右派分子张光反动言行的报告……………………………………………（252）
中共浙江省农业厅党組关于右派分子张俊升反动言行的报告……………………………………………（254）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普通班二十支部关于右派分子刘德焜的政治結論…………………………………（259）
中共浙江大学第二次党員大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成浩党籍的决議…………………………………（263）
中共河南省人民委員会人事局支部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同中玉党籍的决定…………………（269）
中共河南省人民委員会人事局支部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繼胜党籍的决定…………………（272）
中共洛阳地委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巨和勤党籍的决定………………………………………………………（276）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石天行的党籍的决定……………………………………（278）
中共江西省委組織部关于右派分子金凱的处理結論……（282）
中共中央民族学院分院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文藻党籍的决定…………………………………（285）
中共湖南省委监察委員会关于右派分子邓鈞洪的处理結論…………………………………………………（292）
中共湖南省委监察委員会关于右派分子苏辛涛的处理結論…………………………………………………（294）
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議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徐江萍党籍的决定………………（297）

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委員会整風領导小組关于右派分子阮力定案与处理决定…………………………（298）

广东省水产厅整風領导小組关于極右分子蓮荆的处理結論…………………………………………（300）

广州市文教局整風領导小組关于極右分子李應航的处理結論………………………………………（302）

中共广东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古念良的党籍…………（305）

交通部广州区海运管理局整風領导小組关于右派分子吳英民的处理結論……………………………（310）

交通部广州区海运管理局整風領导小組关于右派分子张玉华的处理結論……………………………（313）

中共广东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李爱农的党籍…………（316）

中共广东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庄明瑞的党籍…………（319）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微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李微，男，四十四岁，河南郾城县人，地主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七年入伍，一九三九年入党。历任区委書記、县长、副专員、地委宣传部长、市长、市委書記等职。现任教育厅副厅长、省中学教职員肃反委員会党組副書記。

其主要反动言行如下

1.支持右派分子儲安平“党天下”的謬論。他說：“儲安平的‘党天下’放得对，有道理，确实十二个副总理中沒有一个党外人士”。

2.攻击肃反运动。他說：“肃反运动‘逼追’‘輕信口供’‘主观臆断’‘不实事求是’‘搞左了’”，“造成不少冤案”。

3.寬縱和放掉反、坏分子。他在肃反中亲自放掉反、坏分子十四人，並規定“对反革命分子作結論，可以不戴反革命帽子”，“学校中的反革命分子要更加寬大处理，能教書的都放回去教書”，“普通反革命分子和有严重政治历史問題的人只要斗过、搜查过，都要賠礼道歉。”特别在鳴放时，他曾指使右派分子倪湘正写信給反革命分子李瑞珠（右派分子李銳之兄）賠礼道歉，煽动其反攻翻案向党进攻。对畏罪自杀的反革命分子李传鼎关怀备至，派幹部陪其家属上坟、立石碑，發給其家属‘撫恤’費七十余元。

4.反对党的領导，汚蔑党的幹部政策。他說：“工农幹部是土包子，沒有文化沒有理論，不能領导知識分子。”他在幹部中进行私人拉攏，封官許願，並提拔重用反革命分子陈肯和有严重政治历史問題的张越。

5.歪曲和汚蔑党的工业建設和农业合作化的方針、政策。他在安庆市工作时对工业建設提出：要‘抱守残缺’，“維持住烂摊子就行了”，指示新华布厂“要搞少，搞小，搞了”。在幹部中散布說：“现在农村不如以前，才眞是当牛馬，农民普遍沒有錢用，春天吃盐菜，夏天吃南瓜，天天打长工，落得两手空。”

6.抗日时期反对对汉奸实行鎮压政策。他說：“地主老財当汉奸是我們政策‘左’了，硬逼着他当汉奸的”，主张团結汉奸，減輕地主老財負担。解放后庇护其汉奸父亲，接来奉养，並騙取了选民資格。

7.品質恶劣。抗日时他不顧敌情紧张，天天談情說爱，說：“不管頑固軍反共派如何猖狂，每天只要有女人睡覚就行了”，並曾用流氓手段猥褻过女幹部。一九四五年曾因与地主女兒搞腐化，受到开除党籍处分（三个月又恢复其党籍）。

綜上所述，李徵反党罪行实屬严重，已完全堕落成为党內右派分子。而在斗爭中态度也很坏，最后在事实面前被迫認罪。为純潔党的組織，經支部大会討論決定並报請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李徵的党籍。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程明远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程明远，男，五十九岁，安徽肥西县人，貧农出身，手工业工人成份。一九二七年参加共产党，一九三二年被捕（在獄中發表过反党宣言），一九三七年重新入党。历任县委書記、中心县委副書記、淸江匯通盐号經理、地委書記、行署农林处处长、华东农林部林业总局局长、安徽省水利厅副厅长等职。現任省林业厅副厅长及党組書記。

其主要反动言行

1.一貫与党离心离德。污蔑党对他不信任，把他当‘皮球幹部’，利用他，限制他；他認为党不好处理他，而是有意在“三反”、“肃反”中搞他；他还恶毒地污蔑党对老幹部有两个办法：一是朱洪武火燒独角楼的办法，一是李世民养起来的办法。

2.攻击和污蔑各項运动。他捏造說：“鎮反时，含山县杀人杀多了，超过比例，杀的人沒有名堂按，就按到‘其他’这类。”“三反时省委硬性交代各地老虎任务，造成各地乱打一气，蕪湖地委打死一千多人都是冤枉。”他又叫囂“肃反錯誤很大，得不償失。”並恶毒污蔑說“省委在肃反时准备三千五百人成立劳教指揮部，把沒有問題的人都想搞去湊数。”又說：“搞运动的人沒有好下場，搞运动的都是在党內有后台的，党內有一批人专靠搞小情报吃飯的。”

3.攻击省委領导，破坏党的团結。他恶毒地污蔑說：“有些

領导人不如曹丕，”“三反时处理宣济民（三反貪污分子，現为右派）是冤案。”又說：“省委有无为派、路西派、路东派、苏北派、太行派，大别山派現在吃不开，倒霉了。”省党代会选举时不到会表示抵抗，选举后，他对几个省委負責同志进行恶毒的污蔑、誹謗。

4.反对农业合作化和生产改革。他叫囂：“合作化搞快了”，“三改行不通”，“一九五六年災害是双季稻造成的”，“現在农村餓的投水的投水，上吊的上吊，暴动的暴动，搶粮的搶粮。”

5.組織反党集团，进行反党活动。他曾召集肃反被审查对象汪制均（副厅长，現为右派）、胡貢球（黃山林校校长，現为右派）、王文正（合肥林校校长，現为右派）、俞梦平（副处长，現为右派）、刘东屏（副处长，坏分子）等人开会討議反对林业厅肃反总結。他又經常地集聚郭崇毅、陶秉钰（均系反革命分子，現已捕）、徐晓天（叛变分子）、胡磊（坏分子）、宣醒民（現为右派）等人在一起議論攻击肃反运动和肃反領导人員，丑化积極分子。他还暗地指使宣济民、刘东屏等人在党的‘八大’开会前向中央誣告省委負責同志，蓄意搞夸省委核心領导。

綜上所述，程明远反党反社会主义情节严重，已墮落成党內右派分子。經斗爭，虽交代了一些反动言行，但仍避重就輕，态度很不老实。为純潔党的組織，經支部大会討論决定並报請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程明远的党籍。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汪制均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汪制均，男，四十一岁，安徽肥东县人，貧农出身，农民成份。一九三九年参加工作，同年入党。参加革命前，一九三六年在伪警团当兵，一九三七年被日寇打夸回家，一九三八年参加封建武装紅槍会当教練。入伍后，历任班长、排长、連长、营长、团参謀长、科长、处长等职。现任林业厅副厅长。

其主要反动言行如下

1.攻击肃反运动，污蔑肃反領导人員和积極分子。汪因在肃反中被审查，即对党仇恨，他説：“不能拿全国和全省肃反成績是主要的，缺点和錯誤是不可避免的公式来套林业厅的肃反工作。”右派分子攻击肃反对象住招待所反省是违犯宪法，他贊同説：“招待所不是調幹部用的，是关人的，不好解释。”污蔑林业厅肃反領导人是“复兴社分子，”利用“复兴社分子”搞好人，是宗派斗爭。並与右派分子程明远（原林业厅副厅长）等人糾結在一起計議推翻林业厅肃反总結。

2.与右派分子程明远两人为首，拉攏历史上有問題的和对党对領导不滿的人，在林业厅內結成反党宗派集团。他平时对幹部採取拉攏一部分，打击一部分，对他好的就加以重用，不好的就打击排挤。肃反后，他負責厅里工作期間，利用职权，与程明远有計划地排斥肃反骨幹。而肃反对象胡貢球、俞梦平（現均为右派分子）劳教释放后，厅領导上要将他們調出，他不同意調，把

他們留在厅里，攻击肃反領导同志。整風开始，他与程明远商討好，将其反党助手王文正（肃反对象，現为右派）安排为整風办公室主任，上級組織派人參加該厅整風办公室工作，他採取抗拒态度。

3.鳴放时，煽动群众向党进攻，同情庇护右派分子。他在主持厅內鳴放座談会上，贊揚郭崇毅（原副处长，現查明是反革命分子，已捕）的反动言論，並煽动說："只有郭崇毅一个人提的尖銳，又大，又深刻，其他人都是提些'鷄毛蒜皮'的小事。"当組織上划郭崇毅、陶秉哲为右派分子（均系反革命分子，現已捕），他为其辯护說："郭只是对双季稻有意見，並无坏意，"上級决定要他發动群众对郭等开展斗爭，他拒不执行。

4.重用反、坏分子，鼓动坏分子无理取鬧。他不經厅領导研究，擅自提拔肃反中被审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徐連江（現已捕）任林业厅大別山研究站站长，鼓动坏分子盛誠（已开除劳教）与机关无理取鬧。

根据上述材料，說明汪制均已墮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党內右派分子。在斗爭中态度也不老实，交代問題避重就輕。为純潔党的組織，經支部大会討論决定，並报請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汪制均的党籍。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江誠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江誠，男，四十六岁，安徽省廬江县人，中农出身，自由职业成份。參加革命前，曾任塾师三年，小学教师一年、伪保长一

年。一九三八年八月参加工作，同年参加党。历任工作团員、区員、区长、情报站长、区委書記、县委部长、副書記、書記、市工会主席、市长（市委副書記）等职。现任省劳动局长（党組書記）。

其主要反党罪行如下

1.反对党的領导。他把党对政府工作的領导污蔑为“以党代政”“干涉太多”，主张把党和政府“統一”起来，解决“政府无事幹，党委事情多”問題。他又說：“党主要是从方針、政策上来領导，对于部門业务誰有能力就叫誰幹”。他污蔑党委专断，說：“如果持有和党委不同看法，往往容易遭受批評和打击”。他恶毒攻击省委說：“党內亦有‘墙’，要拆‘墙’应从省委拆起”。

2.否定社会主义建設成就，攻击农业合作化，反对統購統銷。他說：“党委把成績估計过大”“我总觉得工作上缺点講得越多些，越舒服些”“成績是基本的，缺点是存在的，已变成一种公式”。他歪曲事实說：“农业社問題多，是因为搞快了，搞大了”“統購統銷把老百姓、商人都統死了”“农民太苦了，粮食不够吃，‘三定’有問題”，叫嚣农民生活不如过去，“現在連稀飯也吃不上”。

3.鳴放中到处点火，煽动別人向党进攻。他除在言論上称贊右派分子儲安平‘党天下’反党謬論外，还煽动对領导有意見的人‘趁机会放’，他写信給右派分子张笠（原省物資局副局长）和张伯鍔（原农业厅粮食生产局长）說：“現在已整風了，眞正的內心話似乎报紙上發表不多，我們这些靠党吃飯的……一下要拿出眞实的东西是困难的”。同时，他又鼓励机关內的叛变分子黄安才等向党进攻。

4.一貫敌視党的各項政治运动。他說一九四二年整風‘是坑人’，把一九四七年淮海土改斗爭地主和鎮压恶霸說成是‘乱打

乱杀’，說：“三反冤枉了很多好人”，叫嚣“一九五五年肃反‘打击面寬了’‘搞糟了’，把人搞的‘不敢来往’”。他还責令肃反幹部向叛变分子賠礼道歉，擅自改变案件性質，强調对反、坏分子要“一視同仁”，並說：“他們（反、坏分子）在政治上已經吃了苦，在經济上应照顧一点”，因而，机关內五个反、坏分子在他庇护下，得到了提职、提級。

5.平时工作消極，名位思想严重，生活腐化墮落，曾多次玩弄女性。

綜上所述，江誠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情节是严重的，已墮落成为党內右派分子。为了純潔党的組織，經本委研究决定，並报省委同意、中央批准，开除右派分子江誠的党籍。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云鶴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李云鶴，男，六十五岁，安徽金寨县人，地主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二五年参加党。历任支队副司令、特派員、副官处长、省委書記、省委特派員、中心县委書記、特委書記、紅二十七軍司令員、市委書記、一九三三年在山东日照任中心县委書記时，被捕判徒刑五年，一九三七年由柏文蔚保释后，历任中心县委書記、地委書記、华东联絡部第二工委書記、皖北行署副主任兼区党委統战部长、省委統战部副部长等职。现任省政协副主席、省人民代表、省人民委員会委員。

其主要反动言行

1、在大鳴大放期間，同情並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省政协机关批判章伯鈞、罗隆基的反党謬論时，他为章、罗辯护說"他們不是处心积虑的"，"不能肯定他們有阴謀"。右派分子张东野恶毒攻击"共产党沒有人情味"，他說"张东野的話是有道理的"。又說："张东野的話不是攻击我們"。当左派王任之等反击右派言行时，他深为不滿，並阻挠焦鳴鑾反击右派。

2、他經常散布反对党的根本路綫的謬論。他常說："中国的問題，首先是农业問題，而不是工业"。"中国是农业国，安徽是农业区，应該先农后工，不然就要犯錯誤"。他誣蔑安徽省的农业合作化"搞的太大太快了"；初級社升高級社是"盲目的不从客观实际出發，而以主观願望出發"。他反对粮食統購統銷，說："党內外都有不滿情緒"。

3、一貫反对省委推行农业"三改"的正确措施。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他到处搜集农村工作中的缺点来攻击省委，誣蔑"双季稻搞坏了"，淮北搞稻改是"庸人自扰之"，三改增产"事实上並不如此"，"农村幹部报喜不报憂，省委对災情沒有及时拿出办法来"。

4、他长期存在对党不滿和对抗情緒，誹謗省委負責同志，並誣蔑"党內也有世态炎凉"。

5、历史上曾向敌人自首，写过拥护三民主义的反动文章。

根据上述材料，說明李云鶴已墮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党內右派分子。在斗争时，开始态度狡賴，經过多次批判，最后才表示底头認罪。为純潔党的組織，經机关支部大会討論决定並报經省委同意，中央批准，开除右派分子李云鶴的党籍。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笠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张笠，男，四十八岁，安徽太湖县人，恶霸地主家庭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八年入党，一九四零年入伍。历任县府秘書、科长、党訓班政指，县委宣传部长、副書記、旅政治部科长、后勤处长、县委書記、校委書記、地委組織部长、副書記。現任省物資供应局副局长。

张笠反党反社会主义主要言行及严重违法乱紀的事实如下：

1、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粮食統購統銷政策。他任滁县地委副書記时，說滁县专区农业合作化运动"带有几分冒险性，如再勉强跃进一步，就有跌伤的危险"。在粮食統購問題上，他公开叫嚷："口粮标准过低，农民不够吃的"。

2、攻击省委領导。他污蔑我省公布的粮食增产数字不实，并且有意找缺点，抹杀"三改"成績。去年春天，省委号召机关幹部借款支援农业社生产，他乘机揑造事实，公开指責省委。他对省委發下的农村購买力增长調查数字不滿，說："沒有这么高，不能替他当喇叭筒子，作宣传員"。

3、挑拨农民与党和政府之間关系。他曾引用北宋张俞的蚕妇詩"昨日入城市，归来淚滿襟，遍身罗綺者，不是养蚕人"来污蔑今天城乡人民之間关系。他誣蔑我們国家机关工作人員同封建統治阶級一样，說什么"大幹部穿呢衣，中級幹部穿嗶嘰，一般幹部穿綫呢，农民穿个破毽衣，迎風吹来变成翻毛鷄"，並在他所联系的农业社幹部会上公开煽动說："要減輕农民負担"。

4、鳴放期間，和其他右派分子一呼一应瘋狂地向党进攻，並对局內右派分子进行包庇。右派分子江誠（原省劳动局局长）給他信中充滿反党論調，他表示同情。右派分子王曉农（原物資供应局代处长）叫嚷：“农村工作搞的这么糟，这样下去不得了，农民要革我們的命！”他点头贊同。当王曉农誣蔑和否認我省工业建設成就时，他公开支持王說：“工业工作搞的这样，工业厅还有人当上部长呢！”王被划为右派分子，他把党內討論王的情况洩露給王曉农，並千方百計地对王进行庇护，說：“王的反党材料不确实，領导上有个人情緒”，又在全局幹部中进行活动，說“王是思想錯誤，不能一棍子打死”，直至王曉农已承認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后，他还在大会上当着王曉农的面說：“王不是右派分子”。

5、品質極端恶劣。他在参加工作前即經常有鷄奸的恶劣行为，入伍后，仍然常犯。一九四九年他欺騙組織未和原妻离婚就与白雁同志結婚，不久又和白雁鬧离婚，法院尚未判决又誘奸未滿十六岁的幼女武立云，組織上为此曾給予党內警告处分並責令他与武断絕关系。他表面上作了检討，但又瞞着省委組織部与武立云結了婚。一九五七年春节期間，他又和武立云的姐姐發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組織上責令他检討，他認为組織对他太苛刻了，竟以打报告要求退党、退职手段对党进行威胁。

从上述材料說明，张笠由于出身反动恶霸地主阶級剝削家庭，虽参加革命受党的教育近二十年，但他沒有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仍然充滿着資产阶級剝削思想意識和坚持反党的阶級立場，以至最后堕落成为党內的右派分子。为純潔党的組織，經本委研究决定並报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张笠的党籍。

中共蚌埠地方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郭永錫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日）

郭永錫，男，四十七岁，肖县人。富农出身，富农成份，一九四零年入党，同年参加工作，原任地委副書記。

郭永錫参加工作以来，一貫堅持富农立場，反对党，反对各項社会主义建設措施。

（1）利用职权，反对合作化运动。一九五三年原宿县地委試办了十个农业社，郭当时大叫办社是“盲目扩大社会主义經济成分，不照顧小农經济的特点”。同年秋他又在地委扩大会上提出“要普遍地貫徹十大自由政策，保障私有制”，灵璧县委試办了十多个农业社，他也說是“冒进”，要县委解散。一九五四年春他主持召开各县农工部长会議，在会上說：“自發社不是好現象，要立即解散”，在他直接布置下，解散了許多合乎条件的自發社。一九五五年春，五河县試办了二百多个农业社，即将試办成功，郭勒令該县解散。一九五六年八月他在宿县区書会議上污蔑說“合作化后，衣、食、住、行四个字，連一个字也未搞好”。污蔑合作化搞糟了，沒有一个社增产，污蔑社幹部比过去地主、土匪还厉害。

（2）反对和破坏粮食統購統銷政策。在宿县区書会議上，他把农村地、富、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說成是“目前农村混乱的焦点是衣、食、住、行問題，特别表現在粮食問題上”，並又提出：公粮不征交国庫，由社保管，付給保管费，农业社缺种子，就地貸給；社員沒有粮吃，要吃种子，可把国庫粮給他們

吃，种子算我們的，只轉个眼。在郭的指导下，动用了国庫粮九、二二五、一七九斤。一九五七年宿县报总产量四亿七千八百万斤（实收四亿八）。郭硬說只能收四亿斤，並批評县委"要假面子"，同年春他硬要碭山县委給隴海社增加供应七万多斤粮食。他利用职权索取隴海社員粮票四百多斤，又从肖县黄口鎮买了二、三十斤饃带回机关吃。並竭力反对牲畜飼料标准，說"小驢三个月可留四十斤料，簡直是胡鬧，是剥驢政策"，宿县"三八"社一头牛一天喂一斤飼料，他也說是"剝牛政策"責令社幹增加为一天三斤。

（3）反对农业生产改革。对待省委生产改革指示阳奉阴违，消極对抗。一九五六年在宿、灵、泗、濉四县区書会議上討論秋季馬鈴薯問題时，郭煽动說："馬鈴薯这个問題我不敢講，省委叫种就种，种下去不收断种也就怪不到我們了"。他还反对省委提出的在淮北挖塘打井的措施，反对扩大复种面积和棉花密植增产办法。經常說："再扩大也沒有留晒垡上算……我們这些同志就象沒有脑子似的！"並强迫宿县"三八"社犁掉災后补种的豆子八十多亩，紅芋三十多亩，造成很大損失。一九五六年七月他还召开电話会議布置各地种旱直播水稻，仅灵璧等四县統計，即浪費稻种八百多万斤。

（4）严重违反党的政策。怀远改造落后乡，在其指导下，竟将貧农、中农錯划为地主、富农計二千三百八十五戶，占全县补划地主、富农的百分之八十三。並錯誤的决定"追分散"，致發生严重的违法乱紀。由于追分散而遭受各种肉刑的一千一百七十戶一千四百七十二人。自縊身死的三十三人，自杀未遂的二十三人，打伤四十二人，被打不敢回家的四十三人，严重的影响了群众生产情緒，破坏了党与群众的关系。郭竭力掩盖自己錯誤，还对反映情況的鐘鼎山同志打击报复。

（5）一貫抗拒組織，反对党的領导，破坏党的团結。一九五一年任碭山县委副書記时，在鎮反和土改运动中，屡次反对和

拒不执行原宿县地委的决議，以致造成严重的违反政府。在任地委副書記时，他又污蔑省委公布的一九五六年增产数字是“吹牛”，还在一次幹部会議上駡共产党員“說的是天官賜福，做的男盗女娼”。早在一九四三年任乡长时就反对区書张世瑞同志，一九四八年任宿东县委組織部长时，反对县委副書記代世雅同志，一九四九年在銅县駡县書石立同志“象狗熊一样”。处处吹嘘自己，打击別人。另外还长期隐瞞富农成分。

郭永錫的富农本質，在参加革命后，虽經較长时期的革命教育，但並沒有得到改造，一貫堅持富农立場，他是一个披着“工农幹部”外衣混入党內的阶級異己分子，是党內右派分子。为了純潔党的組織，經报請省委批准，决定开除郭永錫党籍。

中共蚌埠市委員会关于右派分子罗霞光的处分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罗霞光，男，47岁，山东省舘陶县人，恶霸地主出身，学生成份。1938年3月入伍，1938年4月入党。历任教导員、武委会主任、团参謀长、局长、市委組織部长、代市长、市委副書記等职。現任市委第二書記兼监委書記。

据揭發証明，罗霞光是罗（霞光）王（荣华）杜（宏本）反党联盟的主帅，其主要反党言行如下：

（一）篡改肃反方針、政策，寬縱大批反、坏分子

罗霞光在肃反工作中，伙同王荣华等反党分子，除忠实地执行

李世农的“宁右勿左”，“宁漏勿錯”，“只要从寬，不要从严”的反动方針外，还制造各种謬論，寬縱大批反、坏分子。

1.他与王荣华一味主张“和平談判”，竭力取消小組斗爭。他規定：不能肯定反革命性質的不斗；問題不明显、未掌握一、二条人命的不斗。他說：“小組斗爭阶段不走也可以”，小組斗爭“一味施加压力，表面上轟轟烈烈，結果是逼供或寃枉好人”，並造謠說特务分子馬野林的案子“假了”。

2.他百般阻挠和破坏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专案斗爭，並与王荣华在1956年上半年一次就砍去正在审查的专案对象 305 名（現已定为反、坏分子的57名，其余正在专案复查）。

3.在对反、坏分子的定案处理中，他除同意李汝云为反、坏分子开脫罪責的謬論外，还把杀害我四名地下工作人員的特务分子，說成是“材料不明确，要查查敌人的佈告”，不予逮捕；把特务分子破坏合作社，說成是“有时不服从社长領导”；把地主倒算，說成是“自私自利”；把反革命分子进行現行破坏活动，說成是“由于沒有解决职业造成的”。他还要肃反幹部审查材料要有“否定一切的精神”，“要設身处地的为人家（反、坏分子）想一想”。据初步統計，由于他的罪恶活动的結果，在內部肃反和社会鎮反中共寬縱了反、坏分子658名，其中他亲自寬縱的反、坏分子103名。

4.他在北京高級党校鳴放时，誣蔑肃反运动“犯了扩大化的錯誤”，並說这是“中央規定5%的比例”和省委反右傾造成的。

5.他公开声称：“凡是經过斗爭未定为反革命的都算斗錯，都要賠礼道歉”，並威胁幹部說：“你們若思想不通，就是党性不强，再不通，換換班子，看你們通不通”。他还誣蔑“招待所控制太死太严，比拘留所还厉害”。

（二）反对党在城市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方針，破坏工业建設

1.罗霞光到蚌埠以来，不仅不围繞工业生产中心安排和佈置工作，还公然提出蚌埠应“工、商、郊（农业）”三大任务同时並进。1956年，市委决定在第九次党代会上进一步貫徹城市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方針，他与王荣华、杜宏本、史堅、李斌、吳正等竭力反对市委这一正确措施，罗公然提出“改造是主要問題”，以此来反对城市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方針，並在背后大肆攻击市委“工业抓的多了”。

2.他与史堅經常以市委“不重視監察工作”为借口，煽动監察幹部反对党在城市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方針。他对監委机关右派集团画市委“头頂工交部”的反党漫画，也表示贊同。

3.他与杜宏本反对蛋厂和鞋厂的兴建、扩建，他还責令已动工的鞋厂停工；在防汛期間，他又利用职权，硬要扒掉船厂的主要厂房及水厂的矾池。

（三）反对农业合作化，破坏統購統銷政策

1.他与杜宏本一起誣蔑农业合作化运动，他說农业合作化是“轟起来的，不好巩固”，是“冒进”。他还攻击郊区增产规划“是瞎向上吹的，根本不能实現”。

2.他反对党对合作化的領导，說：“那个乡的党員多，那个乡的合作社就办不好”。

3.他說：“粮食不够吃是普遍存在的題題”，“农民流入城市的主要原因是沒有粮食吃”，“我路过怀郢，如果遇不到熟人，連飯都吃不到”。今年三月，郊区正处在生产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大辯論之际，他却亲去郊区佈置連夜普查粮食“不够吃”的情况，大拨救济粮款，不仅破坏了春耕生产，而且支持了地、富、反、坏分子攻击統購統銷政策。

此外，他还反对在郊区种馬鈴薯等高产作物，破坏农业“三

改”，並竭力反对省、市委补种晚秋作物的指示。

（四）反对党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罗霞光否定党对資产阶級改造的必要性，說資本家“五反后坏的少了，一、二年就变成工人阶級了”，“資本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前有两面性，現在屈服了，軟弱了，95%以上的資本家都是好人，不論什么样的資本家都有积極性”，合营后資本家和我們“成了一家人了”可以不分彼此了”，甚至吹嘘資本家“大公无私”，說共产党員还有“本位主义”，职工不如資本家表現好，“第一个报喜的是資本家”。

2.他与杜宏本、胡春华共同篡改私改方針政策。在清产核資中，他們把在賬的生产資料划为生活資料，不予登記；对財产估价是尽量高估；把不法資本家抽逃的資金作为增資处理，他說：“資金本来就是資本家的，抽逃一点是难免的”，並主张依靠資本家进行清产核資工作。在人事安排上，他說：“安排資本家条件要低，提拔职工条件要高”。在此借口下，他与杜宏本、胡春华只安排資本家，不考虑职工的安排和提拔，甚至将反、坏分子安排到領导职位上。据初步統計，他們安排反革命分子担任領导职务的就有10人。他反对党对合营企业的領导，公开污蔑“公方代表不尊重私方代表的权力，无会不罵，往往以謾罵代替批評”，“私方代表有职无权”。他还与王荣华、杜宏本、胡春华、李斌共謀撤出公泰酱醋厂的公方代表，並将一貫反对党的領导的資本家由副厂长提为厂长。在鸣放中，他又支持吳正将該厂的党員股长停职反省。

（五）篡改建党方針和幹部政策，包庇坏人坏事，培植反党勢力

1.他和王荣华忠实地执行了李世农“先整后建”的反动方針，並将“积極慎重”的建党方針，篡改为“大胆、积極而又愼

重"的反党方針。他取消党員标准八項条件，使一些反、坏分子和政治不純分子得以混入党內。他还和王荣华把党的"德才兼备"的幹部政策，篡改为德才不备，他說："无德可以培养，沒才可以鍛炼"，"只要有文化程度，就可以提拔"，"知識分子不提拔，养不住"，甚至不顧单位領导的反对，公开将有血債的反革命分子徐长帜（現已逮捕）調离原单位加以提拔。当他这些反动主张和做法遭到反对时，就威胁单位領导說："你們不要怕人家頂了你的位置"，"你过去是幹什么的？你才提拔了几天？"仅据两个单位的初步統計，在他亲自排队的一百名提拔对象中，就有反、坏分子和政治历史有問題的26人，社会关系复杂及一貫落后的23人。

他还否定1954年整編成績，並責令有关单位硬行安插被整編掉的反、坏分子。

2.他一貫包庇坏人坏事，封官許願，培植反党势力。对一些对党不滿分子，蛻化变質分子，自首叛变分子，阶級異己分子，甚至反、坏分子，他几乎都加以收罗重用。右派分子张林志一貫对党不滿，鬧地位，罗对他說："你鬧什么？还沒有你个区长幹嗎！"不久，就提张为区长。叛党分子韓敏志，有严重罪恶，評級时鬧情緒，单位提出要处理，罗不但不处理，反将韓由20級提为18級。坏分子蔣学友，罗对其極为器重，一再将其提拔。蔣在肃反中，利用职权，奸污妇女，並在女方怀孕后，唆使打胎，被判刑后，罗仍对其关怀备至，批給蔣每月60元，加以照顧。史堅、李斌、李浓云、胡春华、吳正以及监委机关的一小撮右派分子，几乎都是他和王荣华积極推荐和亲手培植提拔起来的亲信。为了培植亲信，他还採用各种阴謀手段破坏組織原則，对犯錯誤的幹部多是百般庇护，甚至市委批評时，他也为之辯护，討好幹部，攏絡人心。他对忠誠于党的幹部，特别是老幹部，則公开辱駡："老幹部不如井岡山的騾子，騾子老了还能杀肉吃"。

3.他还和王荣华忠实地执行李世农关于处理自首叛变分子的

反动指示，将一些应清除出党的坏分子留在党内，造成某些党的組織不純。

（六）反对党的領导，破坏党的团結和統一，阴謀夺取市委領导权

罗霞光很早就有夺取市委領导权的野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与王荣华、史坚背着市委召开会議，搜集市委負責同志的所謂违紀材料，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並与史坚策划要将参加监委的市委常委錢序烈、刘曙两同志去掉，吸收反党分子张林志、王少衡为监委委員，企圖摆脫市委領导。他还到处刮阴風、点阴火，煽动幹部对党不滿，反对党的領导。他对监察幹部說："监察工作可以不通过市委"；对政法幹部說："宪法公佈了，以后案子不要找党委批了，依法办事好了"；对轉业幹部說："地方党不如部队党热情"。

为了实現其政治野心，他与王荣华、杜宏本、史坚等勾結在一起。經常散佈流言蜚語，攻击市委領导核心。他攻击市委"对肃反的領导是掛帅不出馬，虛綫領导"，並与王荣华向右派分子楊效椿告市委負責同志不重視肃反工作的黑状。他更恶毒地污蔑我們党是"上行下效"，"舖张浪费是跟中央学的"。他們对党的領导竭尽攻击污蔑之能事，而他們之間却臭味相投，互相吹捧，互相包庇。杜宏本虛报党龄、伍龄，他和王荣华不仅不向市委回报，反而向市委推荐杜为市委委員和市长。王荣华不服从組織調动以及史坚称市委为"人家"。均得到他的支持。他还与王荣华共謀为史坚翻案，企圖借以污蔑市委对史坚的正确斗爭是"打击报复"，乘机搞垮市委領导。

（七）竭力为史坚翻案，並支持她繼續向党进攻

1.罗霞光与史坚很早以来关系就極不正常，他在北京学習时听说史坚有問題，就唯恐史的問題暴露后会現出自己的原形，因

此，从北京回来后，市委虽不止一次的将史坚指揮监委机关右派集团向党进攻的反党活动向他作了詳細介紹，但他仍不顧党的忠告，与王荣华密謀为史翻案，並多次找史密談，暗示史拒絕交代反党罪行。談話时，史坚又訴苦又抱怨地說："他們（指市委）說监委的人員思想混乱应由我負責，其实我怎么能負責呢？他們的言論又不是我叫他們講的！"罗当即支持說："他們說的当然不能叫你負責，誰說的誰負責，大鳴大放嘛！"

2.他乘市委第一書記和多数委員到省开会之机，企圖通过合法手續放史过关，一面向陈岩同志（市委副書記）提出要研究史的性質，一面再次找史密談，告訴史："家里市委委員連你才六、七个人，明天你在市委会上检查，你的問題总要市委做結論的"。会前，他也不通知在家的几个市委委員，企圖仓促开会，使大家措手不及，将史放过关去。史得到了他的支持，在次日罗主持的市委会議上不仅不老实交代問題，反而繼續向党进攻，引起到会同志極大义憤，而罗却在会議結束时，客客气气的对史說："差不多了，今天大家提的意見很多，希望史坚同志好好的考虑一下"。会后，他还欺騙王宇同志（市委第一書記）說："史坚的检查有了进步"。

3.今年3月，市委召开扩大会議向史坚开展斗爭，史的态度仍極端恶劣。罗不仅不支持同志們对史的斗爭，並一再称史为"同志"。会后，他又找史談話，說："你不能認为怎样检查才能适合大家的要求，大家有大家的分析，你还是自己考虑"，暗示史坚拒絕交代反党罪行。

4.在成立专案小組时，他爭着由他負責，但他領导专案小組后，却按兵不动，拖延斗爭，更换专案人員，調来不熟悉情况的同志整理史的材料，並一再强調："整理材料不要分析批判，不要加帽子，还要加'同志'"。在整理史的材料时，他不着重整理史坚攻击党的方針政策的罪行，反将史坚攻击市委領导核心的言論，不加分析、批判，不分是非的作为主要問題整理，企圖把

史猖狂向党进攻，說成是对个别領导同志有意見。

5.党代表大会預备会議上，他大肆删改史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罪行材料，把史坚反党集团材料上的“反党集团”四字和同謀反党的“同謀”两字划掉，並以“口径不符”为借口，把监委机关右派分子在史坚煽动下發表的反党言論及史坚的一貫表現等許多重要問題的材料全部删去。

（八）一貫坚持反动立場，包庇反革命亲属，破坏反霸、土改运动

罗的父亲是恶霸地主，当过伪县公安局长，在地方敲詐勒索，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罗始終未向組織交代，反而謊称其父是“一貫务农”，“拥护革命”，他家是劳动發家。1945年反奸反霸斗爭中，罗父被斗，他聞訊即連夜赶回，在斗爭大会上威胁群众說：“种谷子吃米，种蒺藜扎脚”，吓得群众一个个离开会場，斗爭会草草結束。1947年土改时，他家五大财产被沒收，他在区委負責同志面前咬牙切齿的辱駡刨他家枣树的积極分子說：“他媽的，奶奶个×的，刨我几棵要給我栽几棵，刨多粗的要給我栽多粗的，还要給我栽活”。这些罪恶，他不但沒有交代，反而污蔑村幹对他家“有成見”，把罪恶加到他家头上，並怨恨党組織对他家“不照顧”。

（九）造伪历史、伪装朴素、欺騙組織、欺騙群众

他参加县委是1944年，却說是1941年。他的剝削思想極为严重，为了牟取錢财，曾于1946年向私商投資做生意；他有300元存款，却到处哭穷叫苦，經常騙取救济，仅1956年就四次騙取救济款达220元；他还侵吞公家派克金笔一支。他对党一貫不滿，多次拒絕組織分配的工作，在蚌埠税务局工作期間，因个人慾望未得滿足，竟公然發牢騷說：“不想幹革命工作了，要回家，已打过几次报告了”。

从上述材料說明：罗霞光是一个混入党內的阶級異己分子，是党內的右派分子。当其反党面目被揭露后，仍百般狡賴，甚至嫁禍于人，最后在鉄的事实面前才承認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罪行。为了純潔党的組織，經市委研究决定，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並报省委批准，将罗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銷其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由12級降为16級）。

中共蚌埠市委員会
关于右派分子王荣华的处分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王荣华，男，三十八岁，山东省沾化县人，恶霸地主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入党，一九四四年二月入伍，历任幹事、区委科长、区書、市委科长、部长等职。現任市委副書記。

据揭發証明，王荣华是罗（霞光）王（荣华）杜（宏本）反党联盟的主帅，其主要反党言行如下：

一、篡改党的肃反方針政策，忠实执行李世农的反党路綫，採取各种手段，寬縱了大批反、坏分子。

1.他忠实执行了李世农关于"必須具备一两条肯定反革命性質的材料，才能作为調查对象"，"調查經費平均每个肃反对象不得超过一百二十元"的反动規定，限制对反、坏分子进行調查。他还批准史堅吸收有严重政治历史問題的人参加肃反領导工作。

2.他与罗霞光一味主张和平談判，竭力取消小組斗争，並与

李波云、史坚共同規定：历史反革命沒有罪恶民憤的不斗；够反革命身份不够处理的不斗；現行反革命不斗；反动党团骨幹不斗；医院不斗；郊区不斗；中教一个不斗；小教尽量少斗。他还亲自"創造"了取消小組斗爭的"經驗"，李世农对此極为賞識，並在全省推广。

3.他以各种方法限制立案，規定："立一案要保証定一案"，立案跟着定案走；"有重大反革命嫌怀的不立案"；"够反革命身份的，只作重点調查，不立案"，並与罗霞光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一次就砍掉了正在审查的专案对象三百零五名（現已定为反、坏分子的五十七名，其余正在专案、复查）。

4.在定案处理中，他除同意李波云、史坚为反革命分子开脫罪責的种种謬論外，还把罪恶昭彰的反革命分子說成是"时間已久，不能定为反革命"；把現行破坏活动說成是"行为不好，不是有意識破坏"，"有不滿情緒，是人民內部教育問題"；把反革命分子杀人、搶劫說成是"奉命执行"、"应尽的职責"；甚至把杀害我八位革命同志的血債累累的反革命分子說成是"在战爭状况下杀人不算罪恶"。他还說过，对不予起訴的反、坏分子保留領导职务和党籍、团籍以及工会会籍，給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並擅自决定保留特务分子张建华的党籍。

5.在复查中，他只查"錯"，不查漏，还与史坚、李波云規定衡量肃反运动健康与否的标准是：只要斗爭对象沒有意見，虽未查出反、坏分子，也是健康；虽查出反、坏分子，但被斗人意見多，就是缺点和錯誤，强要各单位按此标准执行。他們还以种种借口，将送去劳教的反、坏分子下降为"好人"，要回重新安排工作。他不通过基层单位将反、坏分子下降为"好人"，並以掩盖罪恶的手法，强迫基层单位按照他的反动指示，修改对反、坏分子的結論和处理意見，作为单位的意見上报。他积極为不应摘掉反革命"帽子"的反革命分子摘掉"帽子"。他将反革命分子高孟刚下降为"好人"，作为案例，在肃反幹部大会上宣佈，

要下边仿行。他还規定計件工資单位找肃反对象談話，要按时計發工資，並与史坚、李浓云强迫肃反幹部对被他們放掉的反、坏分子賠礼道歉。当幹部反对他这种反动做法时，他就威胁幹部說："思想不通，把你們关起来，斗一斗，換換班子，看你們通不通"。

他还在一九五六年社会鎮反复查时，支持李浓云篡改了省委第四次政法会議的决議，扩大复查范围，硬要下面按百分之二十的"框子"，检查"錯案"。他还指派王少衡、张林志向犯人作"申訴权利"的报告和召开留用犯人座談会，公开煽动犯人翻案。在他們的罪恶影响下，武装民警同犯人握手、敬礼，並召开"犯人积極分子"大会，給犯人戴大紅花，同时，他們对犯人的生活也是关怀备至。

据初步統計，在他的罪恶指导下，寬縱的反、坏分子达五百零五名，其中他亲自寬縱的就有七十名。他在放掉了大批反、坏分子以后，还到处宣揚他所負責的第二、三批肃反运动搞得"好"，污蔑第一批肃反运动斗爭面"太寬"，搞得"人人自危"，"付作用长期不能消除。"

二、反对省、市委反右指示。

一九五七年春，市委对政法部門的严重右傾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評，並指示政法部門严厉打击地、富、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王荣华不仅不执行市委指示，反而与李浓云多次密談，指使李派人向市委要"案子办"，並要李召开会議，搜集反党材料，准备亲自到郊区作反駁市委指示的报告；同时，他又伙同史坚要市委在郊区三級幹部会上大张旗鼓的处理幹部违紀案件，並支持史坚派人收集幹部的所謂违法乱紀材料，企圖以此来轉移对敌斗爭的矛头，配合敌人，把斗爭矛头指向幹部，指向党，指向社会主义制度。省委反右指示下达后，他更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党活动。他到处散佈"蚌埠沒有右傾"的謬論，並亲自召开政法部門負責人会議。会上，他攻击市委批評政法部門右傾"有缺陷"，李浓

云等反党分子群起攻击省、市委反右指示"不符合事实"，是主观主义，並决定成立以张尧先为首的"七人調查組"，到郊区收集反党材料。会后，他还与李汝云分别授意张特别了解地、富、反、坏分子表現"好"的材料。在他們的授意下，张尧先把捏造的材料向他們回报，說地、富、反、坏分子"老实"，"能幹"，"比农民还强"。王荣华認为得到了反党"根据"，責令张立即把材料整理好，准备到郊区作报告。为了把政法部門和监委机关的反党力量匯集在一起，他又指使史坚、李汝云于三月七日召开反党会議。会上，他們匯集了所收集的反党材料，恶毒地攻击省、市委反右指示是"乱贼乱叫"，"不符合具体情况"，污蔑幹部向地、富、反、坏分子进行斗爭是违法乱紀，公开叫囂要向市委"开展斗爭"，要追查市委"責任"，並决定成立"联合检查組"，到郊区进一步搜集反党材料。这时，他們的反党活动达到了最高峰。在他們的縱容和派遣的"調查組"的煽动支持下，城西乡的地、富、反、坏分子組織与煽动落后群众鬧退社，破坏生产，搶劫农业社財产，包围乡政府，毆打幹部，抗繳公粮，气焰極为囂张。在該乡的一百九十名地、富、反、坏分子中，进行反攻倒算、造謠破坏等罪恶活动的即达一百五十五名。

三、煽动和指揮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包庇右派分子，破坏反右派斗爭。

1.鳴放之初，他与杜宏本、胡春华共同策划，利用教育、衛生、工商界鳴放座談会，进行煽風点火。会上，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他表示大力支持，並煽动說："你們放的很好，园地虽小，砖瓦很多，要解决問題，就要靠大家斗，当然是大斗，今天到会的人少，回去还要發动'群众'，一起来搞"。他还煽动有政治历史問題的人說："有历史包袱的人顧虑大，历史問題是过去的事，我代表市委支持你們"，他还把"墙"和"沟"說成是党造成的，並煽动右派分子一起来"拆墙填沟"。

2.当右派分子在鳴放座談会上向党猖狂进攻时，他一面支持

李斌召开市人委党外組长以上幹部鳴放会，向党进攻；一面在监察工作会議上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倍加贊揚，並大肆攻击說：“文教系統座談会的情緒很好，有激动流泪的，这反映我們党員脫离群众”，“不仅以党代政，現在又有以人代党”，与右派分子內外呼应。右派分子吳振林貼出攻击粮食政策和市委書記、市长的大字报，他支持史坚派人去“調査”；以后吳正又乘整改之机，叫嚣要处理市委負責同志，他又积極支持。

3.在市政协会議期間，市委为了組織力量反击右派，提出休会，他与杜宏本、胡春华等竭力反对，主张把会議轉入选举，妄圖把右派分子捧上台。

4.在反右派斗爭中，他主张“和平談判”，不要斗爭。他借口“右派分子排多了”，硬要各单位查“錯”。他把我們对右派分子的斗爭說成是有“个人成見”；把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說成是“思想問題”；並借口右派分子“年輕”、是“老幹部”，把右派分子下降为“好人”。他把右派分子划为“中右”，作为案例，要下面仿行。他还散佈“反动言論的根源是三个主义”，右派分子有“两面性”等謬論。在他的罪恶指导下，寬縱了許多右派分子。

5.他包庇右派分子史坚，並为其翻案。大鳴大放中，他支持史坚向党进攻。反右派斗爭开始后，他說监委机关“沒有右派”，“都是思想問題”，並指使史坚佈置监委机关的右派分子参加反右派斗爭，以掩护退却。当史的反党面目暴露，停职反省时，他仍要史参加监委会議，与罗霞光密謀，为史坚翻案。他还与胡春华共同包庇右派分子林志仕。

四、反对党在城市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方針。

他不仅不圍繞工业生产中心安排和佈置工作，还攻击市委“偏工业”，並在幹部中灌輸反对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思想，一九五六年市委决定在第九次党代会上，进一步貫徹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等方針，他与罗霞光、杜宏本、李斌、吳正等不仅公开反

对，並在背后大肆攻击。他还利用分管組織部門的职权，拒絕执行市委增設工业組織机构和配备幹部的决定。去年大鳴大放期間，他支持监委机关右派分子画市委“头頂工交部，怀抱办公室，手挽組宣部，財貿部扯着衣襟，监委被抛在一边”的反党漫画。他还乘整改之机，一面指揮李斌召开市人委科、局长以上幹部鳴放会，攻击党的方針政策；一面擅自召开市委科长以上幹部鳴放会議，带头攻击市委領导核心“工作乱，照顾全面工作不够”，在他的煽动下，吳正等也就一拥而上，攻击市委領导“光抓中心工作，顧此失彼”，妄圖再度掀起反对党在城市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反党高潮。

五、反对党的領导，破坏党的团結和統一，阴謀夺取市委領导权。

王荣华窃取市委領导权的野心是很早就有的。在他任市委組織部副部长期間，即公开宣称“組織部比别的部重要”，“組織部的幹部比别的部幹部高”。在他任市委副書記期間，又不止一次地煽动幹部反对市委。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杜宏本向王宇同志推荐他任市委第一書記，並将推荐情况告訴他，他極为得意，此后，更到处抓权，打击别的書記，炫耀自己，工作中常常摆出第一書記的架子。

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他与罗霞光、杜宏本、史坚、吳正等勾結在一起，經常散佈流言蜚語，攻击市委領导核心，他污蔑市委工作“乱得很”，“全市什么工作搞好了？！”去年大鳴大放中，右派分子攻击市委領导核心，他極为得意，並加以支持。他与罗霞光、史堅背着市委召开会議，收集市委負責同志的所謂违紀材料；一九五六年，又与罗霞光向楊效椿告市委負責同志的黑状，企圖搞垮市委領导。

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他經常与罗霞光、杜宏本等互相吹嘘捧場，以扩大影响，騙取群众信任。杜宏本謊报党龄、伍龄，他和罗霞光不但不向市委回报，还向市委推荐杜为市委委員和市

长。他还多方設法培植亲信，扩充反党势力，对一些政治不純分子，蛻化变質分子，自首变节分子，阶級異己分子，甚至反、坏分子，他几乎都視为知己，加以重用。杜宏本、李浓云、史坚、胡春华、吳正、李斌等参加市委，担任要职，都是他和罗霞光竭力推荐的。他把一貫反党的郭华提为市妇联副主任，並准备将其提为副市长；他把反党分子张尧先提为市委政法部科长，还准备将其提为公安局副局长；监委机关右派集团的成員几乎全是他和罗霞光、史坚一手培植和提拔起来的。为了培植亲信，他还到处封官許願，私送級別，腐蝕幹部。他对审幹幹部說："我了解你們，提职不好提，可以晋級"；对肃反幹部說："肃反工作結束后，你們不願回原单位，可以調动工作或調去学習"；对組織部幹部說："我們也来个大胆大量提拔，大家都提一級，皆大欢喜"。当某些幹部由于他的許願未兌現而表示不滿时，他即說："我在市委会議上已提过了"，煽动幹部反对市委。

此外，他还反对党对合营企业和学校的領导。私改高潮后，他和罗霞光、杜宏本、胡春华、李斌共謀撤出公泰酱醋厂的公方代表，把一貫反对党的領导的資本家由副厂长提为厂长。在大鳴大放中，該厂的右派分子叫嚣"要把公方代表送去劳改"，並捏造事实陷害党員股长，他支持吳正将党員股长停职反省，並亲到該厂参观大字报，表示支持。杜（仲和）孟（子厚）反党联盟阴謀赶走党員校长，夺取党在学校的領导权，他伙同胡春华極力支持，共謀要把党員校长刘华同志調出一中。

六、篡改建党方針和幹部政策，污蔑党群組織。

1.他和罗霞光忠实执行李世农"先整后建"的反党方針，並将中央"积極愼重"的建党方針，篡改为"大胆、积極而愼重"的反动方針。他們还忠实执行李世农关于处理自首变节分子的反动指示，把一些应清除出党的坏分子留在党內，将叛徒重新拉入党內，造成党的組織不純。他还修改审幹結論，将潘厚清"叛变分子"的結論，改为"自首分子"。

2.他和罗霞光篡改“德才兼备”的幹部政策，他說：“什么称职不称职，提起来就能用”。他污蔑我們提拔幹部有“宗派主义，党員考虑多，非党員考虑少”。他还公开辱駡老幹部“佔着茅厕不拉屎”，說：“井崗山的騾子老，还照馱大炮”。

3.他污蔑党、群組織，說：“国民党組織部和我們組織部一样，是个特务机关”，“工会、青年团要不要都可以，就是关几个月的大門也出不了多大屁漏”，“机关工会就是多收几个会费，沒有作用”。

七、一貫堅持剝削阶級立場，破坏党的政治运动，貪生怕死，品質恶劣。

1.他出身于恶霸地主汉奸家庭，卻一貫欺騙組織，謊报中农出身。

2.一九四六年土改时，他指使家庭分散土地，逃避了群众斗爭。在反奸斗爭中，他污蔑运动“过火了”，竭力包庇其汉奸和恶霸地主的伯父和堂祖父。他反对群众对地主恶霸进行斗爭，主张和平分田，他对“三查三整”运动也極表不滿，認为运动搞“左”了，“只整本地幹部，不整外来幹部”，“平时工作越积極，錯誤就越大，不工作的倒变成了积極分子”。

3.一九四二年环境艰苦时，他背着組織，做投机生意两年多，並为日寇包攬税收。在反特斗爭中，环境稍一紧张，他就貪生怕死，悲观失望，大吃大喝。以上这些丑恶历史，他从未向党交待。

4.他的个人野心極为严重，对組織分配的工作，不能滿足其私慾时，就拒絕不去。他的品質極为恶劣，入城后，喜新厭旧，不顧党紀国法，竟在女方怀孕期間，誘逼离婚，后来，又利用职权，挖別人墙脚，与林放結婚。他还貪污派克鋼笔、手表等物。

綜合上述：王荣华是一个有严重反党罪行的右派分子。当其反党面目被揭露后，态度極不老实，借检討为名，繼續向党进攻，經过斗爭，才被迫承認了他的反党罪行，但在某些关鍵問題

上，仍百般掩飾和狡辯，企圖減輕罪責。为了純潔党的組織，严肅党的紀律，經市委研究决定，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並报省委批准，将王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其党籍，撤銷其原有职务，监督劳动。

中共蚌埠市委員会
关于右派分子杜宏本的处分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杜宏本，男，三十五岁，河北省宛平县人，反动富农出身，学生成份。一九四〇年五月入伍，一九四一年一月入党。历任譯电員、科員、科长、局长、副市长等职。现任市委副書記兼市长。

据揭發証明，杜宏本是罗（霞光）王（荣华）杜（宏本）反党联盟的主帅，其主要反党言行如下：

一、有組織有計划地煽动和指揮右派分子疯狂向党进攻，包庇右派分子，破坏反右派斗爭。

1.他与王荣华、胡春华共同策划，利用召开教育、衛生、工商界鳴放座談会的机会，进行煽風点火。会上，他带头攻击党的很多工作都是“上了馬下不来”，“不符合实际”。右派分子在他的煽动下放了很多毒箭，他不仅竭力支持，並与右派分子一唱一和向党进攻。右派分子攻击党員校长“不懂业务”，是外行，他說：“是外行，有的要調动，有的就是要处理”；右派分子攻击我們提拔和使用技术人員不当，他說：“提拔技术幹部应由技术人員来衡量”；右派分子攻击我們宗派主义严重，他說：“宗派主义是很严重，不仅学校里有，到处都有”；右派分子丑

化党、团員，他說："党、团員問題很大，有的是为了升官發財"。为了进一步煽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他还号召右派分子"要拿出幹劲来"，"要大胆、勇敢、經常不断地进行斗爭，沒有斗爭就沒有权利"。他还指使李斌在市人委召开党外組长以上幹部鳴放会議，向党进攻。

2.在他們的煽动下，一小撮右派首腦更加猖狂，認为时机已到，在政协会上向党發动了总攻，他喜形于色，与右派分子拉拉扯扯，亲如兄弟，將自己的放大鏡贈給極右分子杜仲和，卑躬屈膝的向極右分子陈天任請教，甚至以实际行动支持右派分子的进攻。

3.当引妖出洞时，他唯恐右派分子暴露面目，迟迟不在市人委作鳴放动員，相反对陈岩副書記去市人委动員鳴放，表示不滿，並示意王瑞九等右派分子不要鳴放。市人委有些局长与右派分子一起向党进攻，他指示李斌說："要給他們漏点底"。他領导郊区鳴放时，对区、乡幹部不仅不作鳴放动員，反暗示写大字报的同志"不要写走手"，企圖破坏郊区鳴放。在市政协会議期間，市委要繼續深入鳴放，他以"放的差不多了"为借口，与胡春华一起竭力反对。当市委为了組織力量，进行反击，提出政协休会时，他和王荣华、胡春华又一再反对，妄圖通过选举，把右派分子捧上台，並和胡春华在背后污蔑拥护市委正确主张的同志是"个人崇拜"。

4.在反右派斗爭中，他又寻找种种借口，为右派分子开脫罪責。如张立之恶毒地污蔑毛主席和党中央，他借口张"年輕、历史清白、是为了带头鳴放"，与李斌为其辯护，甚至与胡春华密謀为其翻案。他还把陈天任露骨的反动言論說成是"不明显"，当市委确定陈为斗爭对象时，他說："完全推想不一定好，我看不一定搞"，企圖包庇陈过关。当陈的反动言論受到公开批判后，他仍指定陈担任在蚌埠召开的全省体育运动大会筹委会副主任。

二、反对党的領导，破坏党的团結和統一，阴謀窃取市委領

导权。

1.拒絕党的領导。他任市商业局长时，与吳正一起公开攻击“有商业党委事情倒不好办了”。他任市长后，污蔑市委“以党代政”，說：“市委分口抓工作，市长要失业了”，並公开提出要撤銷市人委党組，妄圖取消党对政府的領导。

2.为了窃取市委領导权，他攻击市委“幹不出一个名堂来”，“不能解决問題”，並与罗霞光、王荣华、李斌、胡春华散佈流言蜚語污蔑市委領导核心。他們之間却互相吹捧，他吹嘘罗霞光“思想品質好”，“能抓住主要工作”，向罗取宠。他又吹嘘王荣华“掌握政策較稳”，甚至向市委推荐王荣华当第一書記，並将推荐情况告訴王，向王献媚。

三、反对城市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方針。

1.他公然主张以商业为中心，說什么“我們市里主要是商业問題”。一九五六年市委决定在第九次党代会上进一步貫徹城市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方針，他与罗霞光、王荣华、李斌等一起竭力反对，並公开提出“农业”和“改造”是主要問題，以此与党的正确方針相对抗。他还公开煽动財貿幹部不要当“被告”，“不要泄气”，“要主动将工业部門的軍”。李斌恶毒地攻击市委“处理工商关系偏心”，“小公挤大公，地方挤中央”，他也竭力支持。

2.他与罗霞光竭力阻挠和破坏工业建設，反对兴建蛋厂和鞋厂。市委决定兴建鋼鉄厂，他背后反对說：“这东西就是王政委兴趣大”。他在市人委党組会上，从不研究工业生产問題。他在分管財貿工作期間，不仅不围繞工业生产中心佈置和安排工作，反而与李斌勾結在一起，利用职权，拒絕将地方財政收入投資于工业，阻挠对工业原料的供应，拒絕推銷地方工业产品。如他支持专卖公司使用放大鏡检驗紙烟上的斑点，用手向左右各撑四十五度检驗紙烟搭口，拒絕收購东海、蚌埠两烟厂的产品，迫使两厂将已制好的香烟撕碎重制，国家損失达一百六十多万元。当市

委制止时，他又与李斌共同指使专卖公司江萍（右派分子）收集所謂質量不好的材料，並亲到烟摊专門收集"坏"的反映，攻击市委。他还公开主张将包銷改为选購。

四、污蔑和攻击农业合作化，破坏农业生产改革，取消农村两条道路的斗爭。

1.他与罗霞光一起攻击农业合作化搞的太快了，他說："沒有經过互助組，直接到了高級社，不好巩固"。他还污蔑合作化后，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極性"被大水冲走了"，並指示郊区幹部"退社可以掌握百分之五"。

2.他在分管郊区工作期間，由于拒不貫徹农业"三改"指示，致使河北两乡的稻改面积，由一九五六年的六千五百亩縮減为二百五十七亩。他还支持城西乡的地主、富农反对种植高产作物，並批評乡幹部佈置种玉米（高产作物）不对，以致造成旱田減收，稻田荒蕪三千余亩。

3.他拒絕执行省、市委反右指示，阻挠幹部对地、富、反、坏分子进行斗爭，並說："不能採取这种措施，靠斗爭不能解决問題"。

4.他积極發展农村資本主义势力，支持农业社和社員开飯店、打蔴繩、販卖生猪，从事商业投机活动，仅淮滨农业社做生意的即达三百五十余戶之多，造成部分生产队牛死、地荒、粮食減产。当时农村就編出了这样一首歌謠："繩車一响，黄金万两，佳木斯走一趟，犁耙掛墙上，佳木斯走一走，吃穿不用愁"。

5.非法取消粮食統購，擅自放宽粮食統銷，破坏粮食統購統銷政策。他对一九五七年統購任务不作分配，同年四、五月份，地、富、反、坏分子叫嚣粮食不够吃，他不但不組織区、乡幹部發动群众开展斗爭，反而增拨粮食三十四万斤，不分对象地扩大粮食供应面，以致造成部分社員瞞产私分，粮食黑市交易。

五、篡改私改政策，取消党对合营企业的領导，竭力維护資

产阶級利益。

1.他为資产阶級吹嘘說："蚌埠市工商界根本找不到同意定息二十年的"，並散佈阶級斗爭熄灭論，說："合营后职工与資本家的关系主要是合作共事关系"，对資本家"决不能开斗爭会"。

2.在清产核資中，他与罗霞光、胡春华一起将財产估价尽量高估，对一些应登記的財产不予登記，把高潮前查获的隐藏物資当作增資退还。

3.在人事安排上，他与罗霞光、胡春华只安排資本家，不考虑对职工的安排和提拔，在棉布、百貨等十五个合营总店的經理、副經理中，資本家有三十人，职工仅有三人，甚至把資本家中的一些反、坏分子也安排了領导职务，他說："明天逮捕，今天也要安排"。据初步統計，被他們安排为領导职务的反革命分子有十人之多。

4.反对公方代表制。他宣称："沒有公方代表也照样搞好工作"，並和罗霞光、王荣华、胡春华、李斌共謀撤出公泰醬醋厂的公方代表，把一貫反对党的領导的資本家何近仁由副厂长提为厂长，因此何更为嚣张，公开叫嚣"看誰斗过誰"，並与几个資本家同謀繼續向党进攻，說："非把几个党痞子赶出去不可"。此外，杜宏本还煽动資本家要"向国营企业开展斗爭"。

六、放松市場管理，縱容不法奸商投机活动。一九五六年冬到一九五七年秋，郊区生猪被不法奸商搶購一千七百余头，一九五七年一、三季度查获販卖粮票、布票及油料等統購統銷物資八百十三起，他对这些违法行为，一再放任不管。他对奸商俞維模等乘市場元竹缺貨，抬价出售，获得暴利一万余元的投机活动，也一再縱容，迟迟不予处理。

七、堅持反动立場，寬縱反、坏分子，包庇反动家庭，隐瞞历史，欺騙組織。

1.他利用职权，多方寬縱反、坏分子。如反革命分子韦植

中，曾向敌人密报我地下党員严繼成同志，致严遭敌杀害。一九五四年韦被捕归案，杜竟以严“年輕，不可能是共产党員”，“是特务內部玩花样”等为借口，将韦犯释放，並責令原单位（邮局）安插工作，补發工資一千二百四十元。又如严重破坏粮食計划供应的魏庆华，检察院要提出公訴，而杜宏本却指示在群众中进行教育，不予起訴和判刑。

2.他出身于反动富农家庭，其父参加过特务活动，他在土改前指使家庭卖地，当土改中家庭被扫地出門时，他汚蔑“土改过火，幹部打击报复”。他参加土改复查工作时，給了地主、富农不少土地。

3.虛报伍龄、党龄。他是一九四〇年五月入伍，說成是一九三九年六月，他是一九四一年一月入党，說成是一九四〇年一月。

4.他一貫热衷于个人名利，对組織分配的工作，不能滿足其私慾时，就表示不滿。

以上材料証明：杜宏本是党內的右派分子。当其反党面目被揭露后，仍避重就輕，态度很不老实，經过斗爭才被迫承認反党，但在某些重大問題上，交待仍不徹底。为了純潔党的組織，严肃党的紀律，經市委研究决定，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並报省委批准，将杜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其党籍，撤銷其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由十二級降为十七級）。

中共合肥师范学院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兆甲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张兆甲，曾用名赵明，男，现年37岁，河北省曲阳县人，家庭出身富裕中农，本人成份学生。1938年1月参加工作，1939年8月入党。曾任村长、小学教师、小学校长、县民教法副科长、专署文教科督学、副科长、科长、师专校长兼党委第一書記等职。

张兆甲趁党整風之机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事实如下：

（1）勾結党內外右派分子，煽动群众鬧大民主，恶意攻击教育厅。整風运动之前，张兆甲一貫散布攻击教育厅的言論，說："既叫我当校长，又不信任我，事情真难办"；並造謠說："教育厅把师专的基建材料拿到合肥师院去了"；"教育部撥給师专的款子給教育厅扣了"等，致使不少党团員和教职員受他影响，对教育厅怀有不滿情緒。1957年4月省政协开会期間，张兆甲违背省委指示，指使沈兴芷（右派分子、民盟省委候补委員、师专支部主委）在政协会上，以师专經費困难問題攻击教育厅，污蔑教育厅不信任师专領导。1957年5月省委召开宣传会議，张提出："我校和教育厅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又謾罵教育厅是"外行"，"官僚主义思想指导"等，激發到会人員摆教育厅和师专的矛盾，把斗爭的矛头指向教育厅。会后，又指使蔡善琦（党員）向沈兴芷找材料写稿，並亲自修改后投安徽日报。王尙英（党員、右派分子）發起写稿投光明日报，恶毒的攻击和謾罵教育厅张也知道，学校开始鳴放后，田建城（学生、右派分子）

贴大字报駡"共产党一党专政，共产党不民主"。张兆甲說："詞句有毛病，精神是好的"。6月3日批准王容、王顺禧（助教）写信要教育厅长来师专听意見，發动教职員签名。6月4日张兆甲带着签名信誆騙教育厅副厅长居蓍明同志到校挨斗，並曾企圖誆騙省委負責同志到校未成。朱建华（党員、右派分子）带領学生去省委和教育厅請願，张不加阻止，张批准了右派学生組織的"呼吁委員会"印發呼吁書，还說："大民主、小民主目的都是为了学校，在小民主不能解决問題的情况下，只有允許大民主"。造成学生罢課一天半。学生鬧事平息以后，6月8日第二次誆騙居蓍明同志来校参加职員座談会，坐視沈兴芷謾駡教育厅达二小时之久。沈兴芷划为右派分子后，张兆甲怕暴露自己的反党活动事实，便利用职权，以"爭取"沈兴芷"起义"为名，阻碍斗爭的开展，並採取两面手法，一面向省委作假报告，欺騙領导，說：沈交代的好，一面謊說省委負責同志指示：对沈的斗爭要"适可而止"。对于右派分子朱建华、王尙英等人，也一貫包庇，一直到省委派来检查組以后，才把他們揭露出来。

（2）破坏党內团結，制造党內分裂。拉攏一部分人，陷害一部分人。张兆甲来到师专以后，作風極不正派，独断专行，封官許願，培植亲信，曾二次提出要朱建华、王尙英参加党委和整風領导小組，省委未批准，张兆甲则标新立異，个人批准朱建华、王尙英为"固定的列席党委"。並曾企圖将沈兴芷拉入党內。另一方面，由于他和程宇、馬数鳴两同志關不团結，乘反右派斗爭机会，对右派分子吳孟复採取逼压、提示的卑鄙手段，誘导吳孟复制造假案，誣称以程宇同志为首組成反党集团，誣称馬数鳴同志是該反党集团的幕后指揮人（反党小集团問題已經省委派丁明志同志等調査，馬、程确有錯誤，但张故意夸大事实）。张又向省委謊报李运新（党員助教）是叛党分子。以上事实說明张兆甲打击陷害同志的手段十分恶劣，性質十分严重。

张兆甲进行以上一系列的反党活动，不是偶然的，是有他的

思想根源的。1949年他由专署文教科督学被提升为副科长时，因未提为科长而表示不滿意。1952年对評級也不滿意，竟撕掉評級通知单，后来提升一級仍不滿意，並說："我是水涨船高，得寸进尺"。1949年南下后曾两次屯积大米、菜油做投机生意，自私自利从事牟利等。說明张兆甲虽然参加党已經18年，但沒有接受党对他的教育，严重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不仅沒有得到徹底的改造，相反地是一直滋长發展，由对党不滿，走上了反党的道路。

根据以上张兆甲进行反党活动的事实，情节極为严重，使党的事业受到了严重的損失。在党內外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为了严肃党的紀律，純潔党的組織，經党委研究决定並經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张兆甲的党籍。

中共安徽省委
关于右派分子夏际霞的結論意見

（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

夏际霞，男，現年四十四岁，江苏省睢宁县人，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八年五月入伍，同年七月入党。历任县委副書記、县委組織部长、地委幹部科长、組織部副部长、矿区党委組織部长、矿委农委書記、矿場党委書記兼矿长、矿务局副局长、局长。現任：中共淮南市委書記处書記、淮南矿务局长、安徽省人民代表、淮南市人民委員会委員。

一、主要反党罪行

1、一貫利用职权，在党內进行非組織活动，培植个人反党

势力，攻击市委領导核心。1956年秋工資改革期間，他为了煽动煤矿幹部反对市委，故意违反中央工資改革政策，一手制定了普遍超过中央規定的工資改革方案，並擅自發放了科区以下幹部的补發工資。当市委批評他的錯誤，和不同意他矿、处长以上幹部的工資改革的錯誤方案时，他就施展其事先策划好的“市委不同意，我就有話說了”的阴謀，污蔑市委对煤矿幹部的工資是“死揿”、“硬压”，恶意造謠挑拨說：“地方幹部工資比企业幹部工資高了”，又說什么“幹部工資收入提高了，我受批評了”，“只要工資提上来，受些批評也是好的，对大家有好处。”致在煤矿不少幹部中造成“局长是想照顧我們的，就是市委不同意”的对党严重不滿情緒。

2、以他为首組織反党集团，在1956年反党集团結成后，就伙同他的爪牙錢明道、韦潔滋用“黑头状子”这一卑鄙阴险的手段，捏造事实，連續八次向中央和省委誣告市委，污蔑党的幹部政策，攻击市委領导。为使中央和省委所謂“加深印象”，相信他們所誣告的材料，他还有計划地指使其爪牙多次向省委負責同志口头“反映”，並两次密謀向中央政治局写信进行进一步誣告。

3、1957年夏，大放大鳴期間，他依仗着党外右派向党进攻的声势，暗設反党司令部，利用职权盜窃党的重要机密，指揮其爪牙大举向党进攻。囑咐其爪牙們写攻击市委的大字报不要一次写很多，只要“一次写一张，多写几次”並要其爪牙不要亲自写，而指揮和煽动落后青年去写，說：“小青年火气大，只要有材料他們就会幹”。“不管什么一起貼出去，反正他們（指市委）不能一一解释”。为了更好的指揮向党进攻，他亲自出馬，搜集反党“材料”；与此同时，他还一手制造了煤矿建井公司工人鬧事事件，煽动工人反对市委，並与錢明道密策唆使某坏分子去奸污市委組織部某負責同志的爱人，以人身攻击、政治陷害、双管齐下的卑鄙手段来中伤市委負責同志，妄圖趁机将党搞臭搞垮，一

鼓夺取市委領导权。

4、反右派斗爭开始后，他污蔑市委組織反击右派是“火烧到自己身上（指他的同伙污蔑市委的大字报）就痛了”，反右派斗爭进入紧张阶段，他又千方百計地与其爪牙訂立攻守同盟，积極組織退却，企圖保存反党实力。当他在北戴河“休养”期間获悉錢明道已成右派时，便散布煙幕和进行污蔑說：“也不过是向領导提提意見，就成右派了嗎？”“看市委将来怎么做結論。”在从北戴河回来的路上，以及在回到淮矿的当天，到处探听斗爭錢明道的消息，妄想挽回残局，待机反扑。

5、曾数次按其反党意願，与其爪牙、心复謀划調整煤矿負責幹部，企圖爭取党內多数，篡夺党的領导，改变党的性質。

6、到处拉攏对党不满分子和落后分子，公开进行挑拨煽动，在市委和常委內部划圈圈，拉攏一批，打击一批；对市委決議一貫採取当面同意背后反对的两面手法，把矿务局当作他的独立王国，与党分庭抗禮。

7、敌視社会主义，响往資本主义。他誣蔑領导幹部参加体力劳动是“劳动改造”，攻击国家稅收是“苛捐杂稅”；誹謗統購統銷是“不讓人民吃飽飯”。污蔑粮食出口政策是“做人情”“打肿脸充胖子”；並疯狂叫囂“非再来一次革命不可”。他对封建帝王和地主資产阶級的糜烂生活極为响往，公然說：“到了北京想当皇帝，到了上海想当資本家”。他完全象資本家一样把工人当牛馬看待，公开辱罵煤矿工人“下井象牛样，上井象馬样，幹活象猪样，开支象虎样。”，他平时生活腐化，道德敗坏，虐待子女，玩弄女性。

8、挑拨中苏关系，誹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謾罵苏共中央負責同志。

9、长期隐瞞反动富农成分，包庇富农家庭；先后将其有重大罪恶的胞弟（現当地政府已初步确定其为坏分子，准备处理）和族叔（已判过刑）拉进革命队伍来予以庇护。在解放战争紧张

关头，他身为县委副書記，竟貪生怕死，退却逃跑，並强令区乡幹部各自逃命，甚至公开提出可以投敌自首。

二、斗爭中的态度

經过深入揭發和多次批判，在大量事实面前，虽然被迫承認了一些反党罪行，但在許多关鍵問題上吞吞吐吐，躲躲閃閃，避重就輕，推脫責任，无悔改誠意。

三、处理意見

右派分子夏际霞反党罪行是严重的，且在斗爭中态度不好，但他对煤矿生产管理尚有一定能力，省委意見按三类处理：开除党籍，撤銷原有一切职务，留用察看。待遇由11級降为16級。（已經中央批准）

中共同济大学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薛尙实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

薛尙实，男，五十六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二八年入党。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期間曾任江苏省委秘書处秘書，上海总工联党团書記，全总华北办事处党团書記等职。抗日战爭期間曾任福建、浙江省委組織部长，阜东县县委書記，苏北区党委敌工部长等职。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任苏北盐阜地委、胶东区党委宣传部长，青岛市委副書記等职。現任上海市委委員、同济大学校长、党委書記。他一貫摆老資格，目无組織，埋怨党沒有重用他，而对党不滿在同济大学工作期間，公然反抗党的領

导，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

（1）攻击市委的领导是“饒漱石不管高等学校的余毒沒有肃清”，“大家的积極性之所以不高，关鍵是由于領导一团糟”，“領导压制批評……一不理、二打击、三放冷箭”。攻击学校工作在“市委前学校工作部时期，有三大混乱，即組織混乱、思想混乱、政策混乱”。他並以極端猖狂的态度，抗拒中央高教部的領导，当高教部根据周总理指示派检查組到同济大学检查工作时，他两次在建筑系召开党团員大会，动員他們“站稳立場，統一思想”来抗拒中央高教部的检查。

（2）站在敌对立場，反对党的各項基本方針、政策，否定历次运动的成就。他經常叫嚣“全面發展，因材施教的方針不明确，糊里糊塗，我們无法工作”。攻击“三反是‘反三’——反党、反团、反校长”，“肃反沒有政策，繼續了三反时的左傾冒险”，“肃反問題很严重，违反知識分子政策，搞得笑話百出，党內混乱不堪。”在肃反运动开始时，領导强調要反右，而他却坚持反左，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他又积極支持右派分子向肃反的同志“算賬”。此外，他还污蔑党的工資政策，說：“助教的生活无法过，小孩害病无处看，……工友生活不下去了。”他还散布“英、法出兵打埃及是由于苏联出兵干涉匈牙利內政所引起的”等反动言論。

（3）在鳴放期間，縱容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行猖狂进攻。右派分子叫嚣“外行不能領导內行”，他就积極主张要教授治校，並拟定了教授治校的具体方案（連人事处长、办公室主任都要資产阶級教授担任）。右派分子煽动要考政治課和肃反对象向党反攻，要看肃反材料的时候，他都一概予以答应。当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反击右派分子对教育向工农开門的方針的攻击时，他却公开加以阻撓說：“你們不要管，不会鬧到速中門上来。”在他的縱容、包庇下，同济大学仅結构系、建筑系新划的右派分子就有二十九名之多。

（4）培植个人势力，进行宗派活动，分裂破坏党的团結。他在高教系統中拉攏对党不滿分子，对抗党的領导。在学校中則拉攏刘准、李强、馬毅民等一批政治上有問題、历史不清的分子結成小集团，打击和陷害那些“不順手”、“合不来”，敢于批評他的人。經查明，因曾經对他提过意見，而被加以“反党”“反領导”“右派”“反革命”等莫須有的罪名受到打击者即有十余人之多。在建党中把一些面目不清、品質恶劣、对党不滿的分子拉到党內来培养个人势力。

他长期以来就借口血压高，到处游山逛水，在同济大学五年，实际只做了一年的工作，但經常打麻将牌、看黃色小說到深更半夜。政治上已經完全堕落变質。

上述大量事实証明，薛尙实是一个有严重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右派分子，經市委扩大会議高教小組等二十多次会議的斗争，在大量人証物証和确凿的事实面前，仍然頑抗抵賴，並污蔑同志，态度十分恶劣。为了純潔巩固党的組織，决定开除薛尙实的党籍，並撤消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工作，級別由八級降为十一級。

（已經中央批准）

中共上海市妇联支部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赵先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八日）

赵先，女，四十三岁，城市貧民出身，学生成份，自称一九三三年参加共青团，一九三四年轉党。抗战前曾任溧阳共青团妇委負責人，上海左翼文化联盟工人夜校教师。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間，曾任上海临时妇委委員，华中局組織部幹事，一九四

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五月曾任华东局城工部組織科科长。解放后任上海市妇联組織部部长，妇联副主任、主任、妇委副書記、書記。

其主要反党事实如下

（一）污蔑、反抗市委的領导，把妇联当成独立王国。一九五三年市委分工由赵明新同志联系妇联工作，赵先認为："赵部长不信任我，不是我的老上級"。当黃庆熙同志分工联系妇联后，赵挑拨說是"大委員領导小委員"。一九五四年市委派楊純、关鍵同志去妇联工作，她說："她們是党委信任的幹部，是来整我們的"，排挤、打击关鍵同志。一九五六年市委为了加强妇委的領导，派郭建同志担任妇委書記，她更加不滿，狂妄地說："我这个書記还未撤职，妇委書記、妇联主任是中央管理的幹部，应由中央批准。"並擅自修改曹荻秋同志在"三八"节紀念会上的發言稿，将"市委为加强妇女工作，派郭建同志担任妇委書記"一句删掉。当郭建同志传达柯庆施同志对妇女工作的指示时，她冷笑說："嗨嗨，这三点指示很好啊！为什么历年来沒有向我指示过！"公开声称："我与郭建无个人恩怨，我是借題發揮对市委的不滿。"一九五六年选举市委委員时，她公开向党伸手，想当市委委員，因未列入候选人名单，即挑拨、煽动妇联同志說："妇联这么多老幹部，那个不能当市委委員，我看××就能当。"

（二）包庇王尧山，进行反党活动，她对党审查王尧山（赵的丈夫）極为不滿，污蔑"市委对王不熟悉"，审查是"莫須有"的，她强辯說："我与王尧山共同生活了二十二年，我相信他政治上純潔和对党忠实，正如相信我自己一样。"並公开支持王尧山向党反攻。当陈丕显同志严肃地指出她这种錯誤时，她非但不接受批評，反以極端狂妄的态度公然对抗。市委准备分配王尧山下厂工作，她說："問題未解决，工作是做不好的。"公开支持王尧山抗拒組織的分配，要市委給王做結論和賠礼道歉。並挑拨

党內关系，煽动别人对党不滿。妇联某同志的丈夫被审查，她就挑拨說："你的爱人傻瓜，不会休息休息，沒有結論不要去工作；审查沒有問題，不該調动工作。"

赵先还到处喊冤告状，歪曲党內生活，攻击市委。在她一九五六年七月写給陈毅同志的"控告"信中說："我最感痛苦的事情是因王尧山的关系政治上被打了問号，政治上不保险……，一年多来在被人猜疑中过生活，我受不了。"又說："此刻，我只有一个体会，党內談民主仍旧不容易！"对党極为不滿。

（三）攻击肃反运动，同情、支持反革命分子。肃反时她未参加专門小組，未做接待外宾工作，內心更加对党仇恨，責問："为什么不要我参加专門小組"、"为什么忽然停止我对外的一切工作？"对肃反採取消極对抗，冷眼旁观的态度。潘汉年反革命案件揭露后，她認为肃反扩大化了，並說："斯大林老头子，死了也要被人反"，污蔑妇联机关肃反是"浪费人力、物力、財力"，攻击肃反幹部"有邀功思想"，叫嚣"肃反批判面广了，思想斗爭与政治斗爭分不清"，認为"反革命抓多了，反革命家属也多了，給妇联工作增加了麻煩"。在反右派斗爭中与右派分子同病相怜，說："这些人（右派）交代沒有个底，怎么叫交代徹底，怎么叫不徹底。"

在整風过程中，从揭發了她的反党活动后，态度十分恶劣，党对她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和耐心教育，但她始終避重就輕，不承認反党罪行，坚持說同志們对她的揭發批判是"污蔑"、"混战一場"，說材料是捏造的"硬凑的"，气焰極为嚣张，进行反击狡辯，毫无悔改之意。

以上事实說明，赵先自参加革命后，虽經党二十余年的培养教育，但由于極为严重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發展到污蔑、反抗市委，向党鬧独立，进行反党活动，並攻击肃反，已完全墮落成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为了純潔党的組織，本支部决定开除赵先的党籍，並建議撤消其原有一切职务，留用察

看，由十一級降为十五級。

（已經中央批准）

中共上海市財政局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朱如言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朱如言，男，四十六岁，家庭出身小土地出租者，本人成份教員，一九三九年五月入党。曾任苏南区无錫县財經科长、太滆地区貨管局局长，山东省財政厅秘書、济南市財政局副局长，上海市財政局、税务局副局长等职。原任上海市税务局局长。整風运动中，朱如言暴露了一系列的反党言行。

（一）煽动放火，积極支持右派向党进攻。一九五七年五月初，部分基層单位正在"鬧事"，朱就擅自召开分局长会議部署大鳴大放；繼則又連續召开市、区两級税务机关非党幹部座談会，煽动他們大胆鳴放，大胆揭露矛盾，带头向党进攻，並将会上所有的反党言論連續地在"税务通訊"上發表，致使反党毒焰迅速燃遍了整个税务系統，有的单位在反党分子的煽动下，竟准备上街游行，进行反党"示威"。当市委指示"稳定基層"时，朱拒不执行，反而召开党、政、工、团、民主党派联席会議，繼續發动大鳴大放，火上加油，他还要大家向市税务局全体工作人員进行广泛传达，並要求税务分局也採取同样的形式領导鳴放，唯恐天下不乱。当轉入反右斗爭时，他却托病去太湖等地休养（二个半月）。回来后則又强調："現在的任务是向自然界作斗爭"，企圖轉移斗爭目标。

（二）否定"三反"运动成績，攻击市委領导。正当右派分

子猖狂进攻的时候，他在党內会議上說："三反运动是把內部矛盾当作外部矛盾处理了。"在民革支部大会上說："我們在完成阶級斗爭过程中，有很多教訓，……税务局的教訓是严重的，有些甚至是慘痛的。"直到反右时，还說："三反逼供信严重，有許多假老虎。"原因是"陈市长指示撒网捕魚的办法，陈丕显同志分配打虎任务，市委派李广仁同志来具体指揮"造成的。

（三）汚蔑党的組織，歪曲党的幹部路綫。汚蔑"工会是唱白脸的，行政是唱紅脸的，人事部門是拿鞭子的"，"监察部門是最后王牌"。他認为在幹部使用上应該是用人唯"才"，"不管黃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他过去提拔了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二十余人到領导崗位上，加以重用。並汚蔑工农出身的領导幹部是"泥菩薩"、"牌位"，千方百計地排挤、打击他們。

（四）攻击和歪曲无产阶級专政，散布反苏言論。說："税务机关是专政工具，完成工作靠行政命令，因此……集中多，民主少，强調紀律，缺少自由。"認为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无产阶級专政带来的。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他很欽佩鉄托，說："斯大林过去亏待了鉄托，所以鉄托到現在气还未消，他們不要再那样看鉄托了。"匈、波事件后，他把右派分子戴炎英的反苏反共言論，印發給市税务局和各区税务分局的負責人閱讀，大家說戴的言論反动，他还說："不能那么看"。

朱如言的反党活动絕不是偶然的，他一貫与党貌合神离，三心两意。經常散布："党內相处也要有世故"，"党內陷害不是沒有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等反党言論；他在党內拉攏一批人，打击一批人，培植个人势力。在批判过程中，朱的态度恶劣，拒絕检查。根据上述事实，朱如言已經墮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决定开除其党籍，並撤消原有职务，留用察看，由十級降为十四級。

（已經中央批准）

中共上海市委
对右派分子楊延修的处理結論

（一九五八年七月）

楊延修，男，47岁，江苏人，1938年入党。原任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党組書記，市政协委員，市工商联执委，10級。

一、主要反动言行

（一）煽动放火，攻击肃反。对本人历史被审查一直心怀不满，大鳴大放期間，披着党組書記的合法外衣，进行了一系列阴謀活动。与右派分子相呼应，先后找对党不滿分子七、八人个別談話，“授意”鳴放，煽动右派向党进攻。否定肃反成績，公开主张“肃反可以重新总結”。

（二）大鳴大放期間，与右派分子里应外合，篡夺整風領导权，整風开始，楊个人擅自决定成立“学習委員会”，但当右派分子攻击学委会“长字輩太多”、“不代表民意”要求改組时，楊又积極贊成改組，支持右派“不要党支部代表参加”的叫囂，致使右派在改組后的学委会內佔了优势，使工商局的整風領导权一度掌握在右派手中。

（三）歪曲汚蔑党的方針、政策，主张發展資本主义。說“政治上不許爭鳴是教条主义”，党对民主党派关系是“若即若离”，“从中央到地方焦点是有职无权”，对党要“打破迷信，組織平等”，“外行充內行笑話百出”，歪曲对資产阶級改造政策为“总認为資产阶級唯利是圖，遇事总想斗”，“违法处理是小資产阶級疯狂性”，“五反不是大民主，不是阶級斗爭”。又

說"資本主义不仅要存在，且要發展"，"資本主义存在可唱对台戏"，"合营太多了，要退出一部分"，甚至主张"工商局要代表資产阶級講話"。

（四）丑化党員与积極分子，挑拨党群关系。右派分子攻击党群关系时，楊急起呼应。說：党員是"作威作福"，領导幹部是"慣于搞运动，批評人，打击人"，象"偏听偏信的秦皇二世，专听赵高，指鹿为馬"，"老資格只能做跑龙套，臭的应放到毛厕內"，"过去党員是整人的，現在应該給人整"。他还用"党群关系不协調，存在敬鬼神而远之"，"提拔上有宗派主义，党、团提拔多，重德輕才"，"人事部門多用权力，少用說服"，"政治思想工作教条化、公式化"等謬論挑拨党群联系。

（五）实行"排挤左派，拉攏中間，团結右派"的組織路綫。幹部路綫上蔑視工农幹部"土包子"，对剥削阶級出身的很赏識。建党路綫强調在留用人員、技术人員中發展。鳴放期間企圖将党組組員、支部書記等骨幹調走，而要右派分子协助全局工作。反右斗爭开展后，又以"不能无所适从，造成人人自危"，"我們这里沒有右派"等謊言来阻止反击右派。

二、斗爭中的态度

虽被迫承認了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右派分子，但思想上仍有抵触。

三、处理結論

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由10級降为14級），

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开除右派分子李　中的党籍

（一九五九年五月三十日）

李　中，男，三十九岁，家庭出身自由职业者，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八年入党。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間，曾任錫中工委宣传部长，丹阳、澄西县委書記，新四軍一师軍工部政委等职。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期間，曾任苏中十地委委員、苏中区党委土改巡視团团員等职。解放后曾任戚墅堰电厂軍事代表、苏南电业局局长、华东电业局副局长等职。原任上海市电业管理局局长。其主要反党言行如下：

（一）支持、包庇右派分子陈伟斯，破坏反右斗争。陈伟斯（李的內兄）是一个几次叛变投敌，参加軍統特务組織，多次給敌人送情报的历史特务分子，解放后伪造历史混入党內，肃反时被清洗出党。但李中在肃反期間，曾两次書面証明陈“确是党員”。陈伟斯被清洗出党后，仍然冒充党員，到处吹嘘；大鳴大放时，煽动放火，挑拨党群关系，散布崇美思想，反右斗爭中，被定为右派。当解放日报揭發陈的反党罪行后，陈多次与李中密商，而李中也公开为陈开脫罪責。李在群众中散布“陈只是有些右傾思想”，污蔑党报揭發的材料“均不是事实”，是“搞錯了”，並亲自到陈的家中鼓励陈坚持“实事求是”。在李中的支持下，陈伟斯繼續坚持其反动立場，多次向党反扑。当受到批判后，李仍捏造事实說陈“参加过党支部大会”，並和他“一起过过組織生活”，（陈伟斯本人也已承認自己不是党員，是混入党內的）千方百計地为陈掩飾，蓄意进行包庇。

（二）反抗党的肃反方針，抵拒整風运动。肃反刚开始，李中就說：“这样下去对生产有威胁”，是“冒险的做法”。閘北發电厂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后，叫嚷“捕人太多了”“违反政策”，並污蔑有“宗派情緒”。他强調“生产与肃反有矛盾”，反对抽調幹部搞肃反，对抗肃反运动。鳴放期間，李首先在肃反問題上向党进攻，一面布置专人搜集向党进攻的炮弹，一面又亲自找几个肃反对象談話，煽动他們向党进攻。右派分子李連發污蔑“肃反办公室是特务机关”，大家起来批駁时，李中却别有用心地要“李連發經得住考驗”，公开支持右派分子。在轉入反右斗爭后，他拒不执行市委反右斗爭指示，强調“社会上已經反右，右派不会再出来了”。对明显的右派也不进行斗爭，反說：“整風太左了，恐怕要造成損失”。

（三）企圖篡夺党的領导，破坏党的幹部政策。李中因为沒有当上电业局党委書記，把党委看成是实現他个人野心的絆脚石，千方百計地想取消党委。鳴放开始后，就大肆攻击“党委不熟悉，不解决問題”。叫囂“現在时机成熟了，党委可以不要了”，以便成立党組，自任書記，达到“大权独攬”的目的。李中为了培植个人勢力，拉攏提拔了反革命嫌疑分子、品質恶劣分子和历史非常复杂的分子十余人，一起进行宗派活动。並反对党对他們进行审查，說：“审查沒有必要”，“中国历史情况复杂，有历史問題的人很多，应該大胆使用”。

李中在历史上曾自首变节。一九四七年紧张斗爭中，由于貪生怕死，从苏南十地委逃来上海，被捕后供認已被捕的領导人員是解放区出来的幹部；出獄时又塡过反共“戡乱建国运动保証書”，出獄后仍然和特务有所来往。李中对此长期隐瞞，直到一九五八年才象“挤牙膏”式的作了交代。

在整風运动中，李的反党罪行被揭發以后，他再三抵賴狡辯，态度極端恶劣，並无悔改表示。根据上述事实，李中已經墮落为右派分子，决定开除其党籍，撤消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

较低的工作，由十一級降为十五級。

（已經中央批准）

中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总支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苗力沉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九年三月四日）

苗力沉，男，四十岁，富农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七年入党。曾任中央政研室敌伪組研究員、西北联政組織部秘書、华东新华广播电台編輯部副主任等职，現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其主要反党活动是：

大鳴大放前后，支持、配合資产阶級右派向党展开猖狂进攻。他攻击"从中央到地方广播方針不明确"，宣传部"过多干涉了电台的业务，妨碍了电台的积極性"，"市委对电台不重視、不信任、不支持"，"上海广播电台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領导状态"，煽动电台群众把"鳴放"的矛头指向市委和市委宣传部。当右派分子利用"左叶事件"向党进攻时，苗力沉竟授意新聞部表示声援，致使新聞部以电台全体編輯記者名义發出了抗議通电。电台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大叫肃反残酷，苗也乘机歪曲污蔑党的整風运动和肃反斗爭，說："参加革命十年以上的党員，很少有不受过委曲的，"助长和慫恿了右派向党进攻的气焰。右派分子金瑞暘就公开向苗挑拨說："你八年来有什么进步，搞到現在連个市委委員也沒当上。我替你想了，你有二个前途：要么搞政治，将来当中央委員，要么搞学术工作，当个大記者，要么就一輩子当个电台台长，这算是最悲哀的了。"苗力沉不但不进行反駁，反而把他看成是"知心朋友"，認为編輯部

"沒有右派分子"。在开始斗争金瑞陽之前，又亲自到他家去通風报信。在电台广播方針上，苗力沉主张电台应"多搞社会新聞和多做广告"，以"充分滿足各色人物的不同需要和兴趣"。在鳴放过程中，他公然违背市委的指示，播送了大量的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論。

在政治上完全丧失立場，敌我不分。八年来，他同副台长陈浩天一起包庇和吸收了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政治面目不清的分子百余人到电台工作，有些还被提拔为科、組长，使之把持了某些重要地位，把电台弄得烏烟瘴气。例如秘書組副組长陶复平，是一个曾經出卖过十几个共产党員的叛徒、特务，一九五五年被發觉后，苗还認为他"是可捕可不捕的人"；一九五六年被寬大释放后，苗又擅自决定恢复陶的原級原薪。

苗力沉政治上敌我不分，組織上对党不滿，反抗領导是一貫的。三反时，因其立場不稳，打虎不力，曾被撤銷"打虎司令"职务；斯大林同志逝世开追悼大会时，电台竟播送音乐，又受到党的警告处分。对此，他不但沒有接受教訓，反而对党怀恨在心，經常散布一些反党言論。並和陈浩天、柳星三等結成反党集团，抗拒党的領导。他的反党罪行被揭發批判后，态度極不老实，繼續挑拨电台某些幹部对党不滿，直至經过多次反复批判斗争，才被迫認罪。当組織上决定要他下乡劳动改造时，他竟又發生了敗坏人伦的兽性行为，道德堕落达于極点。

根据以上事实，苗力沉已經完全堕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为了純潔党的組織，决定开除其党籍，撤消一切职务，保留公职，送农村劳动教养。

（已經中央批准）

中共上海市长宁区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石涛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九年五月五日）

石涛，男，五十四岁，家庭开葯鋪兼医，本人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曾在北洋軍閥第一混成旅、伪湖北宪兵传習所、伪第四混成旅等部任班长、上尉書記长。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六年当小学教員。一九三七年經朱大鹏（我党党員）介紹参加国民党二十九軍任軍訓团第三大队上尉軍需长。一九三八年到延安青訓班学習，結业后到山东临、郯、费、嶧四县边区工作，同年五月入党。入党后，曾任苏魯支队营教导員，临沂青抗大队政委，郯县县委書記，魯南三地委武装部长，华东党校大队长等职。上海解放后，任长宁区区长、区委副書記、区委第一書記。一九五八年三月調任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党委副書記。

石涛在长宁区任职期間，有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一）一九五七年春上海有些基層单位在“鬧事”的时候，他（当时任长宁区委第一書記）破坏市委“稳定基層”的指示，完全放棄領导，致使长宁区“鬧事”蔓延到六十多个基層单位，造成相当严重的混乱現象。在大鸣大放前后，他违背区委的决議，連繼組織了大小二十七次会議（其中石涛亲自主持的有九次），积極煽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他曾多次在党外人士会議上說：“大家要有医生对病人治病的精神，該打針的必須打針，該开刀的就必須开刀，不要管‘病人’叫和哭。”在科技人員座談会上，又說：“有些公方厂长对科技人員缺少支持，使科

技人員心灰意冷，英雄无用武之地，象小媳妇一样不敢講話”，“党和行政只重視工人的建議，不重視技术人員的建議”，鼓动他們“要有坚持真理的斗爭性，勇敢斗爭”。並向到会的人保証：“（1）小組發言不記录姓名；（2）大会發言不査發言稿；（3）决不打击报复。”

（二）在市委宣传会議时期，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他支持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論說：“党的幹部政策重德輕才，党員提拔太多了”，認为“發言越来越激烈是难免的”，“都是我們自己不好，如果早改，就沒有这些話了。”积極为右派分子的反党罪行辯护。当柯庆施同志指示党員不發言后，石涛的态度仍未改变。

（三）在組織上，石涛有一套反党的組織路綫与幹部路綫。他在长宁区工作时期，有意識地把一些隐瞞严重政治历史問題的分子，政治面目不清的分子，出身于剝削阶級家庭而尙未得到改造的分子，提拔到党的領导崗位上来。他並利用这些人实行家长式的統治，維护其領导“威信”，排挤打击好同志，弄的邪气猖獗，正气不振，造成党員成分与領导成分的严重不純。此外，在肃反运动和批示处理案件中，由于他的資产阶級立場、观点，破坏了党的肃反政策，該捕不捕、該判不判，袒护和放縱了一批反革命和坏分子。

（四）石涛的反党活动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他的整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論据。他經常說：“人有共性，应一視同仁”，“阶級是可以改造的”；在所有制的問題解决后，“資产阶級不仅不对抗了，而且还怕跟不上去”，“只要給他好处，就能調动他的积極性”。主张“真有知識的人，不管他进步不进步，我們都要团結”，並說：“苏联有的軍事教員經常駡共产党，但苏联还是重用他”，来証实他自己观点的“正确”。他还主张：“在党內来說，必須以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其他人則不一定以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可以創造新的主义。”在这种反动的論調支配

下，他在統战工作中卑躬屈膝、只統不战，在一九五六年秋，长宁区一届四次人代会上，职工代表揭發資本家把工人毆打得吐血的违法行为时，石涛不仅不支持，反而在大会总結时批評职工代表說："今天發言有缺点，主观片面，态度有些激动，言語有些刺激，影响統战"，並向資产阶級賠礼道歉，請求"原諒"。石涛上述一系列的反党罪行在市委扩大会上被揭發后，他拒不进行检查。經过反复揭發斗争，始被迫承認了一些事实，但态度極不老实，自始至終不願检查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动机，拒不承認自己是右派，不同意区委对他的結論。

以上实事，充分說明石涛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所以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是偶然的，他是一个旧知識分子，青年时代参加了軍閥軍队，受过一套反动的教育和訓練，沾染了反动的思想、作風。抗战初期虽然参加了革命，但长期以来，他的反动立場、观点並未根本改变；同时他还存在着極端严重的个人主义，对党不滿（解放初期因未發到蚊帐，竟用国民党旗作帐頂，以泄私憤）。因此在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时，就得意忘形，积極煽动、支持、配合右派向党进攻，完全暴露了他的反党真面目。为了純潔巩固党的組織，經区委討論决定，开除石涛的党籍，撤消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工作，由十一級降为十四級。

（已經中央批准）

中共复旦大学委員会
决定开除右派分子王中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王中，男，現年四十三岁，山东省高密县人，家庭出身地主兼資本家，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八年入党。曾任复旦大学新聞系系主任，复旦大学党委会委員、統战部部长。

王中的主要反动言行

（一）王中一貫对党不滿，和党鬧对立，誣蔑党和攻击党的政策。他誣蔑党的組織"冷酷"，党內"无理"，"官官相护"，把党对他的批評說成是"遭受打击"。他攻击肃反"是一陣風"，說"那里有那么多反革命"；他攻击粮食定量供应說"束束褲带，准备上吊"；他还歪曲党对知識分子的政策。

（二）他有綱領地、积極地宣传資产阶級的反动的新聞理論，强調报紙要有"服务性"，"商品性"和"生活趣味"，反对党报的教育群众、組織群众的作用，反对报紙的党性和它的政治思想教育作用。反对党对报紙的領导，挑拨党委和报社的关系，企圖取消党对报紙的領导，提倡办"同人报"。

（1）王中在一九五五年写了反动的新聞著作"王氏大綱"，徹头徹尾地販卖了資产阶級新聞理論，極力反对和誣蔑无产阶級新聞学。一九五六年他到解放日报社作报告，同年暑假，他在复旦大学新聞系組織了"訪問团"到南京、无錫、济南、青島等地"訪問""考察"，这个时候，他积極地宣传了反动的新聞"理論"，到处点火，挑起报社对党委的不滿。他到处謾駡党报是"靠娘吃飯"，"寡妇脸"，"官报"，等等。並鼓吹办不要

党領导的“同人报”，“按經济区域办报”。他說“办报人心里一有了党委就办不好”，“党报吃亏，就是因为同党委关系上有問題，党委叫你这样办，你們又不能不这样办”；他說“不向党委开刀，不解决問題”。王中的反党言行，在一些报社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2）王中企圖以复旦大学新聞系作为其反党大本营，曾企圖組織不由党委領导的“复旦通訊社”。王中将黃色小报給学生閱讀，講課中貫徹他的反动理論，以致在新聞系內資产阶級思想迷漫，各教研組、师生都受其影响。在他直接間接的影响下，很多学生不願到党报去工作，学生中先后出現了“友好通訊”，“未名社”“給爱花者”等刊物，其內容充滿低級趣味，庸俗不堪，实际上貫徹了王中的反动理論。

（3）一九五七年五月大鳴大放期間，王中参加全国新聞工作座談会，在会上大肆宣传其反党理論，受到其他右派分子的喝彩、支持，气焰嚣张。在会上王中大罵“党报有一种架子”，“好像不鉄青面孔不足以为党报”，極力为上海新民报吹捧。他攻击党委“对党报的認識上可能有問題，党委容易忽視报紙的特点，或者仍然習慣于抗战时期和阶級斗爭时期的作法，对新形势下报紙应起的作用認識不足。报社如按着党委的旧習慣去办报，便会造成报紙脫离群众。”在回上海的途中，王中又到济南、南京放火，积極召开座談会，散佈他在北京座談会上發表的謬論。他对助教金維新（原在大众日报实習）說：“我們将来到济南办一个报紙，和大众日报竞爭一下，搞垮它，以后再到別的地方去办，再和当地党报竞爭。”在南京，王中应新华日报社的右派分子张建東的邀請作了长达三小时的报告，大肆宣传他的反动論点，鼓吹办“同人报”。

根据以上情况，証明王中是一个十足的，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划、有行动的党內極右派分子。中共复旦大学委員会已于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决定开除王中的党籍。

中共上海市委
对右派分子王若望的处理結論

（一九五八年七月）

王若望，男，四十岁，江苏人，一九三七年入党。家庭出身中农。現任“文艺月报”編委，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

一、主要反动言行

（一）鳴放前后，写过“释落后分子”、“一板之隔”、“不对头”、“身价十倍”、“观風測雨”等十余篇文章，攻击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攻击从政治上划分人的先进和落后，攻击“鳴放”及“百花齐放，百家爭鳴”中的政治标准，並化名对作协党內負責同志进行人身攻击。甚至公然反对老工人座談会对右派的反击，对党的各項政策，对社会主义制度作了全面攻击。

（二）鳴放期間在市委座談会上，首先出来污蔑作协党內有墙，墙外有沟，起了放火作用。在其他党內外会議上，攻击作家协会党內有宗派集团，並污蔑肃反等政治运动是作协党內的宗派打击，宗派排挤，說作协肃反四个月，有三个半月是搞自己人，是搞以夏衍同志为首的吳强、孔罗蓀、柯蓝、王若望四个人；說解放日报上批評文艺月报未轉載胡風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是对文艺月报的宗派排挤，文艺月报是宗派打击的牺牲品。

二、斗爭中的态度

基本上交代了問題，态度尙老实。

三、处理結論

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由文艺四級降为文艺八級）。

中共福建省委全体会議决定开除地方主义分子黃国璋、林汝楠、許集美、王一平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六月）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福建省第一屆党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揭發了黃国璋（原福州市委書記）、林汝楠（原省教育厅长）、許集美（原晋江专区专員）、王一平（原福州市委書記）等地方主义反党活动后，福建省委为了更进一步查清事实和罪恶，徹底批判地方主义的反党言行和团結教育多数地下幹部，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初将犯有严重地方主义錯誤和受地方主义者严重思想影响的区級主要幹部以上的党員幹部一百七十七人，集中学習了四个月。經过充分發动群众，採取大放、大鸣、大辯論的方法，严肃認眞地对地方主义开展了深入的揭發批判和斗争，使参加学習的幹部受到了一次極为深刻的教育。黃国璋等人的錯誤，在今年六月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議上又作了討論，会中省委召开了全体委員会議，一致通过了开除地方主义分子黃国璋、林汝楠、許集美、王一平的党籍决定。黃国璋、林汝楠、許集美、王一平反党集团的主要錯誤如下：

黃国璋、林汝楠、許集美、王一平都有强烈的个人野心，居

功驕傲的思想和浓厚的山头宗派情緒。解放后他們一直对自己的职位不滿，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他們即背着党进行了一連串的非組織活动，广泛地在地下幹部和老区群众中散布流言蜚語，挑拨拉攏，多方搜集歪曲扩大的材料，准备向党进攻，並發动和鼓励混入党內的反革命分子刘佐周等到中央控告。黃国璋在福州市利用恢复城工部的党員党籍的机会，極端恶劣地企圖把錯誤处理城工部的責任轉嫁于省委、市委，說这是"市委的宗派主义"所造成的，並以"七年委屈"为題，召开了"吐苦水"座談会，煽动城工部的同志向"党內阴暗面"作斗爭，組織發动他們肆意攻击党的領导、攻击党的幹部政策和历次政治运动。

党提出整風和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在黃国璋署名的向中央的控告信中公开提出了他們的反党綱領。在地市委書記会議上，黃国璋、林女楠、王一平一唱一合，公开攻击了全省各級党委的領导，說"福建七年来情况与王明路綫相似"，七年的錯誤是"把老区群众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誣蔑省委有路綫錯誤。他們在省委召开的閩北、閩中老区座談会上，搜罗与糾集了各种对党不滿的分子，混进党內的坏分子、阶級異己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参加会議，提出"忘本論"、"还债論"、"紅旗不倒論"，宣揚"斗爭性"，煽动和組織这些人向党發动了总攻，並与当时省人代会上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互相呼应。地方主义者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問題上攻击党：

一、否定老区工作的成績，否定党的正确領导，攻击省委在老区工作上有路綫錯誤，說："老区工作只有缺点沒有成績"，叫囂"老区人民政治上沒有翻身"，說"解放后給老区群众不是带来幸福而是带来禍害"。同时他們說"老区問題严重，新区問題也一样，只是沒有人揭發罢了"。

二、誣蔑攻击党的幹部政策，反对依靠南下大軍、南下幹部，以南下幹部为骨幹团結培养地方幹部的方針。他們硬說党与南下幹部有"宗派主义"，說党对地下幹部的政策是"赶掉政

策”，“排挤政策”“打击政策”。説地下幹部是“童养媳”，“殖民地”，“有职无权”，“坐冷板凳”，“不如民主人士”。説解放后新培养的地方幹部都是些“唯唯諾諾”，“吹牛拍馬”的人物。説“南下幹部提拔快，地方幹部提拔慢”，“党紀国法也是对南下幹部寬，对地下幹部严”等等。同时还大肆宣揚南下幹部“不了解本地历史”，“不理解本地幹部和老区群众的心情”，只有他們才是本地利益的代表者。

三、攻击党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攻击党的“三反”、“鎮反”、“肃反”、“审幹”等政策，攻击人民民主专政。他們歪曲、夸大甚至揑造事实，来否定历次政治运动的成績，替反革命分子、叛徒、劳改犯、被管制分子和坏分子叫寃翻案，並把这些都叫做“錯案”，都説成是南下幹部“有意地打击、迫害、誣陷地下老革命”。此外，他們还攻击了党的其他一系列方針政策。如説“合作社大都减了产，一点劳动自由也沒有”，“定产太高，公粮負担重，粮食不够吃，天下烏鴉一般黑”，“上面官僚主义，下面不顧人民死活”，“土改四大錯：錯評成份、錯判、錯管、錯杀”，“体制不如美国好”，“无产阶級专政容易产生个人崇拜”，“南斯拉夫工人权力大，……我們小小合作社还要派二百五的主任”等等。

綜上所説，地方主义者实际上全面否定了党的領导，否定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成果，全面攻击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綫和組織路綫，以及党的一系列根本方針政策，他們在政治上已完全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場。

老区座談会后期，他們自以为进攻获胜，“形势已經發生根本变化”，因此提出“要抓幹部安排問題”，提出到基層“扎根”，“抓重点县”，“抓第一書記”，“带一个班子”等口号，並按此制訂了閩中、閩北和福州市幹部“大換班”計划。並紛紛找幹部談話，封官許願、安排职位，私自召开下放幹部会議布置“紅旗不倒”。儼然已另成一党，另有一个組織部。整風

进入大放大鳴，他們即与資产阶級右派勾結起来，在晋江地区掀起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南下幹部風潮，一度把晋江地区搞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他們到处煽动組織請願鬧事，高呼“赶走南下幹部”，“和南下幹部幹到底”，“打倒共产党，共产党必亡”等反动口号，反革命分子刘佐周等在仙游县搞起了“小匈牙利”事件，公开叫囂要杀共产党，准备释放犯人、上山打游击、武装夺取政权。在福州，他們联絡了民主党派和資产阶級右派，出来“放”“地方幹部問題”，說：“要高高举起政协旗帜，整一整市委”。他們与社会上的右派，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都是融为一体的。

反右派斗爭中，林汝楠、許集美、王一平等地方主义分子完全站在与党对立的立場，千方百計阻挠这一斗爭的开展。

以上事实說明：黄国璋、林汝楠、許集美、王一平等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为首分子，已經完全堕落为資产阶級右派分子。为了严格党的紀律，从思想上和組織上純潔党，福建省委全体会議一致通过开除地方主义分子黄国璋、林汝楠、許集美、王一平的党籍，並撤消他們党內外的一切职务，对其他犯有地方主义錯誤的，则区别不同情况，进行了不同的处理。

中共江苏省交通厅支部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鎮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二日）

张鎮，男，现年43岁，江苏省兴化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地主，1940年入伍，1941年入党。历任县长、局长等职，原任交通厅副厅长，党組書記。

在深入整改，交航二厅整風領导小組合并后，进一步揭發了张鎮的反党言行。张鎮的反党、反領导，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摆脱党的領导和监督，重大問題不向省委請示和报告，反而說省委不重視交通工作。貫徹执行党的方針政策以自己的意願为轉移，搞航运工作时，說領导"重公輕航"，搞公路工作时，又說領导上"重航輕公"。他主张执行省委的指示要慢一点，修建徐淮公路就是违背了省委的方針。在負責交通厅党組工作时，严重的不負責任，偏面地强調交通工作的特殊性，把业务工作神秘化，摆脱党的領导。

2、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重大問題不通过集体討論决定，有話不在会上說，背后乱談，会上表示同意，会后又宣传自己的主张，甚至推翻会議决議，自己另来一套，破坏党的集体領导原則。工作中有了成績，占为己有，出了毛病，則推給别人。

3、一貫玩弄两面手法，热衷于制造是非，造謠中伤，污蔑領导，破坏团結。在幹部中拉拉扯扯，用討好卖情、封官許願的办法，迎合某些人的个人主义心理，培植个人亲信。他还逢甲說乙，逢乙說甲，进行挑拨离間。扩大别人的缺点，抬高自己的威信。提出修正主义的論点，主张取消思想斗爭，散布"批評会影响团結"的謬論，来涣散党的战斗力。在阶級斗爭中，他尽力长敌人之志气，削自己的斗志，涣散斗爭。

4、一貫坚持地主阶級立場，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以反对者的面目出現，顚倒黑白，破坏运动。三反运动中，就曾为掀倒領导进行了非組織活动；反右派斗爭中同情和支持右派，提出"不要扩大化"，要接受"肃反教訓"的論点，为右派分子辯护；幹部下放时又提出"接受1954年整編的教訓"，並在下放幹部問題上造謠中伤，把領导小組的决定，說成是某領导的独断，以混淆視听，攻击領导，进行他的反党活动。对机关中的坏人坏事，表現了严重的右傾，不聞不問，提出"捉姦要双"的反动的

法学观点，来为坏人坏事辯論，使交通厅坏人坏事不能得到处理。

5、张鎮的反党、反領导是一貫的。早在土改中，就以葬父为名，出买土地50亩。复查中为其家中隐瞒浮財。三反运动中，又企圖揪倒領导。对党的重大的革命措施，加以破坏和污蔑。例如：棉布要計划供应，他指使其老婆尽先搶購。对农业合作化后的新农村，說成是“反动标語到处都有”，“农民搶粮打幹部”，“如果不是我們鎮住，国民党来了很多人就变了”。苏联發射洲际导弹火箭成功后，他說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德国搞到一批科学家，今天才有这样的成就”，从苏北到并省以来，沒有那个領导同志，他沒有反对过的。在苏北交通处工作时，說領导是“主帅无謀，三軍受困”，“大臣不如太监”。并省后，从省长到历任厅长，他都恶毒的予以攻击，无中生有，造謠中伤，扩大領导缺点，多方面加以排挤。

张鎮的反党、反領导，是有其社会根源的。他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又直接經营土地进行剝削。入党后，地主阶級思想根本未加改造，一有时机就原形畢露，遵循其父亲所遺嘱的：“男子不险不發”的反动哲学，作为他一生損人利己、損害組織、追逐資产阶級生活方式的指南。因此，张鎮是一个混进党內来的阶級異己分子，是一个党內的極右分子。为了純潔党的組織，經支部大部討論，一致通过清洗张鎮出党。並建議行政給予处分。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普通班第二十五支部关于右派分子楊成亮的政治結論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日）

一、简历

楊成亮，山东新太县人，現年35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1940年5月入党，同年参加工作，历任县邮电局长、福建省邮电局人事科长等职，来校前任福建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現为普通班二十五支部学員。

二、主要錯誤事实

1、誣蔑和歪曲中央的正确路綫，否定三反、肃反等方面的成就：

他認为："中央从1935年到現在的路綫""是路正綫不直"。他說："路正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綫不直指有不少缺点，有人为紧张"。他說："方針政策是保証方向，保証路綫的，中央在方針政策上則是有錯誤的。"。

他認为中央在三反、肃反、反右傾、規划、粮食統購統銷等問題上犯有主观主义錯誤：

他說："在三反中，中央向下分配任务指标根据是什么，是否合乎实际情况，我看犯有主观主义，扩大化了老虎面，伤害了一些幹部。"。

在肃反問題上，他認为："不能以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难免的，就放棄自我批評，自己原諒自己。"他还誣蔑中央說："搞出个胡風，心血来潮就来肃反，缺乏准备工作，摸不清底就搞"，"从中央的指导上有检查的必要"。

他認为中央："在反右傾思想之后中央規划是不切合实际的。"他說："反右应該有度，有界限，在农村右是主要的，其它战綫上建設上是否右了呢？"並說："制定規划、实行一长制都是大家忙了好久成績不大，事倍功半，形成人为紧张"。

他認为："統購統銷在分配数目上"，"購的数目多了"，犯有"主观主义錯誤"。

因此他对有些人誣蔑中央时提出："中央在执行政策上有一陣風的說法"有同感。他並且說："过去运动太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自己不能鑽研业务"。

2、在資产阶級右派向党猖狂进攻中，和右派分子共鳴，称讚右派分子才华，为右派分子辯解。

在反右派斗爭进一步深入，党內传达了中央指示，报紙上也多次揭露了右派阴謀之后，在7月9日的小組会上他还認为对右派夺取領导权的口号提得过高，不"实事求是"。甚至他憤慨不平地說："現在資产阶級喫了，有人認为越罵的兇越好"，他並且說："是不是他們有夺取領导权的危险呢"。他認为："夺取領导权的可能不大，甚至沒有可能"。

在7月6日小組会上他为右派分子辯解說："这次社会上引起混乱，不能完全說是右派分子点火，而是我們若干政策缺点引起的"。他又說："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言論，虽然是歪曲夸大，但夸大部分中总还有些事实"。

他称讚林希翎的才华，說林"懂的东西眞多，能在几千人大会上作报告，眞是有本領的。"当党已經明确指出章伯鈞是右派分子，並揭露其罪行之后，他还很欣賞章伯鈞在6月12日光明日报上所写的代社論的文章，並向別人宣揚說："文章写的好，很能說明問題。"但他認为这一时期报紙所登的反右派文章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文章外，都是說服力不大的。他認为"对右派应坚持团結——斗爭——团結的方針，化消極因素为积極因素"並說："这些人是有本領的並不是飯桶"。

他看了邮电部鳴放当中有右派分子誣蔑"老幹部五不行"的說法，他表示有同感，並說自己有三不行。还說："邮电部門有些老幹部什么都不学，憑老資格吃飯"。

3、錯誤地看待中苏关系，誣蔑苏联专家

他在听到中苏幣值折合上有些不合理的現象时，他認为"中国穷弱，苏联富强，中国只能佔便宜，不能吃亏"他說："解放后中国人民辛勤建設几年了，国家还是很穷的，是不是苏联把我們剝削穷了"。他錯誤的認为邮电系統实行一長制，机构几次变动，搞的不好是苏联专家搬了苏联的东西"。毫无根据的說："邮电系統的专家沒起好作用"。

三、錯誤的根源

楊成亮所以犯了这严重錯誤，並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严重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驕傲自滿、狂妄无知發展的結果。他經常吹嘘自己出身好，成份好，历史上沒有犯过錯誤，是一个缺点不多的共产党員。說："主观主义有一些，官僚主义不多，自覚的宗派主义沒有"。他特别爱夸耀和显示自己能独立思考，有独到見解。他检查自己思想时說："不管上級下級一視同仁"，不盲目接受别人的意見，自己認为对的才接受。对党組織的意見不尊重，而欣賞自己的标新立異。对于反面的意見，津津有味，对别人拥护和讚揚的言論，反認为是小資产阶級思想患得患失。

楊成亮所犯的錯誤，和他的阶級出身以及和他長期存在着右傾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出身于一个中农家庭，从小娇生惯养。他脑子里种下了根深蒂固的荣宗耀祖、向上爬的資产阶級思想，他带着这种思想参加了党，並未能根本改造。此外，楊成亮的錯誤，也是由于他忽視政治，存在着单純业务观点所造成的。

四、对錯誤的态度

楊成亮在对待自己的錯誤的态度上，一开始怀疑个别同志有

意整他。在检查中总是借口过去口快心直，講了些問題，都想不起了，怕戴右派帽子，顧虑重重，抵触情緒很大。經同志們揭發和多次对証，虽然承認有这些事実，但又一味强調他的动机是好的，只是求知識，沒有什么思想問題，而不敢正視錯誤，不敢暴露自己的眞实思想，並曾产生过自杀念头。經过一个多月会議和多次个别談話帮助，他表示願意检查自己的錯誤，認为自己的錯誤严重，但他最后在支部大会的一次检查，只罗列了些事实，仍未認眞挖掘思想。在同志們帮助之下，写自我检討时，承認了錯誤，对錯誤有了一定認識，並表示願意改正。

五、結論

根据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楊成亮是一个十分驕傲自滿、狂妄无知，有严重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根本未改造的人。他在社会主义革命轉变关头，在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站在資产阶級立場上，歪曲和誣蔑党的政策，攻击党中央的正确領导，和右派分子共鳴，为右派分子辯解。据此說明他是一个党內的右派分子。支部一致通过开除其党籍。

中共浙江省委监察委員会关于开除極右分子顧耕初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日）

顧耕初，男，三十五岁，江苏川沙县人，家庭出身职員，本人成份学生。一九四〇年九月入伍，同年七月入党。历任：机要員、記者、科長、秘书、省文化局处長、副局長、省人民广播电台

台长等职。

顾耕初的反党言行如下：

一、在大鳴大放期間，利用广播电台这一宣传机构，配合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鳴放开始，省委指示电台对外宣传应加控制，不放不鳴，顾耕初却背着省委，擅自举办"爭鳴話筒"特别节目，並連續要右派头目宋云彬、姚順甫、郑伯永等在話筒面前放出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致使电台一度成为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講壇，实質上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开辟了一条战綫。七月上旬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左瑩同志来浙江检查工作时，传达了邓小平同志在沈阳指示广播电台不放不鳴的精神后，顾又封鎖消息，阻止别人将中央精神报告省委宣传部，說："报告宣传部，就鳴放不成了"。

二、在反右派斗爭期間，积極包庇右派分子，广播电台副总編輯右派分子何其、梅寒白，一貫进行反党活动，反右派斗爭开始时，顾耕初担任电台領导小組組长，他組織群众向肃反积極分子开展斗爭，被宣传系統整風領导小組發現后，曾指示顾立即撤銷何其的职务（整風領导小組成員），限期發动群众，組織斗爭何其。而顾耕初公开对抗，拒不执行。后經宣传系統和新聞界領导小組五次指示並严格批評后，顾才以加强业务的名义撤銷何其的領导职务，但仍然坚持不斗爭，並对領导小組的同志說："何其有問題，我們也要保护他过关，如果一定要搞，我們就以組織名义打报告"。並說："撤掉我的职，也要把問題搞清楚"。直到斗爭何其的前夕，顾还对何其說："你看这是什么性質，我們有什么把柄給人家抓住了……"。怕搞了何其，火烧到自己身上来。

三、"左叶事件"在报上公布后，顾耕初同意电台进行"声援"，在电台編輯部召开大会，以全体編輯、記者名义向中央新聞工作者联誼会發表通电。在通电中除对"左叶事件"表示憤慨外，还污蔑說：象左叶这种以官僚架子、老爷气派对待記者，无

理阻挠記者活动的人，在浙江也不是个别的……等。在这个事件中，也充分暴露了他的反党的本質。

四、否定电台的肃反成績，打击肃反积極分子。顧調电台工作后，就一笔抹杀电台的肃反成績，攻击肃反領导小組成員。說"电台肃反搞得一团糟，一塌糊塗，搞得大家垂头丧气！"並一再宣揚"电台肃反副作用很大，伤害了一些人的积極性，有过伤害編委集体領导的錯誤"。污蔑"肃反幹部翘起尾巴来了"！致使有些肃反幹部长期抬不起头来。在反右派斗爭中，又抓住了个别肃反幹部的某些錯誤，开展斗爭。

五、近几年来，特别是鳴放期間，散布流言蜚語，串連群众向党进攻。他时常在群众中和右派分子面前說："省委有宗派、有圈圈，常委开会，陈、林、吳总是交头接耳，楊思一冷冷清清坐在一旁，顧德欢老头子更可怜啦"！說"陈修良这样的人，馬列主义水平在浙江是少有的，也不給她当省委委員"等等。他污蔑中央广播事业局"什么也幹不了，不管它"！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省市台长会議时，顧耕初积極串連部分地方电台的同志，攻击中央广播事业局。

顧耕初墮落成为資产阶級右派分子並不是偶然的，他一貫驕傲自滿，極端地發展个人主义。在部队工作的时候，对抗領导，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到电台后，与反党分子何其、梅寒白勾結一起，同流合污，进行反党活动，其反党的罪恶活动是十分严重的。省委监委決定並已經省委批准，将顧耕初划为極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銷一切职务，劳动教养。

中共浙江省商业厅机关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黎立坚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

黎立坚，原名王云甫，曾用名王勳，男，四十一岁，河南鎮平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八月入伍。一九三八年一月入党。历任游击队宣传員，新四軍連队組織幹事，团組織股长，鋤奸、保衛科长，浙江省民政厅秘書主任，浙江省土产公司副經理、食品公司經理，中共浙江省商业厅党組成員、商业厅副厅长等职。

一九四七年十月，黎为其爱人搞不正当两性关系，以手槍打伤其爱人的腿部，並唆使其爱人用硝鏹水伤害对方面部，几至一目失明。因此曾受留党察看处分。

主要反党言行

（一）蛮横地拒絕省委对生猪問題的决定：

1、为緩和省內肉食供应的紧张状况，厅党組于一九五七年二月九日决定报請省委批准生猪外調年度計划由二十万头核減为十万头。主管生猪业务的黎立坚，不仅不立即修改一季度六万头的外調計划，反而在三月十二日自作主张的签發了与党組决定相违背的檷节省內供应、保証外調任务完成，並要嘉兴地区爭取超額外調的紧急通知；三月二十日又指示省食品公司林植之經理按全年外調十五万头作出分季安排，代拟厅稿报省人委。企圖以此否定省委和党組核減外調十万头的决定。还对厅业务处右派分子叶树滋說：“只要你把計划安排下，就好办了”。

2、三月十六日，省委决定生猪暂停外調，放寬省內供应，

这是緩和省内肉食供求矛盾的重要措施。党組副书記××之同志传达了省委这一决定並嘱立即貫徹执行时，黎採取抗拒态度，並对經办人員說：“不能办，公司有困难”“不管他，你們沉住气！”阻挡了省委指示的及时执行。停調后又不做好省內供应工作，並把由于沒有做好供应而带来的一些业务工作上的困难都归咎于省委。

（二）煽風点火，配合党外右派向党进攻：

黎在平时散布“外行不能領导內行”的謬論，說“省委只能管管年度計划，季度計划应該交給业务部門管，否則影响业务部門的积極性”，“党組管得过多过死。”說“經营生猪困难很多，生猪特点党委部門不了解”，“要多写稿向各級党委宣传宣传”，对暫停外調極为不滿，說“生猪供应是个安排問題，本来簡单，一抓反而抓复杂了，业务部門弄得难办事。”为了逼迫省委改变他所坚决反对的停調决定，黎故意歪曲省委指示精神，制造輿論，煽动群众攻击省委。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监察部检查組同志向黎匯报停調情况后，黎对匯报中背离真相的事例不但不提出意見，反而无中生有揑造事实、攻击省委的决定說：“春节后杭州供应紧张，民主人士到四办（？）叫苦，有的省委部長也吵肉不够吃，老百姓意見不多……因此省委常委决定停調”。

四月分全省食品公司經理会議上，各地經理对停調認識不足，思想問題很多，邀黎去解决，黎却只說“合理安排”，不談“放宽供应”，大談其“生猪停調是省委决定的，商业厅无权。”因而更激起了到会者的不滿，認为省委指示是“主观主义行不通”。平时常說：“省委停調，全省食品系統有一万多人思想不通，这是一件大事。”当各地請求解决生猪困难时，黎不是积極設法解决，而是别有用心的說：“我同情你們的困难，这是省委决定的，当地党委解决吧，解决不了就直接請示省委解决。”企圖挑起下級党委对省委的不滿。还唆使右派分子叶树滋

等向党进攻，說："老叶呀！我說話不灵，領导不听，你和陆兆雄（右派）等多向上反映些生猪經营的困难情况。"並且还表示自己态度說："我們搞生猪的意見是一致的，就是領导上看法跟我們不同。"黎立坚知道省委要派人来商业厅党組为生猪問題召开座談会时，就带了右派王法武、叶树滋等去着重收集停調后的困难及損失材料，企圖带叶参加座談会一起向党發起进攻。会上有人提出有些不应列作損失，但黎說："增产节約总是个事兒，不能不管。"还責成前食品公司算出調运后損失二十一万元的'損失帐'，会后要右派分子叶树滋整理材料，企圖以此为炮弹再次攻击省委。

（三）一貫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和对抗党組的領导。党組决定杭州肉类加工厂划归杭州市領导，黎就一直大叫"領导关系不明确"，並积極的搜集該厂存在的缺点和問題，企圖否定党組的决定，达到商业厅直接領导的目的。在桔果业务經营上，党組决定划归合作社，黎因思想不通，說"商业厅怕麻煩"，拒不执行。在提拔幹部上也同样的，当不能实現个人意見时，就說"商业厅对幹部有印象观点"，影响極坏。

反右斗爭中，經过群众的多次揭發批判和厅党組、省委財貿部的多次批判帮助，黎立坚一直固执己見，不肯检討，对錯誤事实採取推賴手段，並說"我的問題在商业厅弄不清"，"是左珮之整我"。始終强調自己的动机是好的，堅不悔改。

黎立坚在实际工作中，一貫反对党的領导，拒絕执行党委指示，組織上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政治上配合党外右派向党进攻，是生猪事件的'統帅'，完全堕落成为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党的叛徒。

根据以上結論和中共浙江省商业厅綜合处支部的报告，党委会全体会議一致通过，将右派分子黎立坚开除党籍。並建議行政上給予撤銷一切职务的处分，另行分配做一般工作，降級降薪（由十三級降为十六級）。

中共浙江省輕工业厅党組关于右派分子张光反动言行的报告

（一九五八年二月）

张光，男，四十一岁，浙江諸暨人，家庭出身中农，个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入伍，一九三八年入党，一九五五年調来工业厅工作，现任本厅副厅长，党組副書記。

一、主要反动言行

1、严重的地方主义，分裂党的团結。早在一九四九年张光在省委組織部任組織科长时，曾带領工作組二次去諸暨检查工作，第一次去蹲了四天，回来写了一篇检查报告，該报告充滿着地方主义的情緒，否定党中央依靠南下幹部，依靠大軍，南下幹部掛帅的方針，露骨的分裂南北幹部关系。他說南下幹部是"狹隘的阶級观点"，"是根据地作風"，"南下幹部都是做党的工作，包括行政"，"南下幹部光看本地幹部的缺点"，对当时諸暨县委書記吳秀峰（南下幹部）恶意的进行攻击，积極主张撤换，調本地幹部担任县委書記。

第二次去諸暨由于他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思想，沒有針对諸暨当时組織不純的主要問題加以解决，反而进一步去制造南北关系，进行非法串連，拉攏一批当地幹部鼓励打击南下幹部，当时諸暨横山区委書記孙繼田，××区委書記高文田，都遭到了斗爭。坏分子气焰囂张，党的工作遭到極大的损失（詳参考张光检査諸暨报告和工业厅党組向省委第一次报告）。

2、反对省委对政权工作的領导，公开提出省委交出"人

权、財权、政权”的反党綱領。

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現修正主义的逆流，党内右派蠢蠢欲动的时候，张光就十分放肆的活动起来。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在省級机关整風大会上的發言，集中的攻击了省委，污蔑省委包办人委，叫嚣政府威信不高。他說：人委不起作用，省长沒有权，省委副書記与省长职权不清，誣蔑省委常委有权大权小之分。又說：要加强省人委就要省委交出“人权、財权、政权”，撤消工交、財貿二个部。这种要省委交出“三权”的讕調，实質上是沙文汉的独立平衡資产阶級政权观点的具体化。

3、狂妄而恶毒地攻击譚震林同志，为右派分子楊思一鳴不平。

一九五六年七月省委召开全省二屆二次党代会議期間，譚震林同志对沙、楊、彭、孙等分裂党的行为，进行了批判，因此很快制止了这种分裂活动。为了維护党的团結，譚震林同志召开各厅局党組委員会議，其中解释了沙、楊所以不能当选八大代表，是因为他們有历史問題，中央正在审查。8月1日在杭州飯店召开的部分厅局长会議上，譚震林同志提到党代会上出現的宗派活动，背后策动人可能是楊思一。张光不相信中央，不相信省委，而相信楊思一，在严重的宗派主义思想指导下，採取二面派的阴謀活动手法，向中央控告，向省委申訴，誣蔑譚震林同志“主观臆断，是从个人兴趣出發”，極力为右派分子楊思一辯护。

4、二年来的表現：

（1）整風开始时經常宣揚右派謬論。儲安平提出“党天下”的謬論时，张光在几次学習会上都公开說“我看我們就是党天下，为什么还不敢公开承認，党天下有什么不好”。右派分子譚惕吾提出反党的“双軌制”后，他非常贊揚，到处說“这个意見很好，現在党委管得是太多了”。

（2）张光来厅工作二年来的表現，是意志衰退，情緒不

高。

二年来对工作是採取消極应付的态度，能推則推，能拖則拖，按步就班，毫无生气。

二、整風以来的态度

省党代会上代表們对张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錯誤言行紛紛进行了揭發，当时我們厅党代表小組，曾多次对他进行了帮助，但张光却无悔改之意，抵賴他反党宗派言行的錯誤，不是說主观是好的，就是說客观誤会，直到最近还装出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态度仍然極其狡猾。

三、我們的意見

根据以上主要事实，张光問題的性質是屬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十分恶劣和严重的。根据中央和省委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規定，我們意見应将张光划为右派，开除其党籍，撤消一切职务，由十級降为十五級。（已經省委批准）

中共浙江省农业厅党組关于右派分子张俊升反动言行的报告

（一九五八年八月五日）

张俊升，男，五十二岁，河北威县人，家庭出身貧农，本人成份自由职业，文化程度大学畢业。入伍前曾任国民党軍队上校团长。一九四五年六年起义入伍，一九四七年入党。历任新四軍浙东縱队旅长，副司令員，軍副参謀长，一九五六年初轉业至农业厅，现任副厅长，党組委員，他的主要反动言行是：

一、污蔑攻击省委领导，抗拒执行党組决議。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党組会上，馬月如同志传达省委的"二五"规划，讀到省委要求每个党組組員一年要为"求是"写二篇稿时，张很不滿地說"这是教条主义，脫离实际，写文章首先要給我时間"。一九五八年五月张去湘湖农場检查工作，在一次場的主要幹部座談会上，該場場长彙报情况时，提出"压倒皇天坂，赶上东湖"的口号，他說"听了你們的口号很好，我看是压倒农科所，爭取李丰平"，並在全場职工大会上大提而特提这一口号。六月下旬在湘湖农場参观稻苗生長情况时，他又提出"要爭取李丰平"。

一九五七年六月全省畜牧工作会議上，张对省委不拨飼料有意見，他火气冲冲地对宁波小組同志說："部队打仗要有弹药，省委决定下拨二亿斤粮食作飼料，为什么不拨？"並借口不了解情况而不参加会議。一九五七年十月省党代会对沙、楊問題将要作决議了，他还說"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並借口接待外宾在杭州飯店住了三天不去参加对沙、楊的辯論。直至最后还不發言，不表示态度。

一九五七年初在一次处长会議前夕談起幹部任免先以党組名义通知問題，他对孙順、任政等同志說："党組和行政不分"，"农业厅屬省人委領导，为什么又要农工部来領导？由农工部領导是否党政不分值得研究？"张俊升对党組的决議採取违抗的态度。如一九五七年初，党組責成由他負責处理机械管理局曾玉成問題，他在会議上表示同意，会后却迟迟不执行，說"曾玉成的問題还能把他搞到街上去嗎？"关于拖拉机手的处理問題，党組决定全部动員回家，待今后事业的發展再逐步吸收他們回来。而张对幹部处許耀祖同志說："关于拖拉机手的处理問題，我不同意党組意見"，对孙順同志說："这些人不能随便处理，軍队幹部不好处理"。

一九五七年八月，农工部批評农业厅反右派斗爭中有右傾情緒，张很不滿地給张敬堂同志写了一信，叫王逢友、张林签名、

並想不去参加部委召开的有关会議。同年九月党組決定将右派分子王谷正調离整風办公室，並批評了张林的严重右傾思想后，他对吳雁义同志說："幹部还是幹部，我們还是要用他的"。当张林哭了，他說："不該这样批判"。並且認为"人事处和党委会都是小青年，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一九五八年二月党組決定給张炳訓以留党察看二年和行政上撤职的处分。六月分王芳斋同志問他时，他說："现在处理意义不大，应該早处理，原来有个决定，处分太重，开除党籍，行政上撤职，我的意見是行政上处分，党內不一定开除党籍。"

一九五七年初，党組決定把机管局和农場处合併，他在会上表示"同意"，会后对錢肇鎣等散佈不滿情緒，說"关于机管局和农場处合併后的性質問題，我有意見，我思想不通"。

一九五八年六月去湖北省农业厅参观学習領导經驗时，张对該厅李厅长及办公室主任說："现在我們的工作就是赶不上去，党組的同志对党組書記有意見，省委也几次批評我們，你們究竟和省委怎样發生关系。"

整風后张敬堂同志和他交換意見，他說："我把槍桿子都交給党了，不会也不可能再到台灣去"。

二、严重的洩密，並散佈反动言論。

一九五八年六月和王芳斋同志去湖北参观农具时，张大肆宣揚自己过去的反共"本領"，說："我是有名的张大胡子，在起义前当过团长，和譚啓龙同志較量过。譚有教导队，我也有教导队，教导队对教导队，营对营，他有几个兵我都曉得，有一次和譚啓龙作战，打响之后，我叫副团长先打机关槍，他就是打不准，他們（指我軍）一下子擁上来了，我对副团长說：你看我的！一梭子五十粒，打倒三十六人。后来他們（我軍）象屎克螂一样一下子就退下去了。"

一九五八年六月去湘湖农場检查工作，把党內机密文件（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議上的报告、工作方法六十条）給政治历史上有

問題的下放幹部陈希看。

三、挑拨是非，制造矛盾，进行宗派拉攏，破坏党的团結。

张在平时經常散佈流言蜚語，說“×××是党內的王牌，×××是党外的王牌”，“张天成同志是随風草，是适应气候的”“楊副厅长是猴子脸”，“赵副厅长太年輕，缺乏經驗”，“张敬堂憑什么？就是憑省委委員”。

在整風期間，任政同志給刘介中提了很多意見，张背后对刘介中挑拨地說：“任政早就要整你了，我是不同意的”。一九五七年十月，厅整風領导小組不同意李安帮（已开除党籍）参加农場农具局整風領导小組，而张却在会上当着李的面說：“李副局长应当参加整風領导小組，他虽不是党員，但他与其他非党員情況不同，他过去虽犯了錯誤，但不是政治性問題，厅党組研究亦是这样的情況，講錯的話，由我負責”。

一九五八年六月党組对党員处长进行了排队，张把排队的情況歪曲是非地告訴王芳斋同志（副处长），他說：“老王，你怎么搞的，你搞了个不上不下。昨天党組研究处长級幹部排队，将你排到第二类。我的意見应排第一类，你工作积極艰苦，这一点党組大部分同志都承認的，就是你的思想問題。楊厅长提到你过去的一段思想問題，应划为第二类。张天成、任政同志都發表了意見。你在处里工作，楊俊达、张天成还不承認你。任政同志将你老婆退职問題，你找任政，你老婆找任政都聊出来了。张敬堂同志也提到你在长兴参加社会主义宣传时給他去过信，也給赵厅长去过信，你这些問題，楊俊达的看法是投机思想。經过这次排队，我才晓得你也是个宝貝。最后通过楊俊达同志的意見，还是把你划为第二类。”又說：“你南下后就当科长，为什么上不去呢？楊俊达說了之后事情清楚了。”一九五八年六月党組組員在部里集中学習之后，张对王芳斋同志說：“这次学習我發表了意見，过去那种做法是不对头的，有些人一定要把刘介中逼向那条道路，要划到那边去”（指右派道路）。为了拉攏宗派，以私人关

系安插人員，封官許願。一九五六年以他私人名义吸收了复員軍人岳魏洪、蔡文仲。該二人在吸收前經該局人事科审查有問題，岳犯过严重错誤而受开除党籍、行政上降級的处分；蔡过去系伪軍官，情况复杂。因而不同意吸收，但张以私人关系将該二人吸收了，並且以私人名义介紹去乔司农場工作，封岳为机务科长，蔡当加工厂主任。一九五六年机管局将拖拉机手蔣志忠下放至皇天坂农場工作，张未經組織同意封他为"拖拉机队队长"。一九五七年初該局将有政治历史問題的范乐增下放至湘湖农場工作，他又封他为"副場长"。

四、严重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長期鬧地位、名誉、待遇，对党不滿，工作不負責任。

一九五六年初，他从部队轉业至农业厅后，对地位不滿，說农业厅有个团級幹部当上副厅长。言下之意，認为自己地位太低了。由于沒有滿足个人主义的欲望。就消極怠工，开会或彙报研究工作，他不是打瞌睡，就是看报紙。

一九五八年七月由他带領代表团去北京参观农具展覽会，很不負責，一下車就利用机会去看自己的姪子，在五天中他只参观了一天半，其余时間就是拔牙齿，睡覺。参观結束叫他作总結並向大会彙报，他也拒絕不幹。

他来农业厅后已二年多，对自己分管的业务根本沒有鑽进去，只想做官，不想做事，飽食終日，无所用心。农場是他主管的，但連全省有几个农場也不知道。主管畜牧，很少和畜牧处同志研究工作，人家向他請示問題含含糊糊，提不出意見来。去年六月全省畜牧工作会議，照理应該由他主持，可是他强調剛学習回来不了解情况逃避参加会議。去年十二月全省畜牧工作会議叫他作总結报告，他也推来推去不幹，最后推給李光同志去总結。对农具改革工作一直沒有抓起来說"对这玩意兒不感兴趣"。在生活上过分强調特殊，来农业厅后事务管理局分配給他房子不要，而长期住旅舘，化了一千多元。

从上述問题来看，我們認为张俊升的国民党反动立場根本沒有改造，起义后虽在組織上入了党，但資产阶級的立場观点根深蒂固，个人主义極为严重。轉业后对地位、待遇长期不滿，当沒有滿足个人主义欲望时，对党就心怀不滿，离心离德，籠絡人員，拉攏宗派，散佈流言蜚語，进行挑拨是非，汚蔑攻击党的組織，破坏党的团結。决定将张俊升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其党籍。

（已經省委批准）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普通班二十支部关于右派分子刘德焜的政治結論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刘德焜，男，現年三十八岁，江苏丰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八年三月参加工作，同年六月入党。入校前任中共宁波市委書記。現为普通班二十支部学員，曾任二十支部支部書記。

刘德焜在右派猖狂进攻时期，曾借着向党提意見的机会，系統地攻击了党所領导的三反、新三反、肃反等运动，一九五六年的社会主义建設，以及当前的整風反右派斗爭，对党中央的正确領导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並对毛主席进行了汚蔑和誹謗。他的反动言行表現在以下几点：

一、否定三反、新三反、肃反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設的伟大成績

他認为三反运动"有很大的缺点和錯誤"，"浙江省有百分之九十的假老虎"，"其他各地也是这样"。原因是中央"对情况估計有偏差"，"将刘青山、张子善、宋德貴的典型作了一

般，产生了扩大化”。是“由上而下规定打虎数字，要求过急，限期發动，打不出老虎来就撤职。”而打虎的方法，又“实际上是大规模的逼供信”。他还認为三反运动“在党內思想准备不够”，所以“不符合群众路綫”。刘德焜对新三反同样認为中央把典型当作一般，新三反的根据是不足的。

刘德焜在一九五五年中央發布肃反指示时，就怀疑肃反运动的必要性，他認为肃反运动又“是重复了三反的錯誤”。他說：“肃反对情况的估計扩大化，由于潘、杨事件、胡風集团又把典型当作了一般。”百分之五的控制数，“是主观的，不合乎实际的”，“对敌情估計不够科學”。

刘德焜还反对党在肃反运动中的群众路綫，說是“憑着群众热情去斗、硬压”。又說：“这次肃反搞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多是历史的，現行的很少，而且多是清理中暴时露头的，不用那个方法（运动）进一步查对也可以搞出来。”

他說我們的肃反“使知識分子伤了心，加深了党和知識分子之間的墙和沟，……和知識分子的关系紧张，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他还同情社会上右派分子的意見，要求公审胡風、公布材料。說：“群众要求公布为什么不公布？不公布老压着是否合乎宪法？”“胡風是文艺反革命，不同于五类反革命”，他認为：“三批材料不足以說服人。”

总之，刘德焜对肃反运动的客观需要和伟大成績是完全否定的，因此，他不同意中央和主席对肃反运动的成績和缺点的估計。他恶意地質問：“只籠統說全国搞出八万反革命是不够的，是那些方面？是新的还是老的？是历史的还是現行的？斗爭面有多少？”还說：“光說成績是基本的，缺点錯誤是难免的，实际上不能解决問題。”

刘德焜对社会主义建設也进行了攻击。他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伟大跃进的一九五六年說成是紧张、混乱的一年。並且認为这

种情况是由中央"反右傾"造成的，是由主席提出的"多、快、好、省"四字方針造成的。

二、攻击党中央的正确領导，污蔑、誹謗党的領袖

刘德焜認为中央在几次运动中反右傾不实事求是，"矫枉过正也成了規律"，"要求过急"，說"限期發动是强迫命令，提到思想上就是主观主义"。他說："对几次运动的領导，中央沒有提出过自己的責任是什么。"

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著作，他認为党校学習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和資本論就是教条主义。他說："資本論是十九世紀的东西，离現实太远"。他認为学这些經典著作都是"离現实問題远，費力很大，收获不足"。

三、抗拒和阻挠整風反右派运动

刘德焜以上述对运动的态度来看待这次整風运动，他不同意中央对党內思想情况的估計。他認为党員的思想水平在逐年提高，三大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对中央提出三大主义有發展他有抵触情緒。他認为中央在这次运动中又犯了"要求过急、限期發动"的錯誤，"三大主义年年反，要求过急，欲速則不达"。在社会上右派分子借着党整風机会，对党猖狂进攻的时候，刘德焜对右派絲毫沒有表現什么仇恨，反而在小組里传播右派言論，如朗讀北大大字报"儒林內史"等。

校党委决定学員留校整風后，他片面地强調"以学習文件为主，联系思想是为了領会文件"，企圖逃避思想检查。他認为：校党委所整理的錯誤思想匯集的材料，不是"科学抽象"，不能当作大家的思想情况。他又到处散布自己小組和本支部都沒有什么問題的气氛。虽經領导小組再三啓發，他对自己的問題仍长期採取迴避、掩盖的态度，企圖蒙混过关。

八月上旬，支部提出他的問題后，他仍不肯进行检查，反而

利用别人代他向小組探听情况，进行摸底，以圖应付。在改选个别支委和支委分工时，他进行了一些非組織活动，来排斥反右派斗爭积極的同志，企圖繼續操縱支部領导。

由于刘德焜身为支部書記，他的錯誤思想行为不但妨碍了他自己問題的解决，而且严重的阻碍了整个支部反右派斗爭的开展。

八月中旬以来，支部对他进行了多次的个别談話和多次小組会、联組会、支部大会的批判教育。他对同志們的帮助虽然在表面上表示接受，但一直拒絕徹底交代自己的問題。十月十九日更發展到和支委公开对抗。最近，在十月底的联支大会上，他虽然給自己戴上了反党、反中央、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但对自己具体的思想活动交代仍不徹底。

从历史上看，刘德焜出身封建地主家庭，受过資产阶級的学校教育，在抗日民族革命高潮中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个人出路，参加革命以后，忽視馬克思列宁主义学習，不努力改造自己，因此他犯上述錯誤，不是偶然的。

根据以上事实和分析可以看出，刘德焜是一个未經根本改造的地主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在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他的立場、观点和党的路綫方針發生了根本抵触，由于严重的狂妄自大，他不肯認真学習党的路綫、政策，抛棄自己的錯誤立場，而是对党心怀不滿。在这次資产阶級右派对党猖狂进攻中，他就暴露了自己長期以来和党的的分歧，本能地配合了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为党內右派分子。

为了純潔党的組織，严肃党的紀律，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开除刘德焜的党籍。

中共浙江大学第二次党員大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成浩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一日）

李成浩，男，現年三十八岁，浙江余姚县人，家庭出身城市貧民，本人成份学生。一九四〇年六月在上海入党，一九四二年四月参加工作。历任政治交通、交委会委員、交委会代書記兼分站长、随軍工作团分队长、区委書記兼区长、交通总站站长、工作队中队委員兼組长、民工管理科副科长、排副、教导員、接管准委会組織部幹事、省委組織部幹事、副处长、处长、現任浙大党委会副書記。他的主要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恶事实如下：

一、有組織有計划的反对和破坏肃反运动

1.肃反运动开始，他就以"省委組織部的幹部都是經过挑选的，不可能有反革命分子"为借口来对抗运动。当領导上提出联系实际，对肃反对象开展斗爭时，他却强調以学習文件为主来对抗領导。他主张肃反要和审幹一样，只有先把事实調查清楚以后，才能怀疑、斗爭。当时領导上批評他右傾，他認为这是压制民主，並揚言肃反运动中，"除了肃反斗爭以外，还有民主与反民主的斗爭"。

2.反对肃反的組織領导。他認为肃反运动中的五人小組是违反党的組織原則的，說苏联出过貝利亚，中国出过高崗、饒漱石，五人小組領导肃反很可能要冤枉好人。

3.否定肃反成績。在临調出省委組織部的一次部委会議上，說肃反存在六大問題：（1）組織部对內情况估計不足，肃反不

够实事求是；（2）政策界限不清；（3）在当时这样的組織（指五人小組)領导下自己要發揮作用也很困难；（4）斗爭策略不是先检查自己；（5）对党內右傾思想的批判压制了民主，压制了群众的积極性；（6）作結論处理时对中央的方針、政策执行不够严肃，脫离实际，材料出入很大。他不仅全盘的否定了省委組織部的肃反成績，而且否定全国的肃反成績。他認为中国受了斯大林的影响，也有"扩大化"的現象。

4.李成浩在肃反問題上为了坚持他的敌对立場，在一九五六年七月間，利用他支部書記和处长的职权非法的把肃反中被斗爭过的对象召集一起开会，要那些斗爭对象訴肃反的苦。会議上有些肃反对象恶毒地攻击肃反領导，說"肃反領导是阿Q精神、是带着有色眼鏡套材料"。李对这种污蔑党的自論不仅加以批判，相反的說："这些情况是难免的，应当分別对待，有些是肃反本身的缺点，錯誤"。甚至还助紂为虐的說："这是布尔什維克的义憤"。由于李这一系列的罪恶活动，省委組織部曾一度被那些坏分子闹得烏烟瘴气。

李成浩不仅在省委組織部恶毒地攻击肃反运动，而且在他調来浙大之后，仍是旧調重弹。一九五七年三月在总支書記会議上佈置肃反总結时說："不屬百分之五而斗爭的，要公开道歉，誰斗的由誰道歉。"

二、反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1.一九五七年四月間学習"再論无产阶級专政的历史經驗"时，在机械系学習小組长会議上，袁若林彙报：有人認为等額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不民主。李当时也插着說："是不够民主嘛，我也有意见。"

2.李在省委組織部时，强調分权，强調民主，反对集中与統一，他說："部长包办处的工作，分管部长到处里来一拉，处的工作积極性就發揮不起来。"他主张成立处委，並主张有些文件

不要部里审批，处里就可以签發。

三、反对整党建党的方針政策和路綫

1.根据王奎閣、陶匯章等同志揭發，李在省委組織部反对党的建党路綫，主张接收富裕农民和一貫道徒入党。他認为富裕农民参加合作社之后，經济基础改变了，只要“其他条件够了”就可以接收入党，並主张今后不要强調批判剝削思想、資本主义思想，所以在省委組織部討論富裕农民入党問題时，李反对部里提出的不吸收富裕农民入党。为了証明他的正确，他还搜集了有关材料，与办公室主任爭論。当中央“組織工作”上指示一般不吸收富裕农民入党，但对其中个别的經过社会主义斗爭考驗具备入党条件的人可以吸收入党以后，便更积極的提出發展富裕中农入党並与姚震同志不止一次的爭論。当省委組織部准备在“浙江組織工作”上刊發富裕农民一般不接收入党时，李坚决不同意。他还主张接收一貫道徒入党，为此，他还作了“典型調查”，認为有的县百分之七十—八十是一貫道徒，不吸收他們入党要影响建党計划及他們的积極性。認为不吸收他們入党是关門主义。不吸收他們入党要影响生产。

据陶匯章同志揭發，李成浩在建党問題上还主张降低党員質量。他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全处幹部会議上說：“有些非党員在党外进不来也有意見，建党質量与数量有矛盾，我們抓着質量問題不放，影响了非党积極分子的积極性。”

李怀疑建党政策，認为“有些建党政策值得研究，例如一貫道問題，富裕农民問題，独立劳动者問題等等”。

2.李成浩在党的建設上，怀疑党的方針政策，否定整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曾在省委組織部部务会議上說：“一九五五年整党开始以清洗坏分子为主的方針是錯誤的，主要是受了肃反运动的影响。”又說：“一九五五年整党面很大，組織处理有偏差，今年整党有些党員听到整党就害怕”，所以一九五六年他要

人家不提整党，只提通过貫徹省二次党代会来达到整党的目的。他还否定过去整党的成績，对过去整党提出一系列的問題。說："过去整党中教育是否充分？处分是否正确？处分是否做了工作？革命与反革命的界綫是否划清了？是否处理錯了？"又說：一九五一年大整党的方針不切合实际，（1）孤立整党；（2）单純的处理八种坏分子，有否打击过寬；（3）工作队方式，不依靠支部。

3.在处理党籍問題上，李一貫主张"为被告者着想"。有李明道等多人应該清洗出党的叛党自首分子，李不及时处理。只相信叛党分子，不相信县委組織部的調查。甚至还叫沈郁瑾和有叛党嫌疑的赵桂香到各地去核对材料，使有些坏分子不能及时清洗出党。

四、关于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問題上的机会主义表現

据李子敬同志揭發：李对苏联出兵帮助匈牙利鎮压反革命表示不滿：一九五六年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在省委組織部召开党委書記会議时，报上公佈南斯拉夫在联合国对苏联出兵帮助匈牙利問題棄权，李在談論这問題时指着报紙說："苏联出兵匈牙利，南斯拉夫就棄权，这問題值得研究"。在一次小組学習会前又說："第二次出兵是应該，第一次出兵是否必要还值得考慮。"还說："鉄托的看法是有些道理的"。

五、在鳴放、反右斗派爭中的表現

1.去年五、六月間，党外右派分子攻击党的第一支毒箭就是否定浙大的肃反成績，李当时未經党委的同意擅自向群众做肃反总結报告。在报告中对肃反的必要性和成績未加肯定与分析，只是說肃反中斗了一百三十八人，現行反革命分子一人，这样造成了后来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借口，右派分子攻击肃反运动說，浙大肃反是一比一百三十八，究竟成績是主要的？还是缺点

是主要的。

同时在那次大会上又公开的向肃反对象王子香道歉，說王健英同志过去在大会上講王子香是假自杀，对这一点表示歉意。（王子香当时是肃反对象，問題非常严重，王为了破坏肃反运动假自杀，王健英同志在大会上揭發批判是完全正确的。）

2.鳴放中肃反对象李鍼奇、泮鶴声、居大圯、秦大年等人組成平反小集团去找李談，李和他們說："肃反問題很大，人很多，錯的情况很可能的"，並答应他們到肃反办公室去看档案材料，有些是錯的材料可以拿回去修改。

3.去年六月十二日公共教研組座談会上，党內外右派分子激烈攻击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那篇社論，說人民日报是压服不是說服，共产党沒有雅量等。而当时李成浩的發言說："有不同的意見齐放争鳴会搞得更好，过去領导上是畏首畏尾，是被动的，怕爭了以后压制了別的意見，今天却不是这情况。首先应該講現在不是收而是深入一步的放，大家不要有顧虑，对三害的斗爭决心还很强，是否还可打破顧虑鳴放，自己認为是对的应該講。人民日报社論的观点看法我想毛主席已講到：老幹部能不能批評？馬列主义能不能批評？只有批評才能辯明真理，究竟誰对誰錯还要大家爭鳴，一致公認。根据自己的理解大家爭鳴，最后得出真正的群众路綫的真理，这是最正确的。去掉三大主义，提高馬列主义水平，大家都要打破顧虑，維护真理，勇于为真理辯护。"

4.右派分子为了攻击党的人事工作，組織調查組，調查退职退休問題，李未經党委討論擅自批准成立此組織。並認为这个組織沒有什么錯。其实这个組織所做的事完全是反党活动。

5.右派分子为了篡夺总务部門学習分会的領导权，提出学習分会不要共产党員参加，李也表示同意。

6.右派分子为了达到反对馬列主义的目的提出政治不考試，李也同意不考試，改为考查，或带帯"考"。

7."还我教授、撤职霍校长"也是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一支毒箭。李在机械系二、三年級同学中报告說：党委对爭取归还教授是做了許多工作的。另外在总支書記会議上說：党員也可以在撤消霍校长的大字报上签名，因为霍校长自己也是不願意当校长。

8.混淆敌我与人民內部的矛盾，去年六月底李在公共教研組領导小組会上說：右派分子是人民內部矛盾。

9.公共教研組陈良劲有很多反动言行，总支三、四次提出划为右派，李認为陈的反动言行是因为肃反中被斗錯了，鳴放中乘此机会出一口气，因而不同意划为右派。

根据以上事实，党員大会一致認为李成浩是一个完整的資产阶級修正主义者，是資产阶級在党內的代理人。由于他这一系列的罪恶活动，已給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損失。党委对他进行过多次的帮助，但李成浩对錯誤的态度很不自覚，开始在党委会和党委扩大会上交代时吞吞吐吐，模稜两可，只談現象，不談本質，只談經过，不談思想，多方解释錯誤客观原因，甚至还强調自己正确的一面。經过党委扩大会特别是党員大会几次揭發和批判之后，直到目前，虽然承認了一些已經揭發出来的錯誤事实，但在一些重要的問題上还是躲躲閃閃。

根据以上情况，党委会一致認为李成浩是党內的右派分子，为了純潔与巩固党的組織，經党員大会通过，开除其党籍，撤消一切职务，由十二級降为十七級。

中共河南省人民委員会
人事局支部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同中玉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同中玉，男，河南省唐河县人，現年五十一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教員，一九二八年入党，同年入伍。曾任鄂豫边区工委組織部、宣传部部长，特委書記，中央党务研究室研究員，地委組織部长，省委組織部組織处处长、副部长兼省人民委員会人事局局长等职。

同中玉虽然参加党已有三十年的历史，为党作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沒有得到改造，长期驕傲自滿，摆老資格，对党的历次政治运动不滿，因而墮落为資产阶級右派。其主要反动言行如下：

一、不滿党的历次政治运动，乘整風之机猖狂向党进攻，积極破坏反右派斗爭

同中玉从一九四三年在延安审幹中被审查后，长期以来对党的历次整党、审幹、三反、肃反等政治运动抱有不滿情緒，認为"錯打錯斗現象严重，伤人过多"。一九五五年八月同調人事局工作后，当时局內一部分县以上領导幹部正对前副局长、党分組副書記李繼胜（右派分子）挑拨幹部关系、制造派别活动，对在审幹、肃反中犯有錯誤的王青才（前二科副科长）、魏文超（前編委办公室副主任）进行袒护等錯誤，开展着思想斗爭。他到局不久主持处理上述問題时，由于他在思想上对党的政治运动长期存在錯誤

的观点，並且一貫擺老資格，自以为是，在处理过程中，不是按照党的政策，听取群众的意見严肃对待；而是片面听取犯錯誤者不符实际的狡辯。他在所謂"防止过火斗爭""强調团結"的借口下，百般为犯錯誤者开脫。不讓支部进行严肃的处理，不相信外調屬实的材料，採取了压制的办法遏止群众所进行的正确批評。並且把这一严肃的政治思想斗爭說成是无原則糾紛，混淆大是大非的界綫。当別人不同意他的这种做法时，他便怀恨在心，說对他"不尊重"、"頂得很厉害"。反而把对王育才長期不向組織交待其反革命哥哥的历史，魏文超隐瞞政治历史所开展的批評，歪曲为"残酷斗爭、无情打击"。把对李繼胜所犯反党活动所进行的思想斗爭，歪曲为"整的下不了台"。並且和李繼胜一起，污蔑坚持正确意見的同志是"宗派主义"。

整風运动开始以后，同中玉認为时机已到，便猖狂的带头向党进攻。他在第一次动員全局人員鳴放大会上就首当其冲，向党开炮。煽动說："人事局的肃反、审幹、工資、福利等很多都不能令人滿意，大家鳴放要从最切身的問題揭發。"后来他又不讓其他党分組成員、支部成員和其他党員参加，独自主持召开了党外人員座談会。在座談会上，他进一步別有用心的煽动群众，要大家"从重大政策实施上的根本性問題鳴放"。把会中許多反动言論一律肯定为"百分之百的正确"，"有价值"。对右派分子彭松山、楊超平、譚好生恶毒的攻击党的領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肃反运动，反对統購統銷政策等反党言論說成为"很活跃"，"很精彩"，"得到很大好处"，而大加表揚。与此同时，同中玉暗示右派分子彭松山，策动审幹、肃反对象魏文超向党进攻。私自盗用党分組名义請求省委肃反五人小組，給肃反中叛党自杀的魯吳孔昭雪，攻击肃反运动。背着党分組和党支部組織了所謂"宣传鼓动組"，与党分庭抗禮。在他的带头进攻和积極煽动下，一度把人事局搞得烏烟瘴气。同中玉实际上已成为人事局右派分子的司令官。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同中玉見到形势不佳，惟恐暴露自己的真面目，便利用职权上的方便，百般阻挠破坏反右派斗爭。他首先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故意把反右派斗爭說成是人民內部矛盾。把右派分子彭松山的大字报中最反动的部分在上报省委、省人委时删掉。进一步宣揚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論是“抓住了人事局的要害，推动了鳴放”，是“大无畏的精神”，以松懈群众斗志，混淆是非，欺蒙領导。当群众反右派斗爭的要求高涨时，他便採取了压制手段，公开阻挠。在全局人員大会上斥責要求反右派斗爭的同志說：“又要人家提意見，又要批判人家，这叫啥！”並說：“你們过去整了人家，现在人家給你們提意見，揭了你們的秃疮疙疤，就是疼呀！疼呀！要是我同中玉，駡我几句也沒啥”。並且又背着領导小組，把右派分子楊超平两次上报为左派。对楊超平的反党言行連小組批判也不允許，並限制群众不准說楊有右派言論。在他的这种反动言行繼續受到群众的反对后，他的反党活动就更加活跃。他与右派分子李繼胜密謀，借緊縮机构下放幹部的名义，将坚持反右派斗爭的骨幹和积極分子大量外調；繼續宣揚右派分子的反动論点；鼓励右派分子彭松山不要害怕，指示彭作假检討，企圖蒙混过关；同时捏造材料，並以“这是对于幹部的一次考驗”等卑鄙手段对群众进行拉攏，始終与党为敌。

二、一貫目无組織，独断专行，反对党的領导

1.居功驕傲，摆老資格，把个人放在組織之上。在所謂怕影响下級幹部發言的謬論下，在人事局两年多的时間內，只参加过一次党的生活会。

2.在工作中一貫破坏党的集体領导原则，实行家长式的領导，作風極不民主。长期不召开分党組会議和局务会議，自一九五七年五月到一九五八年一月，八个多月沒开过分党組会議，一年多时間沒开过局务会議。重大工作都由个人决定。就是偶然开

会，也仍是按个人意見办事。对不同意見，不充分討論，不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3.經常散布流言蜚語，破坏省委領导同志的威信。同在一次参加了省委常委討論全省整編方案的会議后，很不滿意的說："省委呀！討論編制时，你一言，我一語，說了半天，也沒說出个啥道道来。"他因对省委書記赵文甫同志不滿，就散布說"人直了吃不开"（意思是說他因为正直而得罪了赵書記），来破坏領导威信。从他历次鑑定材料来看，一貫的驕傲自滿，認为党对他重視不够，使用不当，存在名誉地位思想，对党不滿。

在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与其开展斗爭中，态度極端恶劣，在确凿事实面前，仍然狡猾抵賴，不老实低头認罪，企圖蒙混过关，直到現在还不承認是有意識的向党进攻。为了純潔党的組織，經支部大会通过，开除其党籍，並建議行政上撤銷其一切职务，实行留用察看，工資級別由十級降为十九級。

（已經中央批准）

中共河南省人民委員会人事局支部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繼胜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李繼胜，男，三十七岁，山西省襄垣县人，地主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八年五月参加革命，同年六月入党。曾任县牺盟会协助員、太行五分区农救总会宣传委員、县抗联主席、中共县委宣传部长、副县长、县长，中共中央中南局組織部行政科长、中南行政委員会人事局办公室主任、河南省人事局副局长等

职。

李樾胜参加党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在过去也曾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沒有得到改造，长时期以来在党內进行破坏党的团結的活动，並且誣蔑合作化和統購統銷政策，趁党整風之机和其他右派分子一起积極向党进攻。其主要反动言行如下：

一、一貫貪生怕死，計較名誉地位，玩弄两面手法，破坏党內团結

一九四八年李在豫皖苏四分区工作时，因敌情紧张，积極要求調到环境比較稳定的地区去，並說"临埠地区水沟多，一旦敌人追来，不被打死，也会淹死"。后来組織上把他調到沈丘县工作后，在派其担任該县支援淮海战役支前队长时，李白天怕飞机，黑夜怕炮弹，躲在防空洞里不出来，讓勤务員給送飯吃，並还无恥地說："飞机太多，这家伙和人无情。"一九五一年在中南局組織部任行政科长期間，他認为事务工作被人鄙視，长期情緒消沉。后来到中南行政委員会人事局任办公室主任时，又为正副主任分工問題对組織不滿。一九五五年三月来河南省人事局工作后，仍辜負党的期望，不积極努力工作，一方面自持特殊，官气十足，經常上班迟到早退(每次最少迟到在半小时以上)，长期不过党的組織生活，对工作不負責任，所計較的是坐汽車、領安家补助费、住房等問題；另一方面，却又为了抬高自己打击别人，违背党的原則，积極拉攏犯錯誤的人，培植个人势力，进行派别活动。一九五五年，李利用直接領导肃反运动的方便，对前二科副科长王育才同志隐瞞地主成分，不向組織上交代其反革命哥哥的政治历史等錯誤行为进行袒护，故意顚倒黑白，把党內对王所开展的政治思想斗爭誣蔑为"相互之間有私人意見"，並当着王的面否定已經調查屬实的材料。对于前編委会办公室副主任魏文超同志有人检举其参加中統特务的嫌疑問題，在未取得充分旁証材料

前就加以否定，不主张外調，同时还誣蔑反映情况的省气象局局长王治国同志“思想意識不好”，說“魏与王过去曾在一起工作过，两个人可能有私人意見”。对于长期隐瞞反革命父亲的政治罪恶經再三教育拒絕交代而被取消候补党員資格的高鶴年（現系右派分子），李亲自参加支部大会举手通过，背后又說“眞可惜”。对参加工作前（在土改时）曾經帮助反动富农家庭对抗群众算賬，参加工作后又未改变原剝削阶級立場、个人主义严重的彭松山（右派分子），因能迎合其思想，便积極活动要提拔彭为第三科副科长（因遭反对，未遂）。把前人事厅厅长李剑波同志在向他介紹幹部情况时說武殿明（右派）脑子有点胡塗，說成是对武的侮辱。抓住彭松山（右派分子）在肃反小組会上說人事局有宗派主义情緒一句話，便无根据的大肆宣揚說人事局有宗派主义。

一九五五年八月同中玉（右派分子）到人事局担任局长后，李又背着分党組和其他領导同志，把他一手所制造的所謂“人事局有宗派主义”的反党思想，积極向同灌輸。当大家同他这种錯誤行为开展斗爭后，在同中玉的主持下召开了有关县級以上部分幹部会，李見到形势对自己不利，又假装检討性地說：“沒有宗派主义，是自己弄錯了”。但到一九五七年李从中央高級党校放寒假回郑，却又背地里对同中玉說：“过去大家对他的批評，思想上不能接受。”同时策动同中玉为在肃反运动中叛党自杀的魯笑孔昭雪，企圖把魯的自杀說成是所謂“宗派主义”者整死的，以此和同中玉的所謂：历次政治运动伤人太多的思想相吻合，嫁禍别人。

二、积極同右派分子同中玉阻挠破坏反右派斗爭

李是机关整風領导小組的副組长，对群众要求向右派分子彭松山、楊超平开展斗爭，不予支持，公开不表示任何态度，暗地里却和同中玉一起进行阻挠，对同說：“彭松山不是右派，永远

也划不上”，“中央高級党校的右派分子都是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彭松山的材料够不上划右派的条件”。为了徹底遏止反右派斗爭，又借紧縮机构、下放幹部和調一部分幹部作文教工作的机会，与右派分子同中玉密謀，把坚持反右派斗爭的骨幹和积極分子大量外調，在省委指示停止我局下放幹部后，李和同仍坚持下放，並将右派分子楊超平也上了下放幹部的光荣榜，公开对抗省委的指示，阻止群众斗爭，保护楊超平。与此同时，策动肃反审幹对象魏文超向党进攻。当領导小組会上大家要划彭松山为右派时，李一面說：“是否右派，我无定見”；一面又在散会后馬上催促同中玉赶快到省委找馮登紫副部长談一談，企圖蒙混領导。特別恶劣的是，李要将坚持斗爭、积極揭發其在肃反运动中打击陷害好人的楊文元同志說成是“泄露肃反机密，攻击領导”。企圖将楊划为右派分子，进行陷害。

三、对苏联紅軍援助匈牙利平息叛乱和党的合作化运动，統購統銷政策不滿

一九五七年李在中央高級党校学習时，对苏联出兵援助匈牙利平息叛乱不滿，質問别人，“有什么理由？”誣蔑合作化运动說：“乡政府的油票、布票沒人要，上中农收入減少，判五年徒刑也要退社。”並說：“河南灵宝出苹果，但无苹果吃，出花生但沒有花生吃。”並說“省委，省人委站崗取銷后，群众打官司的增多了”（純系捏造）。以此攻击党的合作化运动和統購統銷政策，丑化党群关系。

李繼胜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在被斗爭中，态度仍然極为狡猾，在鉄的事实面前仍採取蒙混抵賴，避重就輕，拒不老实交代。經支部大会通过，开除其党籍，並建議行政上給予撤消一切职务，实行劳动教养。

中共洛阳地委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巨和勤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巨和勤，男，現年四十三岁，山西省安澤县人，貧农出身，小手工业者成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一年参加工作。曾任区长、县府科长、副县长、县长、县委書記、专員、地委副書記等职。

巨在平时阳奉阴违，好人主义，对坏人坏事不斗爭。如历史反革命分子毛友峰已被开除回家不該恢复工作，而找到巨后，他个人决定“令財貿部分配工作”。已被开除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賈金荣，也是巨决定分配到教育科工作的，当时有的同志曾提出不同意見，巨非叫安置不可，同时还召开公、监、检、法四个部門会議，叫改原判决書，会上大家不同意，巨說“不改也行，反正糊糊塗塗收回算了吧！”巨参加研究对伊阳王蔓美坏分子开除回家的处理，当时他表示同意，而在处理时，却按退职办法处理，並錯誤的認为“这是为了避免人民內部矛盾”。一九五七年秋季在省里开粮食会議，給各县分配購粮任务，撇开原有基础，以主观願望出發，因此偏差很大，回来也不向地委全面彙报。

整風开始他是地委整風領导小組成員之一，却于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在专署党員科长鳴放会議上放毒，說：“中心和部門的矛盾，这是牵連到領导作風問題，从党委看，有包办代替，各部門有依賴思想，感到咱說不算，以党代政从上到下，不是一天，是很长时間了”，“地委啥事就包办，攬事太多，不能冷靜考慮重大問題，領导和被領导有些工作抓的多，有些沾不上边”，

“另外發展到党委部門的幹部提拔的快，形成宗派主义”，“这个原因是对統筹兼顧、統一安排搞的不好。”整風鳴放以后他回家（山西安澤县）一趟、回來后認为合作化搞糟了，对李天堂同志說：“在我們那里，过去是米粮川，現在是沒啥吃，我回去了解眞实情况是这样的。”在反右派斗爭中，他与右派分子晉东平談話說：“地委苏副書記几个問題都决定錯了，如三門峽物資供应問題錯了，人民医院問題都处理錯了。”有意誣蔑領导，整風中地委批評运輸站不給調車問題，亘不仅不教育站上幹部，反而挑撥說“地委有权，要威風”。

亘和勤虽然出身成份好，参加工作后也为党作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資产阶級本質未得到徹底改造，在处理原則問題上丧失立場，上下应付。阳奉阴违，执行党的政策沒有原則性，对坏人坏事不斗爭。整風大鳴大放之时，他向党的組織、幹部政策、农业合作化等根本性質的問題进行了攻击誣蔑，企圖取消党对政府的領导，反右派中对自己反党論点不作检查，地委扩大会議揭發他的問題后，仍企圖瞞混过关，会上承認，会后推翻，並說“眞不行了，只有假检討”，“自己原意不是这样”，“記录搞糟了”，“是帅不强，将遭殃”，“記录害了他”等，企圖爭取別人同情，最后在同志們斗爭帮助下，才作了检討。从以上事实說明亘和勤已构成右派分子，根据中央处理右派分子的規定，地委决定开除右派分子亘和勤的党籍。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石天行的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五日）

右派分子石天行原系本校普遍班第十八支部学員，在本校反右派斗爭中，第十八支部的同志揭發了石天行很多極为严重的錯誤，經过支部大会的批判和全校学員的批判、討論，业已徹底揭露石天行的右派面目。第十八支部根据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和石天行的錯誤性質，已于支部大会上通过决定将他划为右派分子並开除出党。党委会經过严肃愼重的研究之后，同意第十八支部的决定。这一决定已报請中央审批，中央征求了江西省委的意見，得到了江西省委的贊同，最后中央也已批准这一决定。

附：中共中央高級党校普通班第十八支部关于右派分子石天行的政治結論

（一）簡　历

石天行四十岁，江西省乐平县人。一九三七年八月参加工作，一九三八年四月入党。历任区委書記、县委委員、县委書記，淮南日报社社长兼总編輯，大众日报社通訊部副部长，紡織厂厂长，省木材公司經理，省建筑工程局局长等职。来校前任江

西省委工业部第二副部长。

（二）主要錯誤事实

（1）否定中央正确領导，污蔑攻击党中央

石天行認为中央几年来領导有“左傾”和“冒进”的錯誤。他指責說“几年来發生的左右偏差，实在太大，損失太大”，“反右傾很徹底，反左傾不具体，无控制数字，所以往往冒进”。他說“風都是从上往下刮，一級比一級大”，並把責任推之于中央的“好大喜功”。他与社会上右派分子一样認为：“成績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有些公式化，到处套用”。污蔑：“上边缺点都是归結为情况变化上，是辯証法，”据此指責中央及中央負責同志“自我批評精神不够”。

他歪曲当前农民生活的真实面貌，他說“农民生活确实苦”，从而怀疑农民参加合作社的自愿性及合作化后的增产数字，提出要“中央对农业增产应重新估价”。

他否定党加强工业战綫幹部的正确性，他說：“轉工业把农业幹部抽空了，下面抽空，上面人浮于事”，“这是个带路綫性的錯誤，应追查責任”。

（2）攻击江西省委，否定企业党委領导制度

石天行污蔑江西省委的負責同志是：“不了解情况，不認真研究工作，不学習理論”，缺乏群众路綫的严重的官僚主义者和經驗主义者。並且認为：“江西的老幹部多，选举时新幹部很难选上”，“有些人年龄大了，体質太弱，实在不能工作，硬要照顧，占茅房不拉屎”。他認为江西党对他“使用不当”特别恶毒的是詆毁江西省委“爱歪才，很世故的人；真正脚踏实地工作的人並不多，而且还吃不开”。

他否定党对国家企业的領导，他認为“有些企业党委成問題，只找麻煩，不起作用。有了缺点錯誤說是行政管理不善；工作上有了成績就說是党委的，这样書記总不会犯錯誤”。

（3）污蔑党的幹部政策，主张改变党的幹部管理制度

石天行說：“做工作要有‘靠山’，有人說党內要認个‘干老子’才行。我感到也有道理。”他又說：“有的同志很世故，善于附和領导意見，摸領导的脾气、关系，这样反而吃的开。”

在幹部管理制度上，他主张：“共产党員在选择工作和地区上应有更多自由，可以大計划小自由”，甚至他还認为在幹部調配上也要使用“价値規律”。他主张調往边远地区的幹部“可以提高他們的地位和待遇”。

（4）丑化党的民主生活，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

小組讀了少奇同志在湖南的报告，有的同志提出“要坚持原則”“头上要长角”。他說：“长角不容易，誰敢頂，不长角还好，长了角不仅会鋸掉角，而且会砍掉脑袋。”他認为“党內民主仍然不够”，“有些領导同志不願听反面意見”。並說“党內有这样一些人，在中央反右的时候馬上可以拿出右的材料来，反左的时候馬上可以拿出左的材料来，並且还有数目字”。

他反对党的选举制度，他埋怨党內的选举“不許竞选”，“不許活动”，“等額选举是形式主义”是“不相信群众的觉悟”。

（5）积極推崇右派分子言論，为右派分子辯护

在大鳴大放期間，他曾說：“对党外人士（右派分子在內）所提意見，基本符合整風精神”；“不能說你好，你就高兴，說你不好，你就不高兴”。甚至对葛佩琦也認为是党整了他，才發表了坚决反党言論。他特別賛賞费孝通的“江村調查”的文章，說是“硬是把道理說透了，小組同志都应看看”。当小組討論右派分子张宗麟的反党錯誤时，他認为可能是党“对张使用不当”。直到八月三十日他还認为：“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与反右派斗爭有矛盾”。並說“除了主席講的六条标准，还有什么放的呢？就沒有人敢放了”。

（三）錯誤的根源

石天行發表了以上一系列的錯誤言論，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的。

石天行出身于破落小地主家庭，受地主資产阶級的教育較深。入党以后，未得到根本改造。解放后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慾望就益滋长。在一九五一年去香港採購紡績机器时，就接受商人賄賂三千五百元港幣，並出入于賭場舞厅，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員应有的品質。为此在"三反"中受了处分。他虽一时表面上老实起来，但內心对党不滿，离心离德，阳奉阴违。他在入学前写的讀"关于論无产阶級专政的历史經驗"的笔記中，就暴露了他对无产阶級专政、民主集中制和社会主义計划經济制度等問題上的反动观点。所以当鳴放时期，石天行就站在資产阶級右派立場上公然向党进攻了。

（四）对錯誤的态度

石天行在对待自己的錯誤态度上是極其不老实的。他一开始就尽力縮小和掩盖其錯誤事实，企圖蒙混过关。他的阴謀破产后，更进一步下决心对組織进行欺騙，一再串通他爱人（蔣华）塗改向中央提意見时的發言提綱，甚至伪造信件，撕毁証据，企圖灭跡。在核对他的錯誤言行材料过程中，他仍然狡辯抵賴。他在支部大会做检討时，虽較前有了些进步，表面低头認罪，承認他是党內右派分子，願意接受改造，重新作人。但他会后所写的正式書面检討，仍把錯誤縮小为严重右傾思想問題。在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二两日对早經核对清楚的、也为他历次承認了的錯誤事实材料，提出了十九点修正意見。仍企圖縮小錯誤和翻案。經过支部大会再度批判后，又做了書面的补充检討，終于承認了他的一系列反党言論和他在检討过程中的錯誤态度。

（五）結 論

根据石天行以上的錯誤事实，可以看出，当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时，他公然站在資产阶級右派立場，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成为党内的右派分子。

为了巩固党的組織，純潔党的队伍。根据党中央处理党內右派分子的原則，第十八支部大会全体同志一致通过，开除石天行的党籍。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中共江西省委組織部关于右派分子金凱的处理結論

（一九五八年四月三日）

金凱，男，現年三十五岁，浙江慈溪县人，本人学生成份，家庭出身地主，現有文化程度大学，一九四二年参加新四軍，一九四五年入党，历任文工队員，报紙編輯，採訪科长，新华分社記者，採編主任，副主任，副科长，一九五七年任新华社江西分社社长。其主要反动言行如下：

一、一貫对党不满，对抗領导

金凱，从湖南調江西工作后，常說湖南分社和党支部“一团糟”彼此“勾心斗角”。在平时金对湖南省委和总社領导逐个評論，說省委書記周小舟和宣传部长唐麟同志“官架子大”。金又說：“总社×××是个外交官，常随周总理出国不管新华社的事情，×××是个大肚子，什么意見都能容納，就是不頂事。”

金凯还經常在同志中散佈“向总社提意見不解决問題”，並說：“总社开会也不解决問題，事先准备好了的一套报告，沒有什么味道”，“分社长去总社开会象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金調江西前后，曾向总社提出“原在江西分社的記者全部‘刮掉’否則不來”，从而迫使总社把原在江西的三个記者調走了。他們选择幹部的原則是“单純”肯幹。

在鳴放初期，金有意挑拨分社記者与总社的关系說：“总社眼里只有几个大分社，不重視江西小分社”。在学習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时，金对記者們說：“总社企圖把矛盾轉到分社头上来，实际分社和記者是沒有矛盾的，記者的矛盾主要是和总社的矛盾。”

在“左叶”事件發生后，金認为江西也有“左叶”，並积極活动召开江西新聞界座談会。

二、篡改分社工作方向，不搞反右派斗爭的报道

从今年三月以来，金在記者中極力渲染“稿件沒有出路記者处在半失业状态”。当有的記者因發不出稿件而着急时，金說：“稿件沒有出路，只有写专稿，不要搞中心工作报道，要鑽冷門”。又說：“不要光看到中央几家报紙，眼应向下看，省报、地委报、县委，还有很多杂誌，都可給他們写稿”，“只要用一个記者頂着，給总社發新聞，其余的記者都可以下去写专稿。”金先后两次赴上犹江电站去採訪专稿。从而在一九五七年五、六月間很多記者在金的指示下，也去採专稿了。

反右派斗爭开始，記者們要求研究参加反右派斗爭的报道，金說：“估計發不出什么稿子。”

总社决定王介方（金的妻子，以下简称王）和另一个記者去罗隆基家乡里採訪。王介方对另一个記者說：“老金对我說，現在还工作幹什么？”

三、策动群众鬧事、搞大民主，向八省分社点火，联名通电，反对总社

在大鳴大放期間，金以"稿件沒有出路"問題說："当前国內分社的主要矛盾是稿件出路問題，总社学習苏联先进經驗是教条主义，稿件只管發不管用，就是从塔斯社学来的。"在这同时积極的串連了河南、广东、福建、湖南等八个省共二十个記者向总社联名通电。

五月十八日，金、王起草电报稿說："总社的官僚主义，已發展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当前地方分社新聞出路几乎陷于絕境，形势的严重，已逼着我們从根本上考虑改变地方分社的任务和业务方針。新聞无出路，分社記者首当其冲，因此，我們体会之深，苦悶之甚，决非总社領导所能深切体会。召开記者代表大会，总社領导听一听直接生产者——分社記者呼声、苦衷，听一听直接受苦者——分社記者对解决这一問題的見解，帮助总社整風，克服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並表示"现状不改变，我們决不停止这一斗爭"。

在金的授意下，王介方、馬鐘明积極的和別省分社串連。在串連中，金指示說："只串連对稿件有苦悶的社，只串連記者，不串連社长。"王說："现在不要告訴总社，这样他們会有准备，等串連好后，再告訴总社。"王还鼓励別人說："现在正在大鳴大放，总社不敢批評，党員在带头鬧事，你們怕什么呢？"在串連中，金也亲自打电話和湖南分社长串連。

在和各省分社記者串連时，金凱又以两面手法向总社打电話說："記者不满意社务会議的传达，記者已經和很多分社的記者联名，請求召开記者代表大会。我自己沒有办法，很为难，不能脫离群众。"並說："广东分社記者还要去北京請願，要是我們这里有記者去，也就只好叫他們去"，"现在分社記者处于半罢工状态。"

当总社对金凯串連别省記者發通电問題給予通报批評时，王介方說，当时不該与湖南社长联系，現在他告了我們的狀了。金說：“不要把矛盾轉向分社之間，这正是上了总社的圈套，要把矛盾对准总社。”

四、积極地准备办同人报

金、王在策划通电事件的同时还积極的想办自己的一张报紙，並且还組織人員进行討論，在討論中王說：“这张报紙的形式要学民营报紙的形式，象新民晚报一样，內容要有趣味性，軟些、广些，可以登女演員的私生活、市場行情、人物群众、体育新聞等。南昌有很多学生看江西日报感到枯燥，决不登新华社消息，不登党委指示、大报告，不登人民日报社社論，但可以轉載香港大公报的新聞”。“办报的人不要多，只要我們这一摊子就行了（指当时在会的人）。每人可先拿出两个月的工資来作經费，还可以向銀行貸款。紙张問題，只要我們办的好，省委書記也会看，这样，看江西报的人就少了，紙张也就有了。”

根据上述材料，經省委整風領导小組批准划金凱为極右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送国营农場实行监督劳动。給予生活补助每月暫定六十元。

中共中央民族学院分院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文藻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九年五月）

张文藻，原名张景惠，男，五十岁，湖北黄岡人，家庭出身小工商业者，本人成份小学教員，一九三一年担任汉口赤色互济会会长时被捕，后轉入反省院，于一九三五年在反共宣言上签

名，不久被释放，一九三六年二月在上海入党，同年再次被捕，一九三八年出狱，一九四七年重新入党。曾任科长、副处长、副局长，一九五五年冬调来我院任副院长，后又兼院党委副書記。

在整風和反右派斗爭期間，张文藻反党罪行主要事实如下：

（一）煽动点火，攻击領导

张文藻和前院长李守宪同志长期鬧不团結。鳴放初期，由于李守宪同志思想作風上的錯誤，当时成为群众鳴放批評的主要对象。这时李守宪同志因公去北京未回。张文藻即利用这一机会，一面以“照顧”李守宪同志身体为藉口，向省委文教部建議不讓李回院；另一方面却积極支持对李守宪同志的攻击的言行，甚至直接鼓动党委办公室的几个秘書說：“李院长的問題，不是思想問題，是品質問題，你們知道的問題多，应該堅持原則。”又在党委会上說：“我不怕上級党委和同志們誤会我，我是副院长，他是院长，想把他搞走”，“我不怕别人說篡夺領导权，我对学校工作不大想搞。”其实，当时並无人怀疑他。当領导上同意了他的意見，並通知李守宪同志可暫不返院后，他很快告訴了右派分子岑家梧，这时右派分子們在群众中煽动說：“李院长不回来是有意逃避运动。”他却又不向群众解释說明原因。

在鳴放中反党分子放出許多毒草，如“要李院长下台，岑家梧上台”，“反对党委制”，以及煽动学生討論“西藏該不該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該不該收归中国”等等。右派分子气焰十分囂张，群众思想非常混乱，积極分子不敢發表正面意見。大字报撕去也不敢追問，形势如此紧张，党員和党委委員会曾要求张文藻召开党委会研究，而张文藻不仅不採納大家意見，反而給大家扣上“沉不住气”和“一貫左乎乎”的帽子，群众認为这种形势不对头，他却認为“很正常”。並說：“现在已到火候，党内外的問題都要解决。”不仅如此，五月下旬当李守宪同志由北京返院后，

当时右派分子反党活动已到極其猖狂的程度，但张文藻反而与右派分子里应外合，攻击領导，在李守先同志返院的第二天，张文藻就在党委会議上提出："要考虑重新改組党委，改选团委和工会組織，（右派曾提出罢免团委中党員幹部和工会幹部）"，並說："院行政組織也可以考虑一下，党內民主要解决，不發揮民主，积極性發揮不起来。"在当日下午和次日早上接着連續發生两次反对党委，要求設立专門机构領导整風的签名运动，而张文藻在第二天晚上的党委会議上却以这两次签名为理由，再次要求改組党委。

在大鳴大放期間，张文藻惟恐天下不乱，还从党内制造混乱，如在鳴放內容上抗拒上級指示。关于党內机密不能拿到群众中去放，省委文教部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九日就作了指示，但他否認党內有机密，强調党員和党委委員带头放，什么都可以放，並在群众动員会上煽动說："要注意国內外的政治問題。"有的党委委員提出："带机密性的問題要愼重"，他立即反对說："党內机密交代下去，不放是不合适的，若向下面交代，顧虑多了放不开，故不須作机密規定。"並說："肃反中对党委提的意見也可以放，这些問題不必限制，我們不要为官僚主义辯护，肃反沒有什么机密，什么都可以放。"他的意見传达后，党員思想不通，反对这种作法，而张文藻却說："你們不放别人也知道。"尤其是当时党委副書記黄明家同志五月十八日在党委会上传达了上級关于机密問題不能放的具体規定后，他馬上反对說："不明确什么是党的决議，中央省的决議不放，支部、基層的决議是否可以放？省里开的一些会並不算决議。"並且說："党內什么都可以放、党員和群众一起放，不能脫离群众。"他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要党員同志向反党分子告密，以便更恶毒的攻击党。所以当右派分子誣蔑攻击肃反运动，党員戚务华同志据理和右派分子展开爭論时，但张文藻不但不予支持，反而批評戚务华同志"你不了解肃反情况，你乱說什么"。不仅如此，张文藻还歪曲事实在群

众中制造思想混乱，給右派分子制造反党的机会。如在学院經費开支上，按規定每月直接和間接用于每个学生的各种經費有三十四元，但右派分子在鳴放时捏造說："上級規定每个学生費用是三十九元，现在只用了二十一元，还有十八元学校集体贪污了。"鼓动学生起来"清还血債"，並要"烧房子"。为此，党委决定召开群众大会，責成张文藻向学生解释，說明眞象，以揭穿右派分子的阴謀，开会前会計科还将各項开支数目列表交給他，但他在会上講时，却不按会計科所列数字說明实际情况，而仍說："是三十九元，怎样用的我不清楚"，致使学生鬧得更加厉害。

（二）阻挠破坏反右派斗爭，包庇右派分子

鳴放期間李守宪同志去了北京，整風运动由张文藻亲自領导，当时暴露出来的右派言行，他都了解，但在反右派斗爭开始时，张文藻不但不揭發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行，組織批判，相反的他極力叫嚣，不解决所謂肃反遺留問題，不能进行反右，为肃反对象翻案，向党进攻，致使反右斗爭迟迟不能开展。此外他还束縛群众的手足，限制群众揭發批判右派言行，他在布置学生战綫反右派斗爭会上說："右派应該是煽动罢課的，专科右派而不会寬，預科主要是划清思想界限，少数民族学生尽量少搞。"並且說："右派怎么搞出来，应依靠群众决定，我們事先布置搜集誰的材料，不妥当，因为在运动中要整誰为右派，是很容易的。"对干訓部支部書記凡斌同志說："反右派斗爭，象在战場上一样，班长看排长的脸，排长看連长的脸。"还說："崔甦（幹訓部右派分子）要不是在民院，不会变成这样。"这些，实际上是在繼續散布右派言論，歪曲上級指示，模糊群众認識，替右派分子开脱罪責。他对专科副主任尤甫盛同志說："其它单位的右派是群众說出来的，我們領导上去搞不应該。"但是当幹訓部的群众正在揭發和批判崔甦的右派言行时，他却把正在主持会議的支部

書記凡斌同志喊去，严厉指責說："你們无組織无紀律，乱搞，內外問題不分。"在群众揭發批判楊天林，（幹訓部右派分子）的罪行时，张文藻不止一次的給群众泼冷水，說："楊天林的問題是思想問題，自由主义問題。"

张文藻除了阻挠制止群众对右派分子的罪行进行揭發批判外，並支持、鼓励右派分子繼續向党进攻。如右派分子崔甦在群众揭發和批判他以后，几次找张文藻談話，张文藻不是責其低头認罪，而是鼓励崔甦說："应实事求是，你以为对的不要犹犹豫豫，要坚持原則，对有些問題的看法，思想通了就是通了，不通就是不通，問題弄通也要有个过程。"崔甦經过几次批判后又去找张，並将批判的問題告訴了张，张說："如知識分子政策，李院长存在不少的問題，你不一定是攻击党的知識分子政策，有时反对个人不一定是反对党。"崔甦知道党委决定划他为右派后，他又去找张，张对崔說："爭取眞理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好好总結經驗，使自己在爭取眞理的斗爭中，不犯錯誤或少犯錯誤；在爭取眞理中，可能有誤会，有时甚至很多年才能弄清楚。"經过张文藻这样的几次談話后，使崔甦长时間不肯低头認罪，並公开說："要划我为右派比上天还难。"

又如群众在揭發批判右派分子李健衡时，李思想不通去找张文藻，张也对李說："你这个人主要是脆弱，不要有那么多的患得患失的个人主义，要坚持眞理，坚持原則，否則也是不老实，民院历史上的問題錯綜复杂，即使一时弄不清，将来还是可以弄清。"右派名单定案后，党委召开右派分子座談会，通知李健衡参加，他思想不通，又去找张文藻，张却說："当前內外矛盾錯綜复杂，有些看来是內部矛盾，則是外部矛盾，有些看来是外部矛盾，則是內部矛盾，参加会的不一定都是右派，不参加的不一定不是。"並說："自己的看法就是自己的看法，不要說受了別人的影响。"张文藻还对李健衡說："你的問題还未研究，不要有个人想法，什么思想負担啊！那有什么关系，該工作就工作，該

学習就学習，該玩就玩，最多不过劳动改造，我們过去在白区坐牢，还不是平常的事！”李健衡說：“过去在白区是对敌人，現在和过去根本不同”，张說“这也可以說是对敌人，因为这是两条道路的斗爭，是向自己認为坏的东西作斗爭。”

张文藻不仅如此暗地里鼓励和支持右派分子，而且还多次在会上公开的为右派分子辯护，如右派分子潘世昌以少数民族教师身分，在課堂上无中生有地煽动說“不尊重我們少数民族風俗習慣，肃反时硬要回民吃猪肉”（根本无此事）。並提出：“西藏該不該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該不該收归中国？”等問題，要学生討論。当党委討論潘的問題时，一致認为潘世昌的做法是煽动少数民族学生鬧事，而张文藻却說：“是事实可以講，违犯民族政策可以講，有缺点不能不叫講，潘世昌並沒有提出罢課罢教，今后还要扩大民主生活，什么都可以講，我們沒有限制这些問題不可在学生中講。”会后张文藻还曾对整理潘世昌材料的幹部說：“潘的材料你們要很好查对一下，据說潘的教案中沒有这个問題（指討論西藏和蒙古問題）。”这些反党言行怎样会写在教案上？！他是企圖替潘世昌打掩护。

党委要研究右派分子黄亦青（张文藻的爱人）的問題，张也是百般的庇护，原党委書記李守宪同志在党委会上提出討論黄的右派言論，张文藻馬上頂回去，說：“黄放的沒有什么問題，都是对你个人的問題，好吧！要討論，任何人都可以討論，还有人检举你有右派言行呢！”

（三）攻击肃反运动，汚蔑幹部下放政策

肃反运动中，团武汉市委根据肃反对象×××交代：过去曾有反动証件放在张文藻的爱人黄亦青娘家，黄亦青母亲死后，有部分东西轉来黄亦青处。在肃反中团市委派人前来索取証件，黄亦青拒絕检查，后經高校党委批准进行了搜查。为此，张文藻极度不滿，在肃反問題上長期对党进行攻击、誣蔑。张文藻說：

"武汉市的大搜查是不恰当的，波动面大，脱离群众，中央曾批評过武汉市。"並說："对黄亦青的搜查，高校党委和民院党总支沒有堅持原則，是无理非法，不近人情的搜查了我的家庭"，张还說："我几十年来受的冤枉不少，有些好事往往当成坏事。"

民院在肃反中斗爭"广东宗派集团"（后結論为落后宗派集团）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在具体作法上存在一些缺点和錯誤，当时张文藻也亲自参加和領导这一斗爭，情况他完全知道，但在鳴放中右派分子攻击时，他有意歪曲事实異象与右派分子站在一起叫囂"搞錯了"，直到反右派开始后，还在叫囂"不解决肃反遺留問題不能进行反右"。

党委决定，张文藻的爱人黄亦青下放劳动鍛炼，张則說"不近人情"，这对幹部是"懲罰"。教师朱秀武同志下放劳动鍛炼，是党委决定的，张文藻在背后对朱秀武同志爱人韓荣宝同志說："因朱秀武提了李院长的意見所以李院长要他下放。"以挑拨領导与被領导之間的关系。

* * *

张文藻墮落成为反党分子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他極端个人主义發展的結果，早在一九三八年因党組織审查他被捕后的情况未及时恢复他的組織关系，对党抱有極大不滿，当时竟拒絕接受分配工作，以自行开辟工作的理由同党組織断絕关系，对党积怨很深。他曾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写的自传中，对当时的党組織和党的負責人，进行恶毒的攻击，說："××同志那时盲目执行王明路綫，但是那时以王明为首的党內負責同志所号召的'拥护国民党，拥护蔣介石領导抗日，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等右傾机会主义的口号，近乎对敌人的投降，与象处理我这样的問題，对照起来，使人感到不公平，不明确党为什么这样厚于敌人而薄于同志。"至于对肃反中黄亦青被搜查一事，更是长期不滿，怀恨在心，甚至認为是李守先、徐少岩（前副院长）两同志

打击他，因而也成为和李守宪同志搞不团結鬧无原則糾紛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张文藻上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自去年四月分以来，先后召开許多次会議进行揭發批判，但他在确凿的事实面前仍然始終不老实检查交代，低头認罪，一直抱着頑固对抗和无理抵賴的态度。最近党委将对他处理的决定稿給他看后，在他写的意見书中不去正視自己的錯誤，反而恶毒地攻击院党委說：“党委是在传达李守宪的那种不实事求是的口吻，这是由于被李守宪三十年党龄所炫惑，被李守宪那种縱横捭闔的一貫在党內耍手段的狐迷所迷惑”等等。以此誣蔑党委，这种恶劣态度，只能說明他是坚持錯誤，拒絕改造。张文藻的[illegible]种思想、态度和行为不仅已經失去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員的[illegible]而且是坚决站在反党反人民的立場上。

根据上述事[illegible]党籍，建議行政上[illegible]级。

中共湖南省委监察[illegible]
关于右派分子邓鈞洪的处理結論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八日）

邓鈞洪，男，四十二岁，湖南耒阳人，家庭出身中农，成份职員。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〇年失掉联系，一九四六年二月恢复組織关系后，在冀察辽解放区工作，一九四九年南下。先后任新湖南报組长、秘书长、副总編輯，省文教办公室副主任。級別十一級。極右分子。

一、主要反动言行

（1）坚持資产阶級的新聞观点和办报路綫，反对党的領导。他攻击报导先进經驗技术是“灰溜溜的一大片”。“尤其是濫發一般的、琐碎的、重复的經驗技术和工作方法，就是不好，缺乏政治內容与思想內容；是教条八股，內容枯燥，这样的报紙沒人看”。他主张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錯誤“进行大規模的、連續的报导”。要發揮“对工作的监督作用”。对于“穿花衣、燙头髮，一鴨四吃”等报导大加贊揚，主张报紙要“打扮得象姑娘們穿花衣一样漂亮”。

（2）顽固的反对党、反对省委对报紙的領导，誣蔑省委的領导同志。对唐麟同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代表省委对报社的批評，邓公然表示“完全不同意”。还說：“我才不检討哩！不检討大不了，不升官發財”。省委書記周惠同志第二次提出批評时，他当場說：“这不仅是委屈，簡直是寃枉”。当周礼同志（省委書記）要他冷靜些时，他說：“我們从来都是把省委的一句話当做聖旨，怎么会这个样子”。他还对苏辛涛說“党內問題是經常要翻案的，今天肯定的东西，过个时期就会否定”。还誣蔑說“上面民主多，下面民主少”。他公然对党支部和人事科說“分党委布置工作嘛！你們願搞就搞一下，不願搞就不理他”。誣蔑說“周惠同志不懂报紙的特点，外行，对报社有成見。小舟同志过去当过宣传部长，怎么也同意周惠的意見”。誣蔑官健平同志（报社总編輯）“有点象旧社会那种逢迎的人，外面装得党性强，組織性强的样子，思想深处都是不干淨的”。

（3）邓鈞洪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亲自在报社先进生产者、工作者給奖大会上为了貫徹他的反党新聞观点，作了一次“关于改进报紙工作”的报告。他主张将取消报导先进經驗技术的反党决議分送省委、农村工作部、农业厅，“讓他們也知道知道”。积

極支持搞反党的展覽会，攻击省委指定刊登的一些稿件。並排挤打击总編輯官健平同志，他攻击說："官不仅文字不通，而且很驕傲，不懂、不鑽，光靠党性吃飯，官过去只在伪国民日报当过校对"。並指使傅白蘆等人找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同志反映报社所謂"全面情况"，說"党內有这样一种人，对上級装得畢恭畢敬，对下面就沒有人家說的，粗暴跋扈得很，应讓省委了解了解幹部"。傅白蘆便按邓的授意写了一篇"沒有意見的人"發表在新湖南报湘江副刊上攻击官健平同志，还公开提出要官退到第二綫。邓是新湖南报反党集团的首脑分子。

二、斗爭中的态度

斗爭开始时，頑抗抵賴，不願老实交待，以后在事实面前承認了反党罪行，表示願意悔改。

三、处理結果

一九五八年六月七日經省委討論决定：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即：省人委文教办公室副主任）。监督劳动。

中共湖南省委监察委員会
关于右派分子苏辛涛的处理結論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八日）

苏辛涛，男，四十岁，广西省义宁县人，地主家庭出身，学生成份。新湖南报副总編輯，級别十一級，極右分子。

一九三八年二月到延安抗大学習时入党，一九四〇年一月在新四軍工作时被俘后，与党失掉关系。先后在国民党部队中当兵

和当文書，一九四二年八月回原籍义宁县当小学教員和任伪县教育科科員。一九四三年十月經廖意林的关系去重庆育才小学任教。一九四八年四月和廖到长沙經香港等地去解放区，一九四九年三月任中央統战部研究員，並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五月南下。

一、主要反动言行

1.苏系新湖南报反党集团的首脑。一九五七年五月苏亲自写的"統一認識，行动起来"的反动文章，实际是該集团反党、反領导的行动綱領。並多次挑起爭論"一九五七年三月份的农村报导方針"，作出"关于农村先进經驗技术宣传"的反党决議，反对党对报紙工作的領导。一九五七年八月唐麟同志代表省委对他們进行批評后，苏不但不接受，反而慫慂集团成員柏原乘去中央学習的机会，将爭論的小册子带到北京向有关部門"反映"。同时还将該集团成員蔡克誠为"脫产領导整風"，来篡夺整風領导权，进行反党活动。之后，省委書記周惠同志再次批評时，苏却狂妄叫囂要"积極行动起来，搞到底"，並将周惠同志的批評抄好，声言要向書記处和中央告状。同时还拟定了一个全面包围省委的計划，發动集团成員分别向省委領导同志"反映情况"。提出"先攻孟（报社孟树德秘書长）、后倒官（报社官健平总編輯）"的反党步驟。

2.制造反党謬論。苏說："党和人民在总的方面是統一的，但在具体問題上有矛盾。"因此他提出报紙必須"大大提高政治胆量"，要"成为輿論机关"。还說："省委与中央一致是抽象的，矛盾却是具体的；省委負責同志与省委之間一致是抽象的，矛盾却是具体的；省委个别同志不等于省委。"同时其集团成員便公然叫囂"我就不把周惠和唐麟的意見說成是省委的意見"。"省委書記周惠不能代表省委来領导报社"。"报社的稿件为什么要送給唐麟审批？"

3.頑强地坚持資产阶級办报路綫，篡改新湖南报的政治方向。他公开提出“报紙要从自己的性質出發来貫徹执行党的路綫、政策、决議和指示”。“不是直接进行政治斗爭，經济斗爭和人向自然作斗爭的据点”。他把省委要刊登的工作經驗和指示攻击为“布告牌”。

4.煽風点火。他揚言說：“报社的三大主义特别严重，单是小民主不解决問題，上街、罢工不可能，上書、請願是可能的。”还对党外右派分子魏猛克（省文联主任，民盟負責人）說“过去我們的私人感情实在太少了”。对向麓（报社非党幹部，右派分子）說：“共产党缺乏人情味。”

二、斗爭中的态度

开始企圖蒙混过关，正式斗爭时才被迫交代了一些事实。但帽子戴得大，具体交代少。对小集团其他成員的反党活动也揭發不够。态度是較恶劣的。

三、处理結果

一九五八年六月七日經省委討論决定：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即新湖南报社副总編輯）。劳动教养。

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議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徐江萍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

在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議期間，經过代表們的揭發，証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江萍，在政治上已經墮落为右派分子。他的主要錯誤是：在他所担任的检察工作中，一貫表現右傾，丧失立場。突出的是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間里，当城市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和农村的地、富、反、坏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否定合作化成績，誣蔑粮食統購統銷政策，破坏人民民主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时，在这样严重的斗爭关头，徐江萍身为国家专政机关的主要幹部，不是出来維护社会主义，保衛人民利益，坚决打击反革命分子的进攻，相反地却在一系列問題上，敌我不分，丧失立場。他混淆两类矛盾的性質，把敌我矛盾認作人民內部矛盾，甚至，連反革命暴乱杀死了革命幹部，他也認为是人民內部矛盾；而且还誣蔑說暴乱是由于幹部作風不好引起的。这样，他对于反革命分子的瘋狂进攻，不但不去主动鎮压，反而为他們喊寃叫屈，恶毒地无中生有地誣蔑我們的肃反运动有百分之五十、六十都是“錯案”和“寃案”。徐江萍对敌人是这样的宽大与照顧，而对于我們的幹部，却極尽其誣蔑和丑化的能事。他把我們許多阶級立場坚定，对敌斗爭英勇的同志，描繪为作風恶劣、“违法乱紀”的人，說他們是“靠捕人来打开局面，靠懲办来代替思想發动”。因而他竭力主张对所謂“违法乱紀”的人，进行“严肃制裁”。这样，

很明显，徐江萍的专政矛头，不是指向敌人，而是指向人民內部和革命幹部的。

徐江萍还反对党对检察工作的領导，他把检察工作置于党的領导之外，向党鬧分散、鬧独立。他認为党对检察工作的領导，便是破坏他的“独立审判”；說检察幹部参加了党的中心工作，便是“不务正业”。

根据上述情况，充分証明：徐江萍的言行，是不折不扣的右派言行；他已經完全丧失了繼續作一个共产党員的起碼条件。为了純潔党的組織和巩固党，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議一致决議：开除徐江萍的党籍；並且建議有关的行政方面，撤銷他所担任的一切职务。这个决定应該在党內外加以公佈。

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委員会整風領导小組关于右派分子阮力定案与处理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

阮力，女，三十七岁，江苏省松江县人，共产党員，原广西省妇联副主任。

阮力从小便全家参加天主教，又于一九三七年在上海高中时曾参加上海市第一届学生集中軍訓。一九四〇年曾被批准参加共产党，尙未宣誓过組織生活因轉移地点而失掉組織关系，一九四二年二月重新入党。平时个人英雄主义自高自大，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民主作風差，不虛心，对人严对己宽，工作不艰苦，不深入，有严重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鬧地位、待遇。

一、主要反动言行

1.攻击統購統銷政策，她說："在統購粮食問題上，不根据政策办事，欺騙群众乱宣传，强迫命令违法乱紀，侵犯群众利益十分严重。"污蔑統購是"区幹用开除党籍、捆绑、抄楼等办法进行"，或用"拂晓包围，天亮解决"，攻击統購統銷搞糟了，說"造成不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很多妇女兒童餓死了，很多妇女兒童变成了孤兒寡妇，很多妇女兒童至今与亲人离散"。

2.攻击各級党委，丑化各級党委的負責幹部和污蔑党的幹部政策。他說："中央省委对全省餓死人事件，籠統总結为因災餓死人，值得进一步研究分析"。"死人事件的检查是民主人士反映到中央后，中央才派人检查处理的，这么多共产党員都在幹什么呢？"又說"大幹部下去排場太大，眞正接近深入群众太少，在負責幹部中打圈子較多，不如旧社会的清官还化装到民間私訪"，說省委"执行幹部政策沒有原則"，攻击各級党委不重視妇女工作，挑拨妇女幹部对党不滿。还說妇女幹部搞中心工作是不务正业。

3.丑化全国妇联領导，去年六月在全国省市妇联主任会議上發言說"大姐大事不会幹，当然不会犯錯誤"，又說："全国妇联有怕上現象，最敢講話的还是新聞記者。"

4.企圖把妇联組織放在党委之上。說"妇联要有代表性、斗争性，只有妇联才代表妇女的利益"。提出"妇联要监督帮助党政正确貫徹粮食政策"。

二、斗爭中的态度

初期态度極不老实，經多次批判斗爭，最后已基本承認錯誤。

三、区党委整風領导小組定案与处理决定

划她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銷原有职务，实行留用察看，並降低原有待遇（由十三級降为十六級）。

广东省水产厅整風領导小組关于極右分子蓬荆的处理結論

（一九五八年二月三日）

蓬荆，男，四十三岁，广东省东莞县人，工人家庭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六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参加工作。現任中央水产部群众漁业司副司长。

蓬荆是广东水产系統右派的首脑。他的主要反动言行是：

1、进行反党宗派活动，妄圖篡夺广东水产系統党的領导权，有計划、有綱領、有步驟的疯狂的向党进攻。他于一九五四年离开广东之后，抱着極大政治野心，积極活动，拉攏与他主张一致、观点相同的温盛湘、鍾傑明、謝平（均为右派分子）結成反党的領导核心，积極策謀为温盛湘翻案，謀取高級职位，支持南海水产公司"九三"黑帮的反党方案：取消党委，赶走党員領导幹部，与謝平密謀撤銷省水产供銷公司一批党員科长，由他回广东水产厅当厅长，讓右派分子和坏分子上台，以改变党的政治方向，建立他的"独立王国"。

2、否定历次政治运动的成績，攻击水产厅和省委領导。他把延安整風說成是"很多老幹部現在想起来还要下淚，要吸收延安教訓"。又說："广东搞运动不客观"，"掌握鎮反过严了"，"姚宝猷不过是文化特务，留到今天不一定杀"。他玩弄

手法，包庇地主恶霸分子，破坏土改运动；抗拒三反，說自己单位是“清水衙門”；認为肃反“粗糙，不客观，打击面过宽了，过份的伤害幹部”。他造謠攻击說：“水产厅是沒有經过国务院批准的”，“水产厅不能容人”，“新水产排挤了老水产”，“否定了他过去在瓦砾堆上建立起来的功績”。他传播地方主义，攻击省委，說：“陶鑄同志这几年領导广东工作偏差不少，不該对方方下这么狠的手”，“广东整風运动陶鑄不便領导，应由尹林平領导”。

3、一九五七年六月借故来穗大肆点火。他来广东水产系統各部門組織反党分子、三反、肃反对象数十人，煽动、唆使他們向党反攻，通过个別交談，开“宗派会議”，上茶楼酒館請宴赴餐等方式，千方百計的进行反党点火活动。指揮党內、外右派分子“上万言書”，“鳴放到人民日报、南方日报、中央水产部去”，“上下結合，互相配合”發动总进攻，他要給三反、肃反对象“平反”，煽动“申冤”，說：“三反弄得你傾家蕩产”，“肃反委屈了你們”，“有意見可以提到水产厅，不解决問題就告到省委，告到陶鑄”，“可把行李放在省委門口，不解决問題就不走”，“要趁整風机会求得徹底解决！”致使右派分子疯狂到了極点。

4、反对党的幹部政策，他在广东任职期間一貫重用依靠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政治面目不清的人，排斥共产党員和轉业軍人。他說：“特务可以用，历史复杂不要紧，留在机关比放在社会上更为保险”，“宁要一个工程师也不要千百个共产党員”。把党員当作“木头”和“招牌”。他污蔑水产部，說：“部的幹部都是別人送礼送来的，司长不称职，水平不高，处长低能，不懂业务。”

反右派斗爭中，蓬荆在大量的事实和确凿的証据面前，被迫承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但仍不承認是主观上有意識的反党。

蓬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是十分严重的，为此，决定划他为極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銷原有职务，留机关监督劳动。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广东省委批示：划蓬荆为極右分子，开除党籍，实行劳动教养。

中共广州市文教局整風領导小組关于極右分子李鷹航的处理結論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

李鷹航，男，四十一岁，广东省台山县人，家庭出身手工业，本人成份教員，一九三八年入党，现任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音协广州分会主席、市文化局分党組成員及音协临时党組書記，十三級。

一、个人主要經历和政治历史情况

一九三八年六月参加革命，历任教員，教授，音乐、戏剧系主任，文工团长，文联委員等职。在延安时搞过小圈子，曾因此被列为审查对象。

二、主要反动言行

（一）組織右派反党集团，有計划地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

大放大鳴期間，李捏造文化局执行“以戏剧为主”的方針，污蔑是“一花独放”，並以此为幌子，以他为首，煽动和組織了右派分子赵本、譚林、蔡曲旦、梁德灵等人的右派反党集团，召开了几次秘密会議，佈置他們發言要重点談反对“戏剧为主”，

並授意叫他們給报社写稿，写好后李亲自修改和补充，送报社發表。（"以戏剧为主实質是一花独放"一稿在广州日报發表，"落英繽紛"一稿投南方日报）还研究了进攻策略，說："現在先攻倒市（指市文化局）是第一步，省文化局、省委文教部問題一样严重，要第二步才解决，我絕不認为走了第一步，就不走第二步。"並佈置如何控制会場，实行所謂"連鎖發言"来向党进攻。为了供給小集团成員向党进攻的材料，除了捏造事实外李还将市文化局分党組秘密文件（三年总結）給蔡曲旦看。当他們的活动受到文艺界有力的圍击后，李即对其成員打气說："不要失掉信心，不要乱了自己的陣脚"繼續鼓励他們向党进攻。

（二）否定社会主义文化建設的成就，描写成"一团糟"。

鳴放期間李在民主人士赵君迈召开的座談会，及局务扩大会、省委宣工会議等会議上說："以戏剧为主是一塊大石头，压死了其他艺术事业。"又說："音乐、美术、新聞、話剧、杂技、舞蹈，除了粤剧以外的艺术部門都不被領导重視，他們改行的改行，积極性不高，事业沒發展，艺术上太多清規戒律。"

（三）散布文化艺术的成績是自發的，否認党的領导。

李在上述的会議上又說："如果音乐工作有成績也是自發的，是依靠社会力量和音乐工作者，是从石头縫里長出来的，是音乐本身有自發生命力，並丑化党对文化艺术領导有五种态度，即：（1）吓唬人，（2）装听不見，装聋装啞，（3）採取压縮的办法，（4）用另一种面目（重点）来保护'一花独放'，（5）不从改善着手，而是考虑解释。"

（四）挑拨群众向党进攻。

李說："搞音乐的处于奴僕地位"。"各个艺术部門待遇不公平。"又說："只有'爭'和'叫'才能得到党的重視，才能糾正不平等待遇。"甚至說："就是反革命分子，反对一花独放也是好的。"

（五）宣揚阶級斗爭熄灭論。

市文化局分党組传达中央对整風的指示之后，李說："市委提出阶級斗爭，我不同意；中央提出的阶級斗爭，我也有意見，既然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就不应有阶級斗爭，这样使斗爭模糊了。"

三、斗爭过程中的表現

斗爭初期表現出頑抗情緒，后在人証物証面前才承認一些具体事实，但不承認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机和目的，沒有認識自己的罪行和眞誠悔改的表現。

四、一貫表現

工作一般，發表过一些作品，但平时思想上自命不凡，高傲自大，常罵人"无知"，曾表示想当厅长、部长，回广东后，选择过好几个崗位，嫌职位低不去，来市文化局后，对工作不負責任，很少到局办公，由他主編的"岭南音乐"他从不审稿。

五、結論和处理意見

李凌就以反对"以戏剧为主"的方針为幌子，煽动和組織右派反党集团，他是这个小集团的头子，並散佈一系列修正主义謬論，疯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决定划为極右分子。但考虑李在音乐方面有所专长和有一定社会影响，因此，决定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級别由十二級降至十六級。

(已經广东省委批准)

中共广东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古念良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四月三日）

古念良，男，四十岁，广东中山县人，家庭出身地主兼工商业，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九年二月参加共产党，一九四五年参加革命，原任市人委財貿办公室副主任，級别十級。

一、主要反动言行

1、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建設方針。一九五七年在北京党校时說："我国建設重工业片面了，全国农业产品一共只值四百亿元，拿这样农产品的产值来建設重工业，不成比例。匈、波的經驗教訓值得我們注意。""財政不平衡，信貸不平衡，使購买力向生产資料突击，目前已到了农产品了。"他說："我在香港时，看到有些大洋行，机构小，人少，工作效率高，这是因为他們是私有制，大家都好好幹。我們的社会主义，总的說是有优越性，但具体說，机构大、人員多、工农幹部多、混資格吃飯，沒有能力，工作效率不高。由于我們有些幹部对公有財产的爱护，不如資本家对他的私有財产爱护。"

否定肃反运动成績和誣蔑党对知識分子的政策。在党校时說："在肃反运动中，我是小头头，斗争时拍桌子。开始把一个肃反对象判了两年徒刑，最后定下来是劳动教养，这是否可以說成績是主要的呢？""如果多講成績少講缺点，就不是实事求是，这种說法有危险性。""我們有些同志对肃反缺点認識不足，不去認真賠礼道歉，被斗者对我們很不滿。"他在检查中

說：“在写肃反总結时，我就想到写肃反具体成績，但是很难写出来，后来还是写了成績是主要的。”他很讚賞右派分子費孝通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气”的文章，認为它細致的道出了知識分子的心情，又說：“党在解放后，对一些知識分子使用安排不当，使他們的作用未能發揮。”一九五六年在广州时曾对人說：“市里有些单位对知識分子幹部有宗派情緒，表現在对有些知識分子的安排、使用有缺点，在肃反运动中的重点也是知識分子的比例大。”

为右派分子說話，詆毁党的反右派斗爭。他說：“当我听到有些知識分子說“六八”社論有点厉害时，我又認为不如在象梁思成、程潛那样的文章先發表几篇以后，再發表社論好点。”“社論痛斥了右派的言論，是应該的，不过要注意，不要使别人認为我們要“收了”，又不虚心了；不要光从我們自己出發，也要从六亿人民出發。”他說：“右派不是反革命，仍然可以用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即团結——批評——团結的公式来处理。”又說：“反对社会主义，不一定反对共产党。”

贊揚右派分子的謬論，同情和包庇右派分子。他說：“葛佩琦的言論很反动，但有人認为很好”，“讚賞葛佩琦的話的人，不一定是反革命。”右派分子袁永熙說：“外行不能領导內行，世界上沒有一个政治家当工科大学校长的。”“如果蔣南翔当副校长，刘仙洲当校长，就主动了。”古說：“此話有道理。”右派分子徐盈說：“学校（指高級党校）有教条主义，教研室脫离实际，半年备課，半年教課，眞是誤人。”古說：“对！有道理。”袁永熙被开除党籍后，古認为“袁怎能說得出这些話呢？有些情节会不会搞錯呢？”还經常到方×家里打听袁的消息，十分关怀。当同志們發現徐盈政治上有問題时，古說：“徐是个老实人，書呆子。”支部决定讓古对徐进行批評，但古始終未对徐进行批評。在支部向徐展开斗爭时，他却擅自与徐談話。並几次找其他同志打听徐的情况。在批駁徐盈时，有人指出徐向党进攻

是想在政治上捞一把，古認为"原則提的太高"。以后（七月底）同志們公認徐是右派分子时，古还認为徐"仅是思想上相当严重的右派观点。"

2、攻击領导，排挤外来幹部

在財政局期間，古对麦揚說："要有几个'死党'搞工作才好办"，"士为知己者死"。他在財局，主要依靠他所信任的地方幹部搞工作。如把麦揚安排当預算科科长，唐怀当供給科副科长。工作上重大問題，都和他們商量着办。市委要調麦揚去广州日报工作，古不願放，並亲自向市委提意見不要把麦調走。对赵元浩等人說："现在广州市局、处級的地方幹部就是我們几个人了，我們要好好地工作。"他們間經常自由主义的議論，如古对赵元浩說："你在华南党校受留党察看的处分是市委的意見。"对陈文川說："你有些問題是"莫須有"的，是章璇加上去的。""旧社会来的怎么沒关系，沒有关系就活不下去。"又对麦揚等人說："南下幹部不了解地下党的历史，又不了解旧社会，对地下党員的历史就不易正确了解。""傅維新屡次提出要把陈文川列为重点，其实傅完全不了解情况，显然是'乱弹琴'。"唐怀的提級沒批准，他就对唐說："本来財貿战綫已同意提你一級，上报时漏了，以后补报人事局就不同意了。"古很替唐怀担忧，在高級党校时說："如果唐怀在党校，我看一定当右派。"他們互相吹捧，古公开說："我和唐怀是臭味相投。"古說陈文川、唐怀是"作家"，陈、唐就吹嘘古是"专家"。

古的地方主义已發展到敌我不分。解放初期，接管了財政局，把档案材料交給一个民社党的党員来管。安排周維平（叛徒）当收管科科长；陈愷（叛党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当副科长；古介紹入伍的黃伯申（脫党分子）也是一到財政局就当了副股长。另外由麦介紹入伍的廖延（历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唐怀介紹入伍的焦沃南（肃反对象，右派分子）等人都是古所信用的。並說："你們很多人沒有經过监獄的考驗，不知道里面的

苦。”对周維平說：“我們处一級当中，叛变自首的，也可以当秘書长，如饒銀华就是。”傅維新同志几次提出要調查周的历史問題，古不表示态度也不給予支持。

对工农幹部、外来幹部，古採取打击和排斥的态度。先后派到財局工作的南下幹部都受到古的排斥。如經常在背后說：“何庶仁不正派，很阴险”，“虽无大过，面目可憎。”“孙伽俐比何庶仁高明，但不好相处。”古常常粗暴責罵工农幹部，如罵张鈞是“草包”，事后张找他交換意見，他不理；王子文認为陈文川应列为肃反对象，古就罵王是“品質恶劣”。又說：“工农幹部文化水平很低，很难搞好財政工作。”这些同志，先后被調离了財政局。以后組織調傅維新同志（南下幹部）到財政局工作，古几次都不願要，后来組織命令他接受，古才不得不同意要了。三反时，傅批評古排斥外来幹部等錯誤，他大为不滿，說傅“識不抬举”，“别有用心”。一九五七年在北京党校时对黃士鳳說：“幹部要地方化了，估計王德、赵武成两同志很快要調走，鍾明同志可能当市长，吳有恆当市委第一書記”。

3、資产阶級个人主义很严重

一九五六年市党代会上选举市委委員时，古落选后，到处說：“市委既然把我提了名，对幹部就应該有个基本認識”，“許多批評是片面的，不实事求是的”，“市委沒有澄清是非，大会一轟就名誉扫地”，“市委不出来解释，令我下不了台”。

一九五六年間，市委要調古到广州日报工作，他怕熬夜，不願去，对組織調动甚为不滿，說：“会唸經的和尚不唸經，偏偏要不会唸經的和尚学唸經。”但，他积極活动要到科学院去，“专門研究一門，将来也可以写一本書”。找許滌新同志，請許調他去中国科学院，沒去成，就活动到科学院广州分院，表示“科学院广州分院不行，調到中山大学也好，反正不做行政工作就好了。”

古在生活方面腐化墮落，一九五零年和一九五四年曾先后两

次搞不正当的恋爱。

、 他在党校检查时說："过去当官的，現在是当幹部，有共同性，也有个性，个性是时代不同，共同性是处理人与人間的关系，要处理好，必須有一套，就是对上边一套，对下边一套。""我不是把自己作为党的工具，而是把党作为我向上爬的工具。""我对各項政治运动和党报都不感兴趣，人民日报是老一套，教条主义，每次运动都是提打通思想，也是教条主义，运动就是整人。"

二、斗爭中的态度

古对高級党校关于延长学習时間，繼續进行整風的决定，抵触情緒很大，写信給唐怀說："我們这里自从提出整風为主，学習为輔，並要求做到理論学習和整風两不誤之后，学習空气为之一变，而'風'也沒有什么好整似的，看样子，'两誤'已成为定局"。

古在党校的錯誤言行經党校支部及小組同志多次帮助和批判，但古对錯誤仍沒有作深刻的检討。对錯誤躲躲閃閃，避重就輕，只扣大帽子不講具体事实，或有时承認一些事实，但不徹底挖思想，有时装着在写检討，实际上是开着灯睡觉，有意拖长时間，蒙混过关。並且在检查时說："我一不該来党校学習，二不該五月間沒退学，三不該編在第七支部，四不該当支委和小組长。"但是又說："回广州联系我过去历史会比这里整的更慘。"古回到广州后，对麦揚說："在党校犯了严重錯誤，还未結論，主要是严重右傾。在党校时受严厉批判，自己把什么帽子都扣上了。"

在市委扩大会期間，極少發言，对于平日来往密切的同志（如佘美庆、唐怀等）的錯誤，沒有揭發出什么材料，战綫領导小組責成他写書面检討也迟迟不交，态度十分消極。所写的检討很不深刻，仅根据同志們揭發的問題进行检查，沒有暴露自己的錯

誤和思想，对錯誤的認識是很差的。

广东省委批准划古念良为一般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銷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

交通部广州区海运管理局整風領导小組关于右派分子吳英民的处理結論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五日）

一、个人主要簡历和历史情况

吳英民，又名吳淸鏡，男，四十三岁，河北省正定县人，地主家庭出身，学生成份，現任广州区海运管理局局长。吳英民于一九二八年参加共青团，一九二九年轉党，不久即被捕入獄，一九三一年出獄后即动搖脫党，先后在伪济嘉荷烟草稽征局工作过，又在閻錫山部炮兵二十六团任文書，在保定投入蔣匪待从武官长行轅主任錢大鈞部队，一九三三年随錢部到湖南、江西等地，后在国民党三十二軍当过排长，还在补充兵招募处訓練班幹过，一九三八年經駐湖南邵阳八路軍办事处介紹去延安抗大学習，一九四一年秋重新入党。

二、主要反动言行

（一）誣蔑社会主义企业的优越性，反对党在企业中的領导。

鳴放初期，吳英民授意其秘書楊章，化名"公民"写大字报一篇，題名"我也要鳴"內容說："有人說海运局不如民生公司，民生公司不如卢作孚（旧民生公司資本家），我認为眞是

一針見血，我們机构庞大，人浮于事，效率很低，官僚主义严重，归根到底是企业党委制的問題……企业是政府的，是六亿人民的，並不仅仅是共产党和一千二百万党員的。……今天企业的工作全部都給党包办光了。……究竟企业的最高領导是局长呢？还是党委？如果是党委乾脆取消局长一职好了……这实質上是一党专政，那有什么共存，有誰能够监督共产党呢？……”。該大字报由楊章起稿，由吳英民批改后，伪称是别人投稿，吳英民、楊章並分别在稿后写上批語，交黑板报登出。

鳴放期間，在一次船舶支書会議上吳支持“无知不能領导有知”的謬論，並說“除开党外人士我們則办不成……。”又說“‘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話說得很对”，並将这句話在会議总結中又着重提出。当儲安平的“党天下”謬論在报上公布后吳就說：“你們看，儲安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意見了，說十二个总理沒有一个不是党員，是党天下，我看这很大胆，很有道理。”在一次报告会上吳也提出“我們海运局局长都是党員，清一色。”吳还誣蔑党的領导說：“党中央毛主席領导是英明的，有远見的，但是一到下边不是右就是左，有时是过分的左。”

（二）同情和包庇右派分子：

鳴放初期右派分子李光放出反党言論时，党委副書記許济同志向吳二次反映“李光發言很有問題”吳即說“沒有問題，沒有問題。”当右派分子张玉华包庇右派分子李光事被揭發后，吳英民竟在召开“反击右派分子陈华大会”时要将张玉华列入大会主席团名单，顏太龙同志不同意說“这是原則問題，要参加就得請示省人委严秘書长”吳方作罢，但事后又对陈聚同志說：“我是小組长又是局长，象这样事情还要經过严秘書长批准嗎？”以后吳有意要将张玉华派去香港工作，被其他領导同志阻止未成，十月間吳又要将张玉华派去八所工作，也因其他領导同志反对而未成功。

三、斗爭过程中的表現

斗爭初期，吳想曚混过关，並曾在党委会議上威胁說：“如果明天有人揭發“我也要鳴”大字报，我立即就要写大字报否認，說我沒有写”。之后在大会上检討时也是狡辯，硬說大字报不代表自己思想。一月底吳写給党委王書記的信中仍写着“冤枉到極点”“朱笔一点，人命二条的时候到了”“假如我真是个右派分子，那就无話可說”等語。当最后与吳对証材料时，吳又用“記不清”“想不起来”等話来推諉，态度十分恶劣，无悔改表現。

四、一貫表現

吳英民一貫表現是个人高于党委，漠視党的組織，数次不通过党委个人擅自决定重大問題，当党委提出意見时就說：“什么事都要党委决定，要我这个局长幹什么？”“到底是局长說了算还是党委說了算？”“有党委書記还要局长幹什么？”等語，直到問題被揭發后，吳仍在会上說：“这个要党委討論，那个要党委討論，到現在我还有意見。”对我局領导同志进行排挤。对省召开一些会議常借口推辞不去，如一九五〇年春省委决定搞綠化运动，吳也不去，並說：“这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苦我們早就吃过了”。

五、处理意見

右派分子吳英民的反党言行是極为严重的，屬極右分子，情节严重，斗爭中的态度恶劣，决定开除党籍，撤消职务，劳动教养。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广东省委批示：划吳英民为極右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实行监督劳动。

交通部广州区海运管理局整風領导小組关于右派分子张玉华的处理結論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五日）

张玉华，男，四十七岁，广东省保安县人，工人家庭出身，工人成份，一九三五年参加工作，一九三九年入党，现任广州区海运管理局副局长。张玉华一九三九年以前在香港九龙黄埔船厂及英国軍艦等处工作，一九三九年在延安学習，一九四一年在延安中央解放社任电机部主任，一九四二年在晋綏分局×地委作幹部工作，一九四五年在旅大市委作幹部工作，一九四九年南下任广州招商局軍代表，一九五一年后任广州区海运局副局长。

一、主要反动言行

（一）包庇右派分子李光，为右派分子李光出謀划策

反右斗爭初期，右派分子李光（本局海监科科长、工程师）的右派言論在小組中受到批判，张玉华竭力为李光辯护，他說："李光的問題主要是对肃反不滿，其他都是拉搭上去的""李光是中間偏右""李光已被搞臭了，瘦了、头髮都白了、再搞就不得人心了""李光哭了好几次，我心軟了"。当領导小組决定将李光划为右派时，他不滿地說："照你們这样說法：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挑拨离間，再加上其历史，槍毙都够条件了"。並为李光策划过关，李光在反右初期曾找他三次商量如何检討，有一次检討事先經张看过，张还提出修改意見，說李"措詞不当，人家会說你想国民党复辟"。他还对李光說搞运动是"群

众未發动之前主要是防右，發动起来是防左。”

（二）煽动內港落后工人鬧事

一九五七年年初广州內港落后工人鬧事，本局党委决定派张去平息鬧事，他坚持不肯去，于是改为副局长魏震东同志去。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召开工人大会时，张去到內港，魏見他会說广东話叫他报告，他拒絕不講，但到会将开完时他上台用广东話發言，發言中引用了落后工人的話，把工資股說成“工資估”，說“人家辛辛苦苦劳动，你們工資股就是想办法少算給工人錢”，“見工人拿錢多就眼紅耳赤”“如果是我就拿竹升（扁担）去打。落后工人听后热烈鼓掌說：“张局长說的是良心話”。事后鬧事更兇，並包围了工資股，工作組同志向他提意見，张說：“不滿意，以后我还要講，講得还要厉害一些，工人有意見是小事，不打人还是好的，这些人不打在身上是不改的”。

（三）反对“三反”“肃反”“反右”等政治运动，誣蔑党的政策

张玉华誣蔑“三反”运动說：“运动中領导身上受的压力是很大的，好象运动期間規定我局打虎数字，我說那里有那么多老虎，方方同志当众点过我的名說我右傾思想严重，我不管，我沒有违背我的良心乱搞”。肃反运动中領导分組将李光等划为肃反对象，张極为不满，曾在会議上多次为李光辯护未遂，以后便不参加領导分組会議（他是組員），直到李光問題做出結論再三通知他开会才勉强参加，会后諷刺領导分組說：“这些人真幼稚”。反右斗爭开始后，他借口“整風生产两不悞”恶意質問党委副書記說：“整風領导小組怎么搞的，今天开会明今开会，科長都跑光了，五年計划还要不要？”，他要办公室主任追查整風办公室为什么搞得这样乱，那个領导把运动高于一切”，对安全技术科科长（反右小組長）說：“几个右派搞不起什么，咱們还有几百万軍队，不是嗎？”企圖叫他們放松反右斗爭。工資改革时，张玉华

說："农民在土改时分得土地，我們工人只有在工資上爭""物价都涨了当然工資也应該涨"。他对統購統銷不滿，說："現在收購价格不合理，王老吉涼茶也脫銷了""我們家乡那里的老百姓过去吃肉都大塊大塊吃的，現在少了，人家怎么沒有意見？"李世杰、吳达誠两人对合作社有意見，张叫他們去打合作社。

（四）誣蔑領袖和中央領导

张經常在报告会上公开誣蔑党的領袖。他还誣蔑中央交通部的检查組长是"欽差大臣"，把馬列主义誣蔑为"牛列主义"。

（五）反对学習苏联，贊揚資本主义企业

张玉华一貫反对学習苏联，当我局进行企业生产改革时他提出"我局工具先进、人馬齐全，貨源充沛""一切要靠天时、地利、人和""靠馬克思在天之灵"。認为我們沒有什么可改的，他把推行計划管理說成"教条主义""形式主义""行不通"。南海136輪發生擱浅事故，他誣蔑說："就是先进航次造成的"。他贊揚資本主义企业說："太古公司"（英商）四十多人管三十万吨船，船比我們好，秩序井然""招商局在社会上存在七十多年，当然也有其优点才能如此"。他自称"反对派"，在各种会議上有意提出反对意見，造成混乱。

二、斗爭过程中的表現

张玉华在斗爭中的态度很不好，不肯主动交代問題，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認一些，但在承認时避重就輕，甚至当面抵賴，只承認小的，不承認大的，到現在为止，对其錯誤認識尚不够，認为是平时爱說笑話，开玩笑随便所致。

三、一貫表現

张玉华自来广州以后，一貫对領导不滿，工作責任心差，处理問題原則性不强，执行党的政策和上級的指示不坚决，革命意

志衰退，計較个人地位待遇，一貫道德品質敗坏，私生活腐化堕落，嫖妓女，与本局女职工乱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破坏别人家庭幸福，三反运动中曾因走私、腐化受到党內当面警告处分。

四、处理意見

右派分子张玉华一貫对党不满，根据其反动言行为一般右派分子，决定开除党籍，撤銷职务，监督劳动。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广东省委批示：划张玉华为一般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銷原有职务，实行留用察看，並降低原有待遇（由十一級降为十七級）。

中共广东省委
批准开除右派分子李爱农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四月三日）

李爱农，广东省惠阳县人，一九三八年六月参加工作，一九三八年五月入党，现任广州市劳动局副局长，十四級。

主要錯誤事实

（一）严重的地方主义，积極参加"东江会館"的反党活动，为該反党集团的核心分子。

李爱农是"东江会館"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核心分子之一，該集团的中心活动場所就設在李的家里，主要活动李均有参加，而且有某些活动还是以李为主的。

該集团經常聚集一批有严重地方主义、严重政治历史問題、

犯过錯誤曾受过处分对党心怀不滿的人（絕大部分为原东縱幹部），他們在一起發洩各种对党不滿的言論，攻击党所領导的各項运动，攻击党的幹部政策，汚蔑中央、省、市委的領导，进行非組織活动，严重破坏領导幹部威信、破坏党的团結統一。如：李和陈生說：“×書記講話无条理，听起来很費劲”。“××过去領导广州市工作，个人专断、个人領导，沒有集体領导，很会罵人，架子很大，很英雄，說話象喇叭，英雄劲一来什么話都說出来了”。甚至在民主人士陈伊林面前也这样講。把陈林少同志因“局长宿舍”問題犯錯誤受处分說成是楊一辰同志对他打击报复。更其恶劣的是公开向劳动局幹部說“中央×××同志馬列主义水平不高”。甚至罵“上級党委搵烏龙”，“支部現在作了打杂工，老板叫做什么就做什么”等等。並說：“林平同志过去是东縱的政委，現在才当交通部长”“摆低了”。林平同志被选为副省长后，又認为“林平的名字列在最后”“不恰当”。認为：“楊康华当不上正式委員（指省委委員）是不应該的”，这是“党照顧东縱不够”，省委照顧地方幹部不够”。並要醞釀写“东縱的历史，要为东縱”立紀念碑。此外，李还鼓励支持犯过錯誤的人向党进攻、翻案，对三反时犯錯誤的刘宣，表示同情，認为刘的处分是龙潛搞他。陈生因特嫌問題被扣，李又为陈喊冤說：“陈生过去是地下党員，为党做了很多工作，現在党这样对他，他是受到不少委屈的”。对朱德明在土改整队中被开除公职、党籍深表同情，一方面替朱介紹工作，另一方面又鼓励朱翻案，对朱說：“你有意見可以向省委申訴”，並叫朱去找邓秀芳，結果朱上書“八大”。对丘萌棠（自首变节分子，土改整队中被整出来）說：“若处理不符事实，可以上訴”，並介紹丘在技工学校任政治教員，說丘的問題是“土改整队有偏差”。

（二）在整風初期大鳴大放中，亲自煽風、点火，与右派分子結成联盟向党进攻。

李在領导小組及党支部大会上說：“現在鳴放沒有范围，反

党的也可以放”等，从中煽动群众並进行一系列活动，不仅如此，他还以領导小組会議形式与右派分子黃煥旋联盟策划，化名“大放”，放出一篇“劳动局本身就是党天下”的恶毒透頂的大字报，說“儲安平党天下不一定錯”。並别出心裁的用劳动局的“事实”来說明党天下謬論是正确的。最后还公然向党提出質問：“难道这些党員都应提拔的嗎？都信任嗎？非党人員都那么分文不値嗎？”当群众起来反击以及市委检查發現以后，不但不向市委报告，而且还多方設法替右派分子黃煥旋打掩护，企圖蒙上欺下，性質非常恶劣。

（三）严重地方主义，排斥外来幹部，进行非組織活动。

李还利用劳动局副局长之职权，把自己的五同关系和“东江会館”首要分子高云波、陈志期等推荐来的人安插到各单位工作的不下二十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曾在土改整队中被清洗、有严重政治历史問題，或脫党、自首变节的分子。李的同乡、老部下陈少英不願在惠阳邮局工作，李認为：“陈少英是地下党的老同事，压了这样久，連县委都不能当，是县委不了解他”，积極替陈活动回广州，他認为这样提拔更为容易。衛生局张迅因三反貪污受处分，想离开該局，李向张献計，要张先爭取到党校学習，然后再設法留在党校工作，张到党校学習后，李就通过“东江会館”首要分子陈生設法留张在党校工作（后未成功）。

李对两个局长进行打击、排斥，說单副局长是“醉酒保”“劳动局陈林少当局长，单保良当副局长，还有一个民主人士陈伊林，真是天晓得”。“东江会館”分子为了李的提拔，曾在劳动局党組和市委組織部等处积極活动。李被提拔为副局长后，排外活动更为囂张，竟将發到各科的通知中“单保良代副局长职务”一句刪掉，不用单章改用公章發出。

（四）对錯誤的認識

李在大辯論开始时，与“东江会館”集团分子訂立攻守同盟研究对策，但在“东江会館”反党小集团成員中，还算比較願意

检討的。

广东省委批准划李爱农为一般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

广东省委批准
开除右派分子庄明瑞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

庄明瑞，原任汕头地委副書記。其右派言行是：

1.包庇全区著名的右派分子张华云。去年6月大鳴大放时，张对地委召开的文艺座談会不滿，亲自写信給庄，公开謾罵，污蔑我党和党的負責同志为"老爷"、"貴族"，恶毒的攻击地委和专署。事后，庄住医院治病，还約张到医院面談，庄对张的右派言論不仅不予批駁，反而認为张所提有道理，鼓励其准备材料再提意見。对张攻击、謾罵我党的信，也一直不交給組織。到反右派阶段，汕头市委曾数次向地委彙报汕头市反右派斗爭情况，当时地委感到汕头市对民盟和"文艺沙龙"等問題很搞的不徹底，並强調应継續搞徹底，当时庄是整風領导小組副組长都参加这些会議和布置，情况很了解，当时庄如将张的信拿出来，就是一个有力的証据，可以把这个右派搞得更深更透些，但他仍不向組織报告，直到反地方主义开始，斗了几場，經同志們揭發和組織上的追查后，才把信交出来，前后共积压了半年多，实际上是包庇和支持右派分子张华云向党进攻。

2.公开包庇李亮的严重政治問題。一九五六年省公安厅捕获一伪国防部二厅特务分子李海，李供出李亮（原汕头市公安局

长，现任副市长，右派分子）历史上曾参加过特务組織，与李海一起受过特务訓練，省厅将这个材料轉来后，李北淮同志是慎重处理的，将信退还省厅查对事实后再轉来处理，省厅查对后把材料交給公安处，公安处交給庄，而庄却把这一重要材料一直压了一年，不告訴市委，也不向地委彙报，也不調查处理。今年一月汕头市整風办公室通过組織手續，派幹部向庄索取李亮的材料时，庄不給，还欺騙說，李亮参加特务組織是党派进去的，有过交代等等（实际未交代，也不是組織派去的）。直到追查了四次之后才把材料交給市委的幹部，而且态度極不好，还追問說："是誰派你們来調查？不是个别人叫你們来的吧？"最后还加重語气說："李亮的問題是組織派他參加的，他的历史有过交待，你們要好好查一查"。现据查对，李並未交代这一問題，也不是派进去的。这样一个严重的問題，又發生在一个較为高級的幹部身上，庄身为地委副書記，对一个可能参加过特务組織，有重大政治嫌疑的人，竟極力包庇，这是由于庄的地方主义發展到严重丧失政治立場，敌我不分的結果。

3.严重丧失政治立場，直接引用一批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庄利用职权，借口調动积極因素，通过私人关系，拉进一批反、坏分子到机关、学校中工作。据已揭發出来被拉进来的有十一人。如张世于，原为庄的同学，庄的入党介紹人，（此人大概于一九三八或一九三九年开除党籍，后长期任伪职，参加国民党，任"防奸"小組长，是一个叛徒）庄于一九五七年机关肃反后、七月学校准备反右开始时，急急忙忙把他从学校調出来，並用威吓手段要地委农村工作部、交通部給予分配工作，在庄的極力支持下，张被安排在专署交通邮电处当技术員。从鳴放中暴露材料看，张不仅是一个右派分子，而且是一个反革命分子。肃反运动中，庄又利用地委肃反领导小組长职权，公开包庇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如潮安县张家兰，是国民党的区分部委員，积極参加反共活动。肃反时，将此人列为重点对象，庄不批准，原因是他們

的关系較为密切。揭阳县的吴明靜，两次脱党，参加过国民党，解放后定为反革命分子，受过撤职处分，表現不好，但他提意見，調汕头市任文化局副局长。此外庄的政治右傾还表現在庄指示公安部門幹部下乡不准带槍，甚至到現場处理械斗的幹部也禁止带槍。从“三长”会議暴露的严重右傾錯誤，庄也应負主要責任的。

4.造謠、中伤、汚蔑人民解放軍，破坏軍民关系，破坏党的华侨政策。如一九五六年对张孝长、曾洪同志說：“軍区周司令員很难搞，軍区和地方党委的关系很难搞好。”这完全是捏造、挑拨的言論。庄对华侨政策也極力歪曲、破坏。一九五六年他在一次全区公安股长会議上說：“华侨回国，左挤右挤，乡村幹部都向华侨募捐，不实事求是，你搞一下，他搞一下，搞到华侨无錢回南洋，把金牙都摘下来，做出国的旅費”。事实上几年来，对华侨是照顧太多。至于向华侨捐献一点錢，动員华侨投資农业和水利建設等是完全正确的，应該的。而庄明瑞所說的把金牙都摘下来，完全是捏造，其目的是在于破坏党的华侨政策。

5.积極組織地方主义宗派集团，並猖狂地进行地方主义活动。庄是汕头地方主义集团的头子。这个集团在全国解放后，一貫地排斥、打击外来幹部，积極培植私人势力，企圖变政法部門为其独立王国。他的活动手段主要是：第一、誹謗、丑化外来的領导幹部，几年来几乎所有的領导幹部，都受到他的誹謗、打击。如一九五〇年庄在公安处任第二副处长时，便拉攏其亲信黄大炎、廖育等搞小集团，排斥、孤立第一副处长王琳同志（南下幹部），不向王介紹情况，不和王研究工作，不給王閱讀文件，使王无法开展工作。还誹謗王琳同志說：“不懂公安工作，照搬东北經驗，教条主义”、“审訊逼、供、信”。散布王琳“卖大煙”，“喝酒”，“生活腐化”等。結果王琳同志被挤走了。一九五三年对行署公安处长程萍同志百般刁难，不給房子住，並散布說：“程萍水平低，沒有工作能力，不会使用幹部，作报告要

别人写好然后照字念經”，等等，甚至公开与程吵鬧，抗拒程的領导。对原粤东区党委書記王延春同志也同样进行誹謗，如散布說：“王延春不稳，土改結束他提出稳定生产关系，一九五三年又提出攀倒农村資本主义大旗，都是不妥当的。”对原粤东区党委組織部长左明同志，他也極不滿意，認为左否定地方幹部，散布說：“左主观片面，說他投考高等党校时把“百家爭鳴”写成“百鳥爭鳴”。此外庄对李北准、林鳳等同志也諸多誹議，破坏其威信。第二、排斥、打击政法部門的南下、轉业幹部。如对专区检察院唐佑坤同志，平时喜欢听到唐的缺点，听到唐的缺点多一点便高兴，在大鳴大放中还积極布置了解有关唐的毛病缺点，企圖乘机攻击。对政法部副部长高毅如同志也很不信任、不尊重，高到政法部后，庄不給高介紹情况，高批过的案件，送庄最后批时，庄却送給其亲信、政法办公室副主任陈剑青审批。高是肃反領导小組組員，但庄却把肃反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和主持各种会議，甚至去省开肃反領导小組长会議等都交給其亲信李澤采（科长）去搞，不讓高过問。特别恶劣的是去年召开政法部門三长会議时，会議領导小組副組长高毅如同志再三要求向庄会报，庄推說沒时間，但背后又指使其亲信陈剑青到下面放火，搜集材料，向他彙报。总結也不和高商量，避开三长，单找一个陈剑青。三长会議上，庄作为政法部門的負責人，不检查右傾思想，相反违背地委指示，企圖利用政法战綫反右傾的机会，进行打击、排斥政法部門的外来負責幹部，达到打垮三长，安排其亲信。边防部楊宜同志是个好同志，曾向庄提过意見，庄便抱成見，誣蔑“楊不幹工作，不請示”，对边防部的机构、幹部安排上也有成見，認为楊不好，在地常委会議上提出不要楊宜，企圖将楊赶走。第三、积極培养亲信，封官許願，作为他排斥外来幹部的有力助手，企圖把政法部門变成他的小王国。如現在的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剑青、公安处副处长黄珠、检察院副检察长高修一（批准未公布），以及公安处科长黄大炎，政法部科长李澤采、李敏

祝等人，都是庄有意識安排和事先許願的。

庄除以上錯誤外，在思想上、生活上腐化堕落。如去年其母亲死时，鋪张浪费，搞迷信，請尼姑，大做佛事；在男女关系上極不正派，群众影响極坏。这說明庄不仅在政治上堕落，在思想上、生活上也是腐化堕落的。

广东省委批准，划庄明瑞为一般右派分子，开除党籍。

